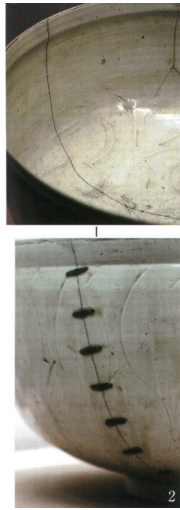




18世紀中國外銷畫家蒲呱（Puqua）  
水粉畫



清人倣戴進（1388—1462）冊頁 局部  
所見舞鑽



定窯白瓷鉢  
呼和浩特和林格爾出土



晚唐白瓷魚形穿帶壺 香港私人藏



王問《煮茶圖卷》（1558）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宋龍泉窯「馬蝗絆」銘青瓷碗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D 15.4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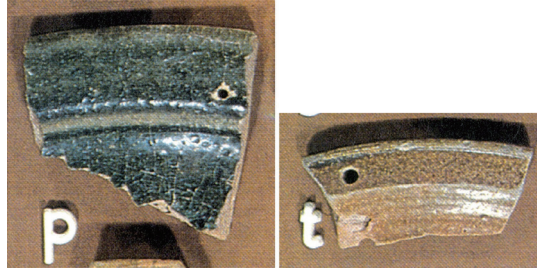
十六世紀「須彌」銘朝鮮王朝井戶茶碗  
三井紀念美術館藏  
D 14.8cm



傳千利休藏  
南宋龍泉窯青瓷盤口魚耳紙槌瓶  
日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  
H 26.7cm



陳洪綬《撫古冊》第一葉（1619）局部  
翁萬戈藏



朱爾法（Julfar）遺址出土東南亞陶瓷標本



伊朗尸羅夫（Siraf）遺址出土晚唐鞏縣  
窯白瓷標本



伊拉克薩馬拉（Samarra）遺址出土  
晚唐期白釉綠彩標本

# 銅釘補瓷術的文化史

謝明良\*

【摘要】以金屬銅釘補修、強固破裂陶瓷是世界上最許多國家歷史上曾經採行的做法，其工法一般是沿著待修陶瓷破裂痕的兩側鑽孔，再植入兩端屈曲形似釘書針的「ㄇ形」金屬釘。本文在梳理東亞、南亞、中東以及歐洲歷史上陶瓷銅補例的基礎之上，認為十八世紀歐洲於高溫施釉瓷上的銅補工藝有可能是受到中國的影響，銅瓷工匠可說是因應其時歐洲硬瓷的出現而興起的新行業。中國區域當然也是以破裂陶瓷為銅補的主要對象，但至遲在明代中晚期的文人畫中，已經採取了以銅補陶瓷圖像來營造高古氛圍的創作策略，而日本區域茶道圈在十六世紀興起的陶瓷銅釘賞玩風情，極有可能也是受到明代文人對於銅瓷之獨特詮釋的啟發。中日兩國的不同之處是，中國區域陶瓷上的銅釘不過是特定時段文人圈中用以象徵古物的圖像記號，日本區域則將之發展成茶道史上具有拙趣的賞鑑對象，成為今日日本文化史著述所津津樂道之體現桃山時代以來具有日本國族賞鑑美學的指標例證之一。尤其重要的是，上述中日兩地賦予陶瓷銅釘的象徵意涵和賞鑑態勢，是未見於其他地區的事例，是世界銅瓷史上一個特殊的文化現象。

關鍵詞：銅釘、陶瓷修補、馬蝗絆茶碗

## 一、陶瓷修繕史上的銅釘和鑽具

以金屬銅釘補修、強固破裂陶瓷是世界上最許多國家歷史上曾經採行的做法，其工法一般是沿著待修陶瓷破裂痕的兩側鑽孔，再植入兩端屈曲形似釘書針的「ㄇ形」金屬釘。也有的是在相鄰的破片穿孔，孔上下墊以鉛條片，而後將鉛熔液注入孔中，冷卻後上下鉛片條接合形成鉛銅釘。

不堪撞擊而致破裂是陶瓷的宿命，惜物則是先民的美德，從世界範圍看來，在金屬銅釘出現之前各地都存在於破裂的陶器器身穿孔，再以植物纖維、

---

\*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講座教授

樹皮或皮革穿孔緊縛的接合技藝。如中國江蘇省金壇市三星村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大型陶釜，上腹有四個寬扁鑿，器口有鑽孔修復的孔洞（圖1）；① 瀋陽新門市高台山新石器時代深腹陶罐，口沿部位也可看到穿孔補修痕跡（圖2）。② 日本繩紋早期後半的印紋陶亦見類似的補修孔，後者穿孔周邊未見銳利端部，推測是穿以植物纖維或樹皮緊繫。③ 傳伊朗德黑蘭（Tehran）近郊出土的鹿紋陶鉢亦見對稱的修補穿孔（圖3），該作品屬紀元前4500年遺物。④

在穿透的孔以繩紐等緊縛牢固的接合方式多應用在質地相對鬆軟的低溫陶器。由於工法簡易，所以沿續時間頗長，進入歷史時期仍然經常可見，而其工藝構思和新石器時代先民並無大異，不同的是穿鑿工具有了更多的選擇，金屬鑽具應該是貫穿陶器的便利道具之一。如中國山西省大同北魏（386—534）墓葬所見長頸壺頸肩部位即是以穿孔緊縛的方式進行接合（圖4）；⑤ 北京亦莊唐墓（80號地M9）大口陶罐罐口和罐身亦有多處補修孔洞（圖5）；⑥ 臺灣原住民陶壺亦見穿孔修補例，但係以鐵絲穿孔繫合（圖6）。⑦ 後者陶壺是淺井惠倫（1894—1969）在1927至1945年之間接受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委託調查原住民部落時所拍攝，可知其修補接合時間不會晚於1940年代。

- 
- ① 江蘇省三星村聯合考古隊（王根富等），〈江蘇金壇三星村新石器時代遺址〉，《文物》，2004年2期，頁23，圖53之1。
  - ② 瀋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瀋陽考古發現六十年·出土文物卷》（瀋陽：遼海出版社，2008），頁13。
  - ③ 鈴木重治，〈出土陶磁器にみる修復技法〉，收入《考古學と生活文化》同志社大學考古學シリーズV（京都：同志社大學考古學シリーズ刊行會，1992），頁395-410。
  - ④ 橫濱ユーラシア文化館編，《橫濱ユーラシア文化館》（橫濱：橫濱ユーラシア文化館，2003），頁14，圖1。
  - ⑤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張志忠等），〈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10期，頁46，圖60。
  - 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編著，《北京亦莊考古發掘報告2003-2005》（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彩版58之1。
  - ⑦ 笠原政治編，《臺灣原住民映象—淺井惠倫教授攝影集》（臺北：南天書局，1995），頁150，圖116。

在待修陶器穿孔所需道具，因地區和時代的差異而有所不同。最為原始和便捷的方法是以石片在陶器上揉搓穿洞，如日本繩紋陶器的補修孔即為一例（圖7）；同繩紋時代（14500—300 BC）或彌生時代（300BC—300AD）主要做為木、骨、皮加工道具的棒狀或帶捉手的打製石錐，或許也可應用於陶器穿孔。<sup>⑧</sup> 中國新石器時代大連文家屯玉石作坊曾出土錐頭有磨損痕跡的砂岩石錐（圖8）；<sup>⑨</sup> 江蘇省丹徒磨盤屯亦見可能和軟玉製作有關的燧石石錐鑽。<sup>⑩</sup> 上述錐揉工具雖可應用在低溫陶器的穿孔，卻難以做為施釉的高溫炆器或瓷器穿孔時的有效工具。

依據Hansford的田野調查，1940年代左右北京玉器作坊的匠師是採用弓鑽牽引金剛鑽具的方式穿透玉器，<sup>⑪</sup> 而林巴奈夫則在上述中國近代玉器透雕均是由小穿孔綴合形成的觀察基礎上，指出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透雕玉器可見相同的加工製作痕跡，進而主張以金剛石解玉始於良渚文化。<sup>⑫</sup> 之後，美方發表了類似論點，認為良渚文化和三星堆部分玉器的製作使用了金剛石。<sup>⑬</sup>

文獻記載金剛石至遲在晉代已傳入中國。如《晉起居注》稱：「咸寧三年（277）燉煌上送金剛，生金中，百淘不消，可以切玉，出天竺」；<sup>⑭</sup> 南京棲

⑧ 佐原真，《道具の考古学》（東京：岩波書店，2005），頁461，圖48。

⑨ 岡村秀典，〈中国先史時代玉器的生産と流通—前三千年紀の遼東半島を中心に—〉，收入《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生産と流通の歴史社会学的研究》（福岡：中国書店，1993），頁5，此轉引自：林巴奈夫，《中国古玉器總說》（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頁34。

⑩ 南京博物院等，〈江蘇丹徒磨盤墩遺址發掘報告〉，《史前研究》，2（1985），頁77。

⑪ S. Howard Hansford, *Chinese Jade Carving* (London: Lund Humphries & Co, Ltd, 1950), p. 50.

⑫ 林巴奈夫，《中國古玉器總說》（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頁35。

⑬ P. J. Lu et al., “The Earliest Use of Corundum and Diamond, in Prehistoric China,” *Archaeometry*, 47: 1 (Feb 2005), pp. 1-12.

⑭ 關於中國文獻中的金剛石記載及評述，可以參見：章鴻釗，《石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93-105；以及李約瑟（黃子政等譯），《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頁313-317。

霞區象山七號晉墓也出土了嵌有金剛石的圓指環。<sup>⑮</sup> 唐李林甫等奉敕修《唐六典》則提到波斯和涼州出「金剛鑽」；不僅周密(1232—1298)《齊東野語》曾提及玉人攻玉必用「金剛鑽」鑄鏤，謂可以切玉(卷十六「金剛鑽」條)，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在說明「金剛鑽」時更是明確指「其砂可以鑽玉補瓷」(卷十)。

對於高溫施釉堅緻的陶瓷而言，不僅鋒利的金剛鑽是鍋瓷時的必要配備，利用回轉運動的鑽弓也是不可或缺的道具。利用回轉運動的所謂弓鑽(bow drill)，於歷史上既可用來鑽孔或生火，也是陶瓷鍋補的常備道具之一。依據佐原真所蒐集世界各地弓鑽的使用例看來，西元前十五世紀古埃及已經出現一弓同時牽引三隻鑽頭的高妙操作例，歐洲弓鑽約出現於新石器時代，迄古羅馬時仍可見到，極圈的愛斯基摩人甚至獨樹一格地開發出以口啣承軸的弓鑽(圖9)；直到近代，弓鑽仍然是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土耳其或中國等地常見的鑽孔器具。<sup>⑯</sup> 依據1930年代Rudolf P. Hommel針對中國庶民手工道具的田野調查報告，可知其時上海所見弓鑽主要是由鑽和黑檀木柄所構成，柄端有承軸(握)(圖10)。<sup>⑰</sup> 使用時，左手握軸，右手引弓前後運動，拉弓時鑽右旋，推弓時鑽左旋。十八世紀中國外銷畫家蒲呱(Puqua)繪水粉畫(圖11)，<sup>⑱</sup> 或清末鄒墻祖《風俗圖冊》(圖12)<sup>⑲</sup> 也都描繪了中國鍋瓷匠人使用弓鑽的情景。

除了弓鑽之外，所謂舞鑽(pomp drill)也是利用回轉運動的穿孔道具。此式鑽具亦見於古羅馬時期，日本靜岡縣彌生時代(300BC—300AD)後期登

---

⑮ 南京市博物館(袁俊卿)，〈南京象山5號、6號、7號墓清理簡報〉，《文物》，1972年11期，頁31及圖版伍之2。

⑯ 佐原真，〈手から道具へ・石から鉄へ〉，《図説 日本文化の歴史》1〈先史、原史〉(小學館，1979)，後收入，同氏《考古学千夜一夜》(東京：小學館，1996)，小學館ライブラリー88，頁172-176。

⑰ Rudolf P. Hommel(国分直一譯)，《中国手工業誌》(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92)，頁389-391。

⑱ 黃時鑑等，《中國三百六十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圖23。

⑲ 鈴木敬編，《中國繪畫總合圖錄》3(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頁60。

呂遺跡曾出土舞鑽的橫木，經假想復原後的構造（同圖9-H），與大阪醫生寺島良安於日本正德三年（1712）撰《和漢三才圖會》所載「舞錐」大概相近（圖13）。<sup>⑳</sup> 無論是弓鑽，還是舞鑽，其都是施釉陶瓷施加鋤釘之前穿孔工序的必備道具。問題是，我們從考古出土帶有鋤孔的標本或傳世的鋤補作品，其實無法辨識所穿鑿的孔洞到底是由何種運動鑽具所穿鑿而成？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舞鑽？以往似未有討論，然而應予留意的是，德國柏林私人藏傳戴進（1388—1462）冊頁清楚地描繪著以舞鑽鑽孔以補修陶瓷的場景（圖14）。雖然從畫作本身看來，該冊頁應該不是出自畫家戴進手筆，而有較大可能是十八世紀或稍後時期的冒名偽作，<sup>㉑</sup> 但卻是中國清代亦存在以舞鑽補修陶瓷之如假包換的重要例證，而其鑽具構造與前引《和漢三才圖會》以及狩野養信（1796—1846）、狩野雅信（1823—1880）父子繪《七十一番職人歌合》所見匠人用來穿鑿念珠的鑽具基本一致（圖15）。<sup>㉒</sup> 由於狩野養信父子是以室町時代（1336—1573）土佐光信（1434？—1525）畫、東坊城和長（1460—1529）書詞之《七十一番職人歌合》繪卷作為底本的摹繪，而前述傳戴進（1388—1462）畫亦見同式鑽具，似可推測所謂「舞錐」是十五世紀東亞區域慣用的鑽具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紀初期歐洲鋤瓷婦人也是使用舞鑽（圖16）。<sup>㉓</sup> 另外，從傳戴進畫作畫面還不難想像得知，屬一人行業的鋤補匠人平日以扁擔挑著道具沿途招攬客戶，承接業務後就近在客戶家門前幹活；委託客戶的家境並不富裕，屋頂鋪瓦雖大多脫落露出紮草，然而並未予以修葺。

另一方面，以「口」形金屬鋤釘修繕接合的工技由來已久，亦非修補陶瓷

⑳ 寺島良安（島田勇雄等譯注），《和漢三才圖會》5（東京：平凡社，1986），東洋文庫462，卷第二十四，頁34。

㉑ 德國柏林私人藏傳戴進繪鋤瓷冊葉，是承蒙荷蘭阿姆斯特丹國立美術館（RIJKS Museum, Amsterdam）王靜靈博士的教示，謹誌謝意。關於畫作的年代判斷則是聽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石守謙以及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板倉聖哲教授的意見。

㉒ 石山洋解說，《七十一番職人歌合/職人盡繪/彩畫職人部類》江戶科學古典叢書6（東京：恆和出版，1977），頁74-75。

㉓ C. S. M. Parsons, F. H. Curl, *China Mending and Restoration* (London: Faber & Faber, 1963), pl. 6.

的專利。比如說位於伊朗帕薩加迪 (Pasargadae) 的阿契美尼德 (Achaemenid dynasty) 王朝居魯士二世 (Kyros II, 西元前559—530在位) 宮殿基壇切石即以金屬鋤釘牢固鄰石 (圖17),<sup>24</sup> 東北亞朝鮮半島百濟地區三世紀後半至四世紀中期天安新豐里一號墓木棺也是以鋤釘接合, 日本自五世紀前期以來木棺亦多使用鋤釘。<sup>25</sup> 除了棺槨或木構建物之外, 中國南京仙鶴觀東晉墓 (M6) 出土的鑲金異獸銜杯銅碗滴, 出土時獸前腿爪部原殘斷, 上有修補後以鋤釘連接的痕跡,<sup>26</sup> 遼寧法庫葉茂台遼墓 (M7) 出土的著名玻璃方盤, 其盤面因有裂璽, 故於外緣鑲銀釦, 裂處另以銀片釘鋤。<sup>27</sup>

本文主要的目的, 並非整理世界各地鋤瓷標本及相關技藝, 而是聚焦於中國陶瓷鋤補標本, 企圖觀察其在中國本土或他國出土或傳世鋤補情況, 以便評估部分學者認為中國以外地區出土的中國鋤瓷標本, 多是在中國鋤補後才外銷之瑕疵品說法的正當性。其次, 本文將以中國和日本個別作品或圖像資料為例, 考察鋤釘在特定時代和群體中可能具有的象徵意涵。文末則是再評估歐洲十八世紀新興的鋤瓷術可能是受到中國影響的可能性, 認為其是為因應十八世紀初歐洲硬瓷的出現而引入的補瓷措施。

## 二、東亞鋤瓷史

### (一) 中國

截至目前, 正式考古報導所見中國區域為植入鋤釘而於高溫施釉陶瓷鑽孔的標本, 似乎只能上溯遼代, 此即2014年發掘內蒙古巴林左旗遼上京宮城城

---

<sup>24</sup> 田邊勝美,〈アケメネス朝ペルシアの美術〉, 收入《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卷16 (東京: 小學館, 2000), 頁261, 圖226。

<sup>25</sup> 龜田修一,〈日本の初期の釘、鋤が語るもの〉, 收入《文化の多様性と比較考古學》(岡山市: 考古學研究會, 2004), 頁29-38。

<sup>26</sup> 南京市博物館,《六朝風采》(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頁173, 圖134。

<sup>27</sup> 遼寧省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中國博物館叢書・卷3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3), 圖70。

牆出土的定窯白瓷花口碗（圖18）以及定窯白瓷花口盤（圖19）。前者口沿外壁有二圓孔，其中一孔穿透內壁，另一孔未穿透；後者外壁裂紋兩側有三組鋤孔，並有鐵釘殘留。<sup>28</sup>從花口碗碗心刻劃蓮荷造型和北京市通縣金大定十七年（1177）石宗璧墓出土定窯鉢鉢心花紋相近，可知其相對年代約在十二世紀後期。<sup>29</sup>另外，內蒙古博物館陳列品當中也包括一件標示為呼和浩特和林格爾縣出土，器身植有七只鐵釘的北宋至金代定窯白瓷大鉢（圖20），依據龜井明德的觀察，因該鉢鉢身裂紋密合，顯然並非破裂後的接合，而是預防裂罅持續擴大才植入鋤釘的保固措施。<sup>30</sup>就筆者所得見的資料看來，中國鋤釘陶瓷大致可分二類，一類為高溫施釉細瓷或炆器，另一類屬施釉的甕缸粗器，前者雖也包括部分於裂罅兩端鋤釘、防患裂紋持續開裂的作品，但以已經裂斷但仍可適合的作品為施加鋤釘的主要對象。後者甕缸類或因貯物而容易出現重壓，或因蓄水而有水壓問題，以致於持有人在僅出現裂罅的階段即施以鋤釘，防止裂痕擴大。

於破裂但仍可適合的細瓷施加鋤釘的早期案例，屬非正式考古發掘出土之香港私人藏晚唐九世紀北方白瓷雙魚形穿帶壺（圖21）。該壺口沿原鑲金釦，壺身裂罅處和口肩破裂後適合部位之裂痕兩側均施加鋤釘，由於並無發掘記錄，因此難以確認器體近二十只鐵鋤釘的植入年代。宋金時期帶鋤釘或留有鋤孔的高溫釉炆器屢可見到，就陶瓷的種類而言，既見定窯等高檔瓷窯製品，同時也包括磁州或耀州、景德鎮窯等庶民用器（圖22），看來是其時不分檔次、各類陶瓷都採行的補修接合措施。就目前數量有限且帶有偶然因素的宋金期鋤瓷標本而言，以北方製品的數量居多，並且包括幾件傳出自浙江省臨安皇城遺址的定窯白瓷標本（圖23）。關於後者皇城定瓷標本上的鋤孔，本文傾向其較

<sup>28</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第二工作隊等（汪盈等），〈內蒙古巴林左旗遼上京宮城城牆2014年發掘簡報〉，《考古》，2015年12期，頁91，圖32之3、10；頁91，圖34；頁92，圖36。

<sup>29</sup> 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劉精義等），〈北京市通縣金代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77年11期，頁10，圖5。

<sup>30</sup> 龜井明德，〈カラコルム出土陶瓷器穿孔の意味〉，收入：天野哲也等編，《中世東アジアの周縁世界》（東京：同成社，2009），頁177-178。

有可能是出自南方工匠之手，而不是在北方鋤補後再輸往南方經修繕接合的瑕疵品。

元代鋤瓷標本數量不少，此可以1940年代俄國科學院調查蒙古哈喇和林（Kharkhorum）遺址所得標本為例做一說明。按哈喇和林是蒙古第二代窩闊台汗於1235年建設的都市，毀於1380明軍，是十三世紀後期元代宣慰司副元帥府的所在地。依據C. B. 吉謝列夫等的調查，哈喇和林城內所見磁州窯系釉下褐彩罐等標本，可以清楚看到鋤補所留下的對稱鋤孔（圖24），<sup>①</sup>而若依據半個世紀之後日本專修大學亞洲考古隊複查該遺址出土現藏蒙古國立歷史博物館的約2500件陶瓷標本，可知城內所出陶瓷均屬十四世紀前中期製品，其窯口包括北方磁州窯、鈞窯以及南方景德鎮窯和龍泉窯。當中，確有不少標本留下徑約2毫米之未穿透的鋤孔，個別標本穿孔還附著鐵鏽（圖25）。<sup>②</sup>龜井明德在目驗上述標本之後，做出兩個有意義的提示，即：哈喇和林遺址所採集帶鋤孔標本之品質檔次不一，粗製品亦見鋤補現象，據此可知鋤瓷者應是當地的工匠，遺址近東門地區發現製造金屬作坊遺跡也說明了都城內存在著專業的匠人和作坊；<sup>③</sup>從次檔粗品亦見鋤孔接合痕跡一事，本文同意當地應有以鋤瓷營生之工匠的說法。不過我們也應留意，額納濟河黑水城遺址元代陶瓷可以見到穿透鋤孔和未穿透鋤孔同時存在於同一標本之例，如1927至1935年由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和中國學者等組織的西北科學考察團所採集到的一件元代青花玉壺春瓶頸部殘件，其口沿以下繪蕉葉處有穿透式鋤孔，但下方變形蓮瓣部位的鋤孔則為非穿透式（圖26）。<sup>④</sup>結合前述內蒙巴林左旗遼上京宮城城牆出土的定窯白瓷碗口沿外壁可見兩個鋤孔，但只一孔穿透內壁，另一孔則未穿透（同圖18），看來鋤孔是否穿透器胎還涉及到施作工匠的專業水準，因稍不留意就可能出現貫穿的孔洞。另外，我們從內蒙多倫縣遼聖宗貴妃墓越窯青瓷盒

---

① C. B. 吉謝列夫等（孫危譯），《古代蒙古城市》（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頁187、191-192，以及圖版81之1；彩版壹壹之一。

② 龜井明德編，《カラコルム遺跡出土陶瓷器調査報告書》，第2冊（東京：專修大學文學アジア考古學研究室，2009）。

③ 龜井明德，前引〈カラコルム出土陶瓷器穿孔の意味〉，頁175-178。

④ 作品現藏臺灣臺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筆者攝。

蓋（圖27）<sup>⑤</sup>或包頭市燕家梁元青花瓷碗（圖28）均是在裂罅外襯墊銅片並於銅片植入深及瓷胎的銅釘可知，<sup>⑥</sup>北方蒙古等地區不僅早已存在墊襯金屬片的另類銅補技藝，甚至形成具有特色的區域補修方式。

另外，內蒙古托克托縣徵集的一件至正型青花折沿盤（圖29）<sup>⑦</sup>則是結合了銅片和形似釘書針般呈「冂」形的鐵銅釘補修的另類案例。盤外壁繪蓮花卷草，內側折沿飾波浪紋，內壁六處雲頭開光內畫鴛鴦、鶴、鷺鷥、馬和蓮花，底心為藍地白鴛鴦蓮池，是相揉運用白地青花和青地白花於一器、構圖繁縟的作品。其修繕部位遍及盤壁和底部，從盤背看來可清楚觀察到植入了近30個兩端屈曲的鐵銅釘，釘孔未貫穿內底。由於內底心鴛鴦下部有缺傷，故另襯以銅墊片並以銅釘固定兩端，其上方再施抹褐色漿料。龜井明德認為，該盤所見波浪渦卷紋樣其實混入了明代永樂期的畫風，故其年代可能在近永樂年間（1403—1424）的明代早期。<sup>⑧</sup>無論如何，因屬非正式考古發掘之徵集品，因此儘管從補修的狀況看來其修繕的時間可能相當於或略晚於該盤的燒造年代，但已難確證。

在此有必要再次提示的是，相對於前述哈喇和林遺址銅瓷標本係由當地工匠所為的看法，學界仍存在不同的見解。以上引內蒙托克托縣徵集的青花瓷盤為例，就有學者認為其較有可能是在元大都銅補後再售往托克托縣的商品，<sup>⑨</sup>

<sup>⑤</sup>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蓋之庸等〉，〈內蒙古多倫縣小王力溝遼代墓葬〉，《考古》，2016年10期，頁55-80。但應該說明的是，上引原報告書未報導該青瓷盒蓋，這裡是引自展覽會網站資料：〈2016年“5.18國際博物館日”主會場特展——“夢幻契丹”〉，網址：<http://nmgbw.com/zldt/1306.jhtml>（檢索日期2016/10/11）

<sup>⑥</sup>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包頭燕家梁遺址發掘報告》下（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彩版158。

<sup>⑦</sup> Adam Kessler, *Empires Beyond the Great Wall* (Los Angele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Los Angeles, 1993), p. 139; 另外，該青花瓷盤外盤底銅釘圖片可參見John Carswell, “Kharakhoto and Recent Research in Inner Mongolia,” *Oriental Art*, vol. XLV, no. 4 (1999-2000), p. 25, p1. 14.

<sup>⑧</sup> 龜井明德，〈中國出土元青花瓷の研究〉，《亞州古陶瓷研究》，IV（2009），頁59-60。

<sup>⑨</sup> 弓場紀知，〈鏝で補修された元青花盤—内モンゴルから出土した元青花盤—〉，《陶説》，671（2009），頁38-44。

而這樣的立場和判斷，往往還會作用在埃及福斯塔特 (Fustat) 遺址、印度德里庫特拉菲路沙哈宮 (Kotla Firuz Shah) 遺址，以及下文將會提及之日本馬蝗絆青瓷鋤補工匠之國屬判斷。換言之，類此之持論者，頗傾向將中國以外地區所見鋤瓷標本視為是在中國鋤補後才外銷的補修商品。

入明以來，以鋤釘接合陶瓷仍然是民間通行之具實用性的修繕技藝，但明代後期，施以鋤釘補修的陶瓷有時又成了文人表現古物、營造高古氣氛的道具之一。如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王問繪作於嘉靖三十七年 (1558) 的煮茶圖，畫面中央部位並列的兩件蓋罐當中右側一件即是施以鋤釘補接，蓋罐下方分別擺置帶座的開片釉瓷三足爐和風字形硯等文房具 (圖30)。<sup>④①</sup> 筆者以前曾經指出，風字硯造型和南宋林洪撰《文房圖贊》中名為「石端明」的硯式完全一致；<sup>④②</sup> 江蘇江浦南宋慶元元年 (1195) 張同之墓也出土了同一形制的端硯。<sup>④③</sup> 據此可知，《煮茶圖》中的硯是屬於宋代硯式，亦即明代人心目中的古物或至少是明代倣古之作。其次，考慮到風字硯上方的開片釉瓷既被明代鑑賞家視為是一器難求的宋代官窯最重要的外觀特徵之一，文人畫作也經常以開片瓷釉這一物理特徵來寓意古瓷，並借此營造畫中人物的高古情懷。<sup>④④</sup> 看來佔據畫面顯著位置的施加鋤釘補修的瓷蓋罐，顯然也是畫家刻意安排用來象徵古物的道具，附帶的也將鋤釘補修痕跡視為鑑賞的對象了。

從原大衛德基金會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藏清代早期釉上彩瓷盤，盤內側所繪飲酒高士後方置鋤釘補接的瓷甕 (圖31)，<sup>④⑤</sup> 可知以鋤補陶瓷做為象徵古物的做法持續至清初仍未斷絕，甚至從文人畫作擴及至手

---

<sup>④①</sup>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書畫圖錄》19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頁207。

<sup>④②</sup> (宋) 林洪，《文房職方圖贊》，收入嚴一萍選輯，《百部叢書集成》1370冊·欣賞編 (臺北：藝文印書館)，頁6。

<sup>④③</sup> 南京博物館，〈江浦黃悅嶺南宋張同之夫婦墓〉，《文物》，1973年4期，頁64，圖5。

<sup>④④</sup> 謝明良，〈晚明時期的宋官窯鑑賞與「碎器」的流行〉，收入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經濟史、都市文化與物質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2002)，後收入《貿易陶瓷與文化史》(臺北：允晨文化，2005)，頁361-381。

<sup>④⑤</sup> Stacey Pierson with Amy Barnes, *A Collector's Vision: Ceramics for the Qianlong Emperor*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2002), p. 55.

工藝品，此或可視為是陶瓷圖紋受到文人繪畫或版畫影響的一例。不僅如此，其甚至成為一種格套而出現在更晚期的其他質材製品。如一件十八至十九世紀「富貴平（瓶）安」人物飲酒木雕飾，酒甕上就刻意刻雕出錫釘圖像以為裝飾（圖32）。<sup>④5</sup>

## （二）日本國—從「馬蝗絆」茶碗談起

曾經涉獵日本茶道具史或中國青瓷史的文物愛好者，對於所謂馬蝗絆茶碗應該不會陌生（圖33），<sup>④6</sup>親眼觀賞過的人恐怕也不在少數。

日本江戶時代儒學者伊藤東涯（1670—1736）於享保十二年（1727）撰寫的《馬蝗絆茶甌記》載：「昔安元初，平內府重盛公，捨金杭州育王，現住佛照，酬以器物數品，中有青窯茶甌一事，翠光瑩徹，世所希見，唐陸龜蒙詩云，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或云錢氏有國時，越州燒進，不許臣庶用，故云祕色，豈其是乎，相傳謂之砧手，慈照院源相國義政公得之，最其所珍賞，底有璽一脈，相國因使聘之次送之大明，募代以他甌，明人遣匠以鐵釘六鈐束之，絆如馬蝗，還覺有趣，仍號馬蝗絆茶甌，相國賜之其侍臣宗臨，享保丁未之歲，予得觀之于宗臨九世孫玄懷之家，予固非博古者，然其華雅精緻，宜其為前世將相所尚也，嗚呼傳之自其祖先，賜之自其祖之君，得之自平內府，以到于今，則已五百六十餘年，自慈照公到今亦已向三百年，可謂善傳矣。」<sup>④7</sup>

大意是說，鎌倉期安元年間（1175—1177）武將軍平重盛（1138—1179）施捨黃金給浙江杭州育王山，而當時的住持佛照禪師（1121—1203）回贈給平重盛的禮品當中就包括一件釉色瑩徹、世所罕見的青瓷茶碗。該茶碗後入室町八代將軍足利義政（1436—1490）之手，因碗底有一道裂璽，所以委由聘使

<sup>④5</sup> *Kaikodo Journal* 懷古堂, IX (Autumn 1998), p. 177, pl. 71-1.

<sup>④6</sup> 根津美術館學藝部編，《名画を切り、名器を継ぐ—美術にみる愛藏のかたち—》（東京：根津美術館，2014），圖72。

<sup>④7</sup> 收入：日本寶曆九年（1759）刊《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六〈記類〉，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古義堂版。

攜往明國，希望能尋得同類茶碗。但明代工匠則在裂罅兩側施加六個鐵錫釘後再度送返日本。錫釘形似馬蝗，觀之頗有趣味，因此命名為馬蝗絆茶碗。後來足利義政將該茶碗賜予侍臣吉田宗臨，迄江戶享保十二年（1727）伊藤東涯（1670—1736）於宗臨九世孫玄懷邸宅親眼目睹了這件茶碗，感銘其典雅精巧和流傳經緯，所以寫下這篇《馬蝗絆茶甌記》。

### 1.馬蝗絆茶碗的年代和「馬蝗絆」的語源

大正九年（1920）高橋義雄（箒庵，1861—1937）親自調查、觀摹該被命名為「馬蝗絆」的青瓷碗，同時記錄了其流傳經緯。即：自足利義政→吉田宗臨（據《寬政重修家譜》吉田家後改為角倉家）→室町三井家；高橋氏即是在三井高保男的東京居宅實見該青瓷碗，並將之收錄於《大正名器鑑》。<sup>④⑧</sup>之後，這件青瓷碗在昭和四十五年（1970）由收藏者捐贈東京國立博物館，現屬國家指定的重要文化財。

碗高9.6公分，口徑15.4公分，底徑4.7公分，碗口沿六花，近底處有一周裂罅，自外壁在裂罅兩側施予六個鐵錫釘，釉色青翠，屬俗稱的白胎梅子青釉，是中國浙江省南宋時期龍泉窯所燒造的高檔青瓷。從近數十年來的考古發掘成果可知，龍泉窯梅子青釉約出現於十二世紀末，浙江省松陽縣南宋慶元元年（1195）程大雅墓出土的蔥青厚釉近於梅子青色釉梅瓶，<sup>④⑨</sup>雖可說是龍泉窯梅子青色釉系最早紀年實例，但成熟的梅子青釉則見於同省慶元會溪南宋嘉泰三年（1203）胡紘墓（M1）及其妻開禧元年（1205）吳氏墓（M2）出土品，<sup>⑤⑩</sup>所見標本釉色精湛彷彿馬蝗絆青瓷碗。這就意謂著龍泉窯梅子青釉約出現於十二

---

④⑧ 高橋義雄，《大正名器鑑》第六編（東京：大正名器鑑編纂所，1925），頁113-114。

④⑨ 朱伯謙，《龍泉窯青瓷》（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8），圖88。浙江省博物館編，《浙江紀年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圖210。

⑤⑩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謝西營等），〈浙江慶元會溪南宋胡紘夫婦合葬墓發掘簡報〉，《文物》，2015年7期，頁37-52。

世紀末期而精鍊完成於十三世紀初期，因此像是馬蝗絆青瓷碗般呈梅子青釉調的龍泉窯青瓷的年代，很難上溯到杭州阿育王山佛照禪師做為回禮送予平重盛的安元年間（1175—1177）。也就是說，《馬蝗絆茶甌記》的浪漫記述，恐非史實。

其實，日方學者對於龍泉窯梅子青厚釉的出現年代及其和《馬蝗絆茶甌記》所載流傳時間牴牾不合一事心知肚明，並早在1970年代業已提出疑惑，<sup>⑤①</sup>之後也獲得本國同行的首肯。<sup>⑤②</sup>雖然如此，直到今日日本公開發行的圖錄仍然常見將馬蝗絆青瓷碗的流傳直接連繫到平重盛和佛照禪師的因緣，其偏愛強調國史上浪漫物語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若未做任何的說明或交待，甚至期待地戲稱其梅子青釉應可上溯平重盛（1138—1179）的年代，<sup>⑤③</sup>對於非圈內的一般讀者而言也是有些不太公平。

自1970年三井家傳世的名為「馬蝗絆」的青瓷碗入藏東京國立博物館以來，其被視為流傳有緒的名物茶具兼及國指定重要文化財，就經常出現在各展覽會場和相關圖籍。進入到21世紀，關於馬蝗絆青瓷碗之「馬蝗絆」的最常見也最常被引用的解釋是出自典藏單位人員的解說，即：因錫釘造型有如佇立的大蝗而予命名，<sup>⑤④</sup>該一說法大約是承襲自1980年代同樣是任職東博的矢部良明的見解，<sup>⑤⑤</sup>甚至可上溯十八世紀的，《馬蝗絆茶甌記》。不過在我看來，該一詞彙的源頭應出自中國。

本文在此想予提示的是，明季浙江餘姚朱舜水（1600—1682）在清順治十六年即日本萬治二年（1659）流亡日本，後被江戶藩主德川光國聘為講師，傳授儒學。舜水門生更在日本寶永五年（1708）輯錄「所聞事物名稱」等刊行

⑤① 矢部良明，〈唐物茶碗〉，收入：林屋晴三編，《茶道聚錦》11・茶の道具（二）（東京：小學館，1983），頁119。

⑤② 今井敦（蘇哲譯），〈東傳日本の青瓷茶碗「馬蝗絆」〉，《東方博物》，3（1999），頁32；〈日本における宋磁の受容〉，收入《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6・南宋、金（東京：小學館，2000），頁275。

⑤③ 林屋晴三，《名碗は語る》（東京：世界文化社，2015），頁15。

⑤④ 今井敦，前引〈日本における宋磁の受容〉，頁275。

⑤⑤ 矢部良明，前引〈唐物茶碗〉，頁119。

《朱氏舜水談綺》一書。該書卷下採漢和對照的方式，列舉中國詞彙以及日本相應的事物和讀法，其中〈器用〉篇可見「馬蝗絆 カスカイ」。<sup>56</sup> 這就表明中文「馬蝗絆」即日文「カスカイ」。由於「カスカイ」的日文漢字可寫做「鏃」、「鉸」或「鋏」，指的是呈「冂」形如釘書針造型的補釘，而被命名為「馬蝗絆」的青瓷碗即是因碗外壁有「鏃」補釘，此與舜水門生所輯錄的漢和詞彙對照以及《大正名器鑑》所指明中文「馬蝗絆」即日文的「鏃」（カスガイ）之事一致。就此而言，十八世紀伊藤東涯是直接採用漢文來形容「以鐵釘六鈐束之，絆如馬蝗」的龍泉窯青瓷碗並寫下著名的《馬蝗絆茶甌記》，到了二十世紀，如1970年代初期小山富士夫（1971）<sup>57</sup>和長谷部樂爾（1972）<sup>58</sup>也承襲高橋《大正名器鑑》的說法認為日文「鏃」在中國稱「馬蝗絆」，故而認為該青瓷碗因施有「馬蝗絆」（鏃），所以才被命名為「馬蝗絆」。只是不知何故？此一正解並未被當今日本檯面上的研究者所承襲。

應該一提的是，高橋《大正名器鑑》另援引《茶道正傳集》提到了一件用來擱置茶筴的青瓷「鉸茶碗」，該青瓷碗是因外壁施有兩只銅鍋釘而得名，原為醫師曲直瀨道三所持，後歸織田三五郎，但今下落不明。無獨有偶，近年始發現的《清玩名物記》（小濱酒井家文庫寫本），卻有「茶碗 カスカイ茶ワシ云」，<sup>59</sup>亦即施加鍋釘之鏃茶碗的記載。《清玩名物記》雖是江戶後期的寫本，但從所收錄名物茶具及藏家等資訊推測，其可能成立於室町天文二十三年（1534）至弘治元年（1555）之間，<sup>60</sup>其年代甚至要早過前引伊藤東涯《馬蝗絆茶甌記》。不僅如此，日本傳世的施加鍋補的十三世紀南宋期龍泉青瓷碗還

---

<sup>56</sup> 上海文獻叢書編委會，《朱氏舜水談綺》（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頁387。

<sup>57</sup> 小山富士夫，《陶器講座》6・中國Ⅱ・宋（東京：雄山閣，1971），頁309。

<sup>58</sup> 長谷部樂爾，《原色日本の美術》30・請來美術（陶藝）（東京：小學館，1972），頁54。

<sup>59</sup> 《清玩名物記》收入：筒井絃一編，《茶道學大系》10（京都：淡交社，2001），頁389。

<sup>60</sup> 竹內順一，〈名物記の生成構造—實見と編集のはざま—〉第一部；矢野環，〈名物記の生成構造—實見と編集のはざま—〉第二部，收入：筒井絃一編，前引《茶道學大系》，頁45-108。

見於愛知縣マスポロ美術館藏品（圖34），<sup>⑥1</sup>而該青瓷碗極有可能即《清玩名物記》所載「缺カスカイ」茶碗，故可說是見於茶會的另一件馬蝗絆茶碗。<sup>⑥2</sup>

## 2. 日本出土或傳世施加鋤補的中國陶瓷

如前所述，朱舜水已經指明中國「馬蝗絆」即日文「鋤」，也就是今日中文俗稱的「鋤釘」。雖然，從被命名為「馬蝗絆」今東京國立博物館藏龍泉窯花口碗的釉色參酌龍泉青瓷的編年看來，《馬蝗絆茶甌記》所載錄由浙江佛照禪師餽贈給平重盛的一段佳話難以盡信。不過，「馬蝗絆」銘青瓷碗所見金屬鋤釘到底是中國匠人所為，抑或是由日本所施加？此一涉及鋤瓷技術影響交流兼及陶瓷鑑賞美學的議題，值得予以重視。

日方學者對於本國中世遺跡出土帶鋤孔的中國陶瓷標本，以及部分傳世中國陶瓷所見鋤釘之鋤補工匠國屬問題，意見並不一致，此可以著名的一乘谷遺跡出土之定窯白瓷和龍泉窯青瓷標本為例做點說明。按一乘谷是戰國大名朝倉孝景（1428—1481）於文明初年（1469）在越前建立的首都，後毀於天正元年（1573）和織田信長（1534—1582）的戰火。與本文相關的是，在該遺址總數達一百五十萬片的陶瓷標本當中，只有四件標本留下鋤釘補修的鋤孔，其分別是年代在十二世紀的定窯白瓷碗和鉢（圖35），以及年代為十四世紀的龍泉窯青瓷瓶和匜（圖36）。<sup>⑥3</sup>其中，兩件定窯分別出土於大名所居住的朝倉館和寺院遺跡，而龍泉窯標本則是發現於收藏著不少古董的一位醫生的居宅。發掘者小野正敏認為，當時的人們經常以中國古陶瓷做為財富和威權的象徵，也因此相對於一般陶瓷破損時是以漆接合，對於珍貴的古物則刻意使用醒目的金屬

⑥1 森達也等編，《日本人の愛した中国陶磁 龍泉窯青磁展》（龍泉窯青磁展開催實行委員會，2012），頁52，圖45。

⑥2 竹內順一，〈二つの馬蝗絆〉，《茶道雜誌》，71卷12號（2007），頁36-41；同氏，〈紹鷗時代の茶碗〉，收入：戸田勝久先生喜壽記念論集刊行會編，《武野紹鷗 わびの創造》（京都：思文閣，2009），頁461-462。

⑥3 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編，《陶磁器の文化史》（千葉縣：財團法人歷史民俗博物館振興會，1998），頁104，圖27。

鍋釘來修護以便誇耀其不菲的價值。<sup>⑥4</sup>這也就是說，中國古瓷被做為所謂的「威信財」，其上的鍋釘則是日本消費者刻意選擇且委由日本工匠施行的補瓷方式。此說同時也意謂日本的鍋瓷工藝至少可上溯十五或十六世紀，但未有論證。

相對的，另有一說認為儘管鍋瓷技術是否可能在日本戰國末期至桃山時代（1573—1603）已由中國傳入一事目前仍不明朗，然而該技藝甚至晚迄江戶時代（1603—1867）仍未普及，<sup>⑥5</sup>也因此前述福井縣一乘谷遺跡出土的帶鍋孔的中國古董瓷，正是將在中國業已修繕完成的古瓷輸入日本的考古實例。<sup>⑥6</sup>主張此說的人威信十六世紀的日本希冀中國古瓷，就連在中國施予鍋補的瑕疵品也是他們追逐的標的物，此一說法同樣未有論證，僅止於情境推測。

就考古發掘資料而言，繼福井縣一乘谷遺址，日本出土有鍋釘補修痕跡亦即帶鍋孔的標本，見於東京大學本鄉構內御殿下記念館地點之明初十五世紀龍泉窯青瓷觚殘片（圖37），<sup>⑥7</sup>以及東京汐留遺址（伊達家）出土相對年代在十五世紀的明早期鈞窯鼓釘式盆（圖38）。<sup>⑥8</sup>除了以上兩處江戶時代（1603—1867）遺跡出土標本之外，石川縣金澤市普正寺遺址出土的十四世紀元青花梅瓶殘片不僅可見未穿透器身的鍋孔，從相關部位殘存的鐵鏽釘推測原應施以鐵鍋釘（圖39）。普正寺町做為聚落活動始於十四世紀後期，興盛於十五世紀前期，中期以後因砂丘地形變動而漸衰微，<sup>⑥9</sup>看來遺址出土的元青花標本有較

⑥4 小野正敏，〈戰國城下町の考古學〉（東京：講談社，1998），頁107。

⑥5 森達也，〈龍泉窯青瓷雜感（4）銕留について〉，《陶說》，716（2012），頁57-59。

⑥6 出川哲朗，〈瓷器の銕による修理とその審美的な價值〉，《陶瓷鍋釘暨現代修護科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等，2005），頁18。

⑥7 高島裕之，〈江戸遺跡における明末以前の中國陶瓷—大型製品の受容に関する予察—〉，《貿易陶磁研究》，34（2014），頁140，圖20，其完整器可參見梅澤紀念館藏品（《世界陶磁全集》14・明〔東京：小學館，1976〕，頁131，圖132）。

⑥8 近世貿易陶磁調査、研究グループ，〈近世都市江戸の貿易陶磁器資料集1〉（東京：近世貿易陶磁調査、研究グループ，2013），頁415，圖398；武内啓，〈汐留遺跡（伊達家）における出土貿易陶磁の様相〉，《貿易陶磁研究》，34（2014），頁63，圖6之8。

⑥9 石川縣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普正寺遺跡〉1984；此轉引自：亀井明德，〈石川縣金澤市普正寺遺跡〉，《亞州古陶瓷研究》，III（2008），頁284-285。

大可能是毀棄於十四世紀後期至十五世紀前期，其和前述東京兩處江戶時代（1603—1867）遺址出土的十五世紀古董陶瓷在性質上有所不同。儘管九州陶磁文化館柴田コレクション藏十八世紀前半江戶期五彩婦人撐傘圖盤亦見鋤釘修補（圖40），<sup>⑦⑩</sup>但鋤補年代不明，因此從目前的考古例看來，直到江戶時代（1603—1867）施以鋤釘修護的陶瓷標本限於進口的中國陶瓷。另外，做為今日東京國立博物館前身之東京帝室博物館舊藏一件元代龍泉窯青瓷鳳尾瓶曾因大正十二年（1923）關東大地震而致破損並予修護，其瓶身可以明顯看到以漆接合金繕的痕跡（圖41）。<sup>⑦⑪</sup>有趣的是，之後拆解進行再修護之際卻於瓶內側發現乃是以鋤釘接合補強，此既說明了日本直到二十世紀初仍然習慣針對中國陶瓷施以鋤補，同時地表明鋤補也是日本國內的實用修繕技藝之一，但刻意地將鋤釘施加於瓶內部，不欲外露。相對而言，由高橋義雄編成於1920年代的《大正名器鑑》亦可見到室町三井家初代三井高伴（1659—1729）傳世至今之帶鋤釘的朝鮮王朝井戶茶碗（圖42），<sup>⑦⑫</sup>儘管該井戶茶碗之鋤補年代不明，但絕不晚於1920年代，鋤釘則是被視為鑑賞的對象。

在文獻方面，姑且不論前引《清玩名物記》所見碗外壁施加兩只銅鋤釘的「鉸茶碗」是否可能即愛知縣マズプロ美術館藏龍泉窯碗（同圖34），設若該名物記成立於十六世紀前中期的說法無誤，則日本至遲在室町時代（1359—1573）晚期，已將鋤補瓷碗做為茶道具來使用；天文二十三年（1554）《茶具備討集》稱「鏝茶碗 大壘故也」亦可為一證，<sup>⑦⑬</sup>而可以直接地說明日本鑑賞鋤釘風情者，或許要屬現藏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的一件南宋龍泉窯青瓷長頸瓶了。該瓶頸部位因有裂壘故施以鋤釘補強，依據寬政三年（1791）《鴻池家道具改帳》，則該長頸瓶是被記錄為「カスカヒ」（即鏝）而傳世至今（圖

⑦⑩ 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世界・焔の博覽會プライベート 柴田コレクションIV—古伊萬里樣式の成立と展開—》（佐賀縣：九州陶磁文化館，1995），頁35，圖33。

⑦⑪ 此案例承蒙日本文化廳主任調查官今井敦的教示，並惠賜彩圖，謹誌謝意。

⑦⑫ 高橋義雄，《大正名器鑑》第七編（東京：大正名器鑑編纂所，1926），頁95-96。彩圖參見：三井文庫，《三井の名碗三十撰》（東京：三井文庫，1995），頁30-31，圖11。

⑦⑬ 奧田直榮，〈東山御物〉，收入《東山御物》（東京：根津美術館，1976），頁106-107。

43)。⑦④ 日方學者認為：這不僅是將瓶上的鋸釘視為鑑賞的對象，甚至還刻意強調了瓶上的鋸釘而至以「鋸」為銘。⑦⑤ 不過，如果我們同意前述日文「カスカイ」(鋸)即中文的「馬蝗絆」這一說法，則《鴻池家道具改帳》(1791)「カスカヒ」(鋸)之命名，應該只是沿續了半個多世紀前，《馬蝗絆茶甌記》(1727)「馬蝗絆」的稱呼，不同的只是其將中文「馬蝗絆」的詞彙轉換成了日文的「カスカイ」罷了。

山科道安(1677—1746)著《槐記》所載一段茶人千利休(1522—1591)的記事，既涉及了鋸釘賞鑑，也與日本為何會以「砧」來稱呼南宋龍泉窯青瓷或梅子青色釉一事有關，故為歷來陶瓷史和茶具史研究者所重視。⑦⑥ 《槐記》享保十二年(1727)條首先談到一件青瓷花瓶的流傳史，即自大猷院、東福門院、後西院等之手，後歸仙台大名伊達政宗(1567—1636)所有，接著又說在伊達政宗之前，該青瓷瓶一度是千利休的收藏品：「由於(瓶身)正面有大的裂痕，因此以鋸固定。雖說千利休是那麼風雅的數寄愛物者，對於陶瓷施加鋸釘亦覺驚艷，此或是將鋸補視為景觀來鑑賞吧。由於(瓶身)有裂痕(Hibi)，千利休因此將這件青瓷瓶命名為砧(Kinuta)，因為搗砧時同為響(Hibiki)。」此談及利休所藏青瓷花瓶的裂痕(Hibi)和搗砧時發出聲響(Hibiki)的諧音譬喻。《槐記》的上引說法和認為砧青瓷乃是因龍泉青瓷瓶式和搗練砧杵造型(中文俗稱的紙槌瓶式)相近而得名的看法，正是日本長久以來有關砧青瓷語源的兩種相異但持續並存的推測。無論如何，曾為千利休度藏後歸伊達政宗的那件施加鋸釘的砧青瓷花瓶，現藏東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屬流傳有緒的名品(圖44a)。⑦⑦

⑦④ 大阪歷史博物館編，《豪商鴻池—その暮らしと文化》(大阪：東方出版，2006)，頁50，圖81；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美の求道者・安宅英一の眼—安宅コレクション》(大阪：讀賣新聞大阪本社，2007)，頁140，圖113。

⑦⑤ 出川哲朗，前引〈瓷器の鋸による修理とその審美的な價值〉，頁20。

⑦⑥ 尾崎洵盛，〈砧手青磁考〉1《やきもの趣味》，1卷1期(1935)，頁7-11；2《やきもの趣味》，1卷2期(1935)，頁13-18；3《やきもの趣味》，1卷3期(1935)，頁14-18。小山富士夫，《支那青磁史稿》(文中堂，1943)，收入，《小山富士夫著作集》上・中國陶磁(東京：朝日新聞社，1977)，頁157-158。

⑦⑦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編，《伝えられた名宝 美の継承展》(東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2001)，圖19。

該南宋龍泉窯青瓷瓶是於盤口紙槌瓶瓶頸兩側貼飾摩羯魚繫耳，瓶身有一周明顯的裂痕，現存兩只鋤釘分別位置於魚耳下方裂縫的兩端。截至目前，日方研究者似乎多認為該青瓷瓶上的鋤釘並非日本匠人所為，而是在中國鋤補修護後再輸往日本的瑕疵品，此一見解和「馬蝗絆」銘龍泉窯青瓷碗乃是中國明代鋤瓷工匠修繕後轉販日本的想法本質一致。

筆者並無證據得以論證「馬蝗絆」銘青瓷碗等日本傳世中國陶瓷所見鋤釘的工匠作坊問題，也無意對一乘谷遺址出土帶鋤孔標本的性質進行難以證實或證偽的推論。不過，日前承蒙靜嘉堂文庫美術館惠允提件參觀該傳千利休藏青瓷瓶，<sup>78</sup>在此擬就目驗所得提出看法。雖然今日已難確知山科道安在享保十二年（1727）追溯千利休的記事是否屬實？但可確定的是，後歸伊達政宗現藏靜嘉堂文庫美術館的龍泉窯青瓷盤口瓶，瓶身的一周裂痕和鋤釘至遲在《槐記》撰成的十八世紀前期已然存在（圖44b, c）。就該青瓷瓶的外觀而言，除了魚耳下方即瓶左右兩處呈垂直狀的鐵鋤釘之外，其前後對稱部位裂痕上下亦可見到鋤孔遺痕，但不知是刻意拔除還是因鏽蝕脫落而以漆填充彌平（圖44d, e）。換言之，該青瓷瓶原先是在器身等距四分的交界處施以鋤釘，現存的兩只鋤釘在左右魚耳下方，另兩只鋤釘業已不存但從鋤孔位置可知鋤釘原施加於瓶前後中心部位。應予留意的是，瓶身一周裂痕均填施以漆，但若以魚耳下方現存鋤釘為界，前半部半圓形裂痕及中央部位的鋤孔內填褐色漆，而後半部半圓形裂痕及中央部位的鋤孔則填施以和龍泉青釉相近的青綠色漆。另外，瓶的圈足足牆亦經切削打磨成著地處細窄的造型並上漆，髹漆之後自有一番秀雅氣象（圖44f）。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照明設備觀看瓶體內部，可以清楚地觀察到一周以褐色漆接繼修繕的痕跡。因此，瓶身外觀的一周裂痕並非只是胎釉裂璽，而是瓶體一折而二斷裂後的接補隙縫。

依據以上目驗所得，可以嘗試想像復原該青瓷瓶身自斷裂以迄修護的過程。即瓶身現存鋤釘之間滿佈網狀開片的部位是造成瓶體斷裂的撞擊點。斷裂處先以漆接合，進而等距四分在瓶前後左右處施加鐵鋤釘。由於瓶圈足曾經磨

---

<sup>78</sup> 2016年7月28日，承蒙靜嘉堂文庫美術館河野元昭館長和該館主任學藝員長谷川祥子女士的協助，允許筆者提件目驗。謹誌謝意！

切和髹漆，因此或可推測圈足加工改裝和以漆接合器身者，是來自同一匠人或作坊所為。其次，若以現存兩只銅釘為界，承撞一方器表裂隙施褐漆，對側一方則填充和龍泉色釉相近的青綠色漆，如此一來銅釘位置既顯得協調，連帶使得瓶體裂縫所填施之不同色漆在變化中帶著秩序感。本文不厭其煩地描述這件青瓷瓶的修繕細節，其實是有意突顯一個現象，即中國在清代之前極少見到以漆接著補修陶瓷之例，而講究銅釘位置對稱疏朗的審美構思也和中國大多著意於耐用牢固機能，動輒在補修陶瓷上方施加有如節足蜈蚣般多只金屬銅釘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尤應注意的是，以漆接繼斷裂陶瓷再施銅釘之例，還見於前引室町三井家初代三井高伴（1659—1729）舊藏朝鮮王朝十六世紀大井戶茶碗（銘須彌）（同圖42），或京都北野天滿宮傳世的一件十四世紀龍泉窯青瓷鳳尾瓶（圖45a）。前者整體切割成四等分再予接合，口沿處以漆修繕並施銅釘，傳稱原係古田織部（1544—1615）所有，慶長年間（1596—1615）歸堺之泉屋，後輾轉入室町三井家傳世至今。<sup>79</sup> 後者龍泉青瓷鳳尾瓶之口沿缺損處新補部位有「永樂」印銘（圖45b），可知其係由十九世紀中後期京都著名陶工永樂和全（1823—1896）所修繕。<sup>80</sup> 另外，如靜嘉堂文庫青瓷瓶般在燒成後陶瓷之圈足部位薄削加工再髹以漆的作法也是日本茶道具史上屢見不鮮的事例，如現藏根津美術館的一件朝鮮王朝十六世紀井戶茶碗，即是於燒成後的圈足切削十字紋，再於切削處髹漆；據內箱墨書可知為駿河守正勝舊藏傳世品，銘「古織割高台」，傳稱原係古田織部（1543—1615）所持有，但斲切加工塗漆的年代不明。<sup>81</sup>

### （三）臺灣

<sup>79</sup> 高橋義雄，前引《大正名器鑑》第七編，頁95-96。

<sup>80</sup> 尾野善裕，〈北野天滿宮所藏青磁貼花牡丹唐草文花瓶の朱漆銘と修理〉，《學叢》，31（1999），頁101-108。

<sup>81</sup> 根津美術館編，《館藏茶碗百撰》（東京：根津美術館，1994），圖25及頁166解說。

國運多舛的臺灣，於十七世紀經歷了荷蘭、西班牙和鄭氏集團的統治。後者以臺灣為反清復明及貿易基地，祖孫三代在臺灣共二十二年（1661—1683）。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國在鄭成功部將施琅協助下派兵進攻臺灣，鄭克塽戰敗投降，首次將臺灣納入中國版圖。1894年日清爆發甲午戰爭，翌年（1895）簽定的馬關條約清國將臺灣割讓予日本，迄1945年二戰結束日本敗戰投降，臺灣一度歸盟軍托管，之後又進入自中國潰敗逃難來臺的國民黨軍的統治期，直到1992年總統大選，臺灣才漸脫離由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因此，臺灣的居民除了南島語系等原住民之外，主要還包括漢人和日本人，是個由原住民和移民共同組成的國家。

1903年（日本明治三十六年）曾任職臺灣總督府民政局的佐倉孫三著《台風雜記》所收〈釘陶工〉條載臺灣本島「凡飲食器具，用陶瓷器，是以補綴其既破壞者，自得妙。有釘陶工者，以小錐穿穴其兩端，以金屬補綴之，肅然不動，且有雅緻。日人之始上陸者，皆稱其巧妙，競使補綴之，甚有故毀完器而綴之者，亦好奇心之所迸耳」。<sup>82</sup> 這段文字不僅清楚說明了在鍋孔植入金屬釘，同時表明此時日本人對此一補瓷技藝頗為陌生，卻又認為鍋釘「有雅緻」，其鑑賞風情顯然是日本文化史上茶人鍋釘鑑賞的沿伸。據此可以推測，日治時期臺灣的鍋瓷技藝應該來自清國統治下的大陸移民，而日本民眾則將鍋補視為具有異國情調的另類技藝。另外，《安平縣雜記》也記載了補鍋、補碗、補磗、補甕等匠人，其中「補碗司阜」是「以銅釘兩邊，綰之使不相離，工價每釘十文、五文不等，非用鑽石不能引孔」。<sup>83</sup>

於臺灣施以鍋釘補修的陶瓷實例不少，現藏臺北市中山堂書有「江山樓」字銘的日本製釉上彩花口碗即為其中的一例（圖46）。<sup>84</sup> 由於江山樓開張於1917年，是日本時代大稻埕著名的飯店之一，而中山堂的前身則是為紀念日皇裕仁登基（1926），於1936年竣工的「臺北公會堂」，因此可以推測該粉彩碗

<sup>82</sup> 佐倉孫三，《台風雜記》（臺北：臺灣銀行，1961），頁51-56及陳馨，〈陶瓷修復技術之鋸釘補瓷技術的起源發展及其相關〉，《文博》，2006年3期，頁50。

<sup>83</sup> 不著撰人，《安平縣雜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86。

<sup>84</sup> 筆者實見攝影。

之鋤釘補修年代約在1936年之後不久；於貌不出眾的日用陶瓷施以鋤釘，正反映了此時臺灣居民生活是相對的儉樸而惜物。此外，若依據近年簡榮聰訪談臺灣補瓷藝人黃金豹等人的報告，則鑽釘還需塗抹花生油，以利滋潤易鑽並可避免鑽旋時產生高熱。不僅如此，瓷片逗合時或鑽孔施加鋤釘後還需塗抹黏著劑。黏著劑的配方因地區而異，一般是以糯米糊為之，但西部平原海口地區因盛產蚶，故採用「蚶涎」（一說「蚶醬之汁」）和糯米糊以為黏著。<sup>85</sup> 鋤瓷之外，亦以鋤釘補修玻璃器皿（圖47）。<sup>86</sup>

#### （四）韓半島

就如中國和日本國以及世界許多地區般，韓半島也是早在新石器時代已經出現於破裂陶器上穿孔，以植物纖維或皮革穿入孔洞緊縛接合的案例，如首爾市江東區漢江流域新石器時代岩寺洞第5號居住址出土的陶甕即為其例（圖48）。<sup>87</sup> 其次，漢江南推測是百濟最初都城的風納土城遺址出土的鉛綠釉器蓋也見穿孔補修痕跡（圖49），其相對時代為漢城1期（三世紀後半）。<sup>88</sup>

另一方面，本文仍未掌握韓半島以鋤釘植入高溫施釉器胎的起始年代，而相關文獻記事似亦晚迄十八世紀才出現。朝鮮王朝哲學家、實學派北學論的主要代表洪大容（湛軒，1731—1783）著《湛軒書》提到韓半島日常器用以瓷器為主，金屬製品次之，「其磁器之破者，從外施鐵釘。嘗見施釘者，以鐵鑽鑽之，架釘而椎之，頃刻而完，但鑽不透內，釘固不退」。<sup>89</sup> 從「鑽不透內」一

<sup>85</sup> 簡榮聰，《臺灣碟盤藝術》（臺北縣：臺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2001），頁160-163。

<sup>86</sup> 鄭文彰，《臺灣早期飲食器物》（臺南縣：臺南縣文化局，2002），頁40。

<sup>87</sup> 國立中央博物館，《岩寺洞》國立博物館古蹟調查報告第二十六冊（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1994），頁8，彩圖4；頁181，圖69之1。

<sup>88</sup> 김오영, 박지은, (2009)《風納土城》, 서울역사박물관, 한신대학교박물관, pp. 12, 159 此轉引自：梁泌承，《陶磁器修理復元事例研究》（公州：公州大學校大學院文化財保存科學科博士論文，2014），頁33，圖11。

<sup>89</sup> 洪大容，《湛軒書》外集·燕記·卷十。此參見：方炳善，《조선후기 백자 연구》（서울：一志社，2000），頁181。

語可知，湛軒所敘鋤瓷與同為東亞的中國、日本、臺灣相似，即只在器表植入不穿透器壁的鋤釘。

其次，撰有〈華東瓦類辯證說〉的李五洲（圭景，1788—1865）也提到鋤補，即「青畫甕非則白，破則補以鐵，用錐作穴，釘以細鐵，揮推生風其聲錚然不碎，可謂巧手」（《五洲衍文長箋》卷二十七）；同氏收入《五洲書種全部》的〈補綴破窯法〉條亦稱「取破片相附合，以金剛鑽穿孔，綴以銀銅絲」（《五洲書種全部》），這裡明確提及金剛鑽頭錐具。另外，從徐有渠（1764—1845）《熱河日記》之「中國瓷器破缺者不棄，皆外施鐵釘為完器，但所未可曉者，釘不透內而緊含不退，襯貼無痕」記事可知，<sup>90</sup>韓半島此一釘不透內的鋤補技藝應該源自中國。

### 三、中國和日本的鋤釘技藝、鑑賞及其象徵意涵

從筆者所能掌握的資料看來，中國歷史上於待修的低溫陶器胎體穿孔，再以植物纖維或鐵絲等貫穿緊縛的接合修理方式由來已久。不過，目前所見於高溫施釉瓷器鑽孔而後植入兩端屈曲金屬釘的鋤補技術，私人藏品雖可上溯九世紀晚唐時期（同圖21），但考古發掘標本則要晚到十世紀（同圖27）。一般而言，中國區域施以鋤補的陳設類陶瓷或碗盤等細瓷之器體大多已經斷裂，但間可見到如前述日本傳世「馬蝗絆」銘碗或「鏃」銘長頸瓶般只因裂擊而施加鋤釘之例，因此是否於斷裂器體施加鋤釘一事並不足以做為判別鋤釘工匠國屬的絕對依據。

問題是中國區域修繕陶瓷的方法頗為多元，補修痕跡醒目、不甚美觀的鋤瓷工法主要還是針對開裂嚴重製品的一種實用而牢固之接合方式，並且往往還因損傷陶瓷的性質種類或毀損情況而施以相異的補修，如缸甕裂縫以瀝青充填修補（〔宋〕周密《志雅堂雜鈔》），也有以脂灰來補壘器（〔宋〕孫升《孫公談圃》）。明代人之於宋代古瓷的修繕更是講究，如以渚樹汁粘補定窯，以蛋清和竹瀝熬成膏狀來補官窯（《墨娥小錄》），並以蠟補破處（周暉輯《金

<sup>90</sup> 方炳善，同前引《조선후기 백자 연구》，頁192。

陵瑣記》)，對於明代人特別是嗜愛賞玩古物的文人而言，鋤補並非是修護古瓷的最佳手段。如前所述，鋤補瓷或鋤補痕跡是明代文人心目中古瓷的象徵記號，也是畫家營造畫作高古氛圍的道具，與此同時，文獻卻也顯示當做為鑑賞的古瓷有所損傷時，一般多小心翼翼地以各種接著劑予以黏合，不敢措意模擬古人或採用其時對待實用雜器般以醒目的鋤釘接補；清宮傳世的大量宋代名窯陶瓷幾乎不見鋤釘修補例，也說明了鋤補對象具有選擇性，因此在明清時期賞鑑用的宋代名瓷往往位置於鋤補行列之外。就此而言，前引《馬蝗絆茶甌記》明代工匠在由足利義政（1436—1490）遣使送來的南宋龍泉窯青瓷碗上施以鋤補後再度返還日本之情節，其實並不符合明代人針對貴重古瓷所慣常採用的補修方式，而中國區域也比較少針對並未斷裂僅止出現墨痕的精緻細瓷施以鋤釘牢固補強。另外，據說東博藏「馬蝗絆」銘碗，乃是裝盛於為其量身定製的高檔中國製內鋪緞子之皮胎黑漆圓箱當中，表明該青瓷碗是慎重地自中國攜入日本之物。<sup>91</sup> 雖然漆箱的年代仍有待確認，不過設若漆箱確實是為該青瓷碗而製作的收貯容器，則類此之高規格待遇恐怕不適用於施加鋤釘的所謂瑕疵品之上。

然而，這並不是說前引靜嘉堂文庫美術館青瓷盤口魚耳紙槌瓶因係器身折斷為二而後再予接合，所以一定要屬中國區域作坊所為。除了該瓶瓶身疏朗但錯落有序的鋤釘排列方式異於一般常見的中國鋤補瓷之外，鋤補之前以漆接合黏結的工法似亦不見於清代以前的中國。截至目前，筆者未曾接悉中國區域清代以前考古出之以漆接合的陶瓷標本，而明代文獻雖見不少陶瓷補修記事，但似亦未見以漆黏結修繕之例。反觀日本，除了新石器時代繩紋陶器以漆接補例子之外，甚至遲在鎌倉時代（1185—1333）已有以漆補接高溫施釉陶瓷實例，但是直到中世期以漆接合出土例均限於進口的中國陶瓷，亦即是以相對貴重的進口陶瓷為修護的對象，如九州福岡推定屬觀世音子院金光寺遺跡出土的元代景德鎮樞府釉碗，或同遺跡伴出的中國黑釉盞均屬以漆接繼修繕的考古實例。<sup>92</sup>

<sup>91</sup> 今井敦，〈南宋の青磁について〉，《此君》，3（2011），頁27。

<sup>92</sup> 九州歷史資料館，《大宰府史跡—昭和五十三年度發掘調查概報—》（1979）。此參見：森田勉，〈「樞府磁」に關する 二、三の資料〉，收入：《大宰府陶磁器研究》（福岡：森田勉氏遺稿集・追悼集刊行會，1995），頁119-120。

另外，我們也不宜忽視前引石川縣普正寺遺跡出土，可能是毀棄於十四世紀後期至十五世紀前期之帶有鋤孔的元代青花瓷標本所透露出的訊息（同圖39）。從日本的考古資料看來，十五世紀後期遺跡已見較多的中國青花瓷器，至十六世紀青花瓷的數量更大幅增加，成為遺跡出土中國陶瓷的主要種類。<sup>93</sup> 文獻記載東城坊秀長日記《迎陽記》日本康曆二年（1380）六月九日條已見足利義滿等貴胄赴二條良基邸第舉行「花御會」時，眾人所持花瓶中已包括有「茶碗染付」（ちやはんそめつけ），即青花瓷瓶。<sup>94</sup> 永享九年（1437）《室町殿行幸御飾記》亦見青花瓷「水覆」、「下水」和「茶碗」等少數幾件作品，<sup>95</sup> 然而上述文獻記載雖足以說明元末明初青花瓷器確曾輸入日本並成為貴族階層使用的用具之一，但相較於成書於十五世紀記錄將軍家中國文物鑑賞和收藏的《君台觀左右帳記》所反映之當時對於宋代黑釉盞等單色釉瓷的鑑賞，就顯得微不足道，未能成為鑑賞陶瓷的主要對象。這樣看來，普正寺町出土的鋤補元青花恐怕不會是日本消費者因故損傷後送回中國修繕，並再度歸返日本這般曲折的假想案例。從日本本島至少有二十處遺址（三十九個地點）出土有元青花標本一事看來，<sup>96</sup> 也難以想像十四世紀的貿易商人會以鋤補的瑕疵青花瓷販售日本，同時又期待能夠博得日本消費者的喜愛，尤其是在日本社會迄未形成如後世佗茶開山奈良稱名寺僧村田珠光（1423—1502）以來體驗冷、枯、粗相之佗茶陶瓷鑑賞觀的情況之下更是如此。換言之，普正寺町出土的帶鋤孔元代青花瓷標本應有較大可能是在日本進行鋤補的考古實例，然而不知何故，

<sup>93</sup> 謝明良，〈十五至十六世紀日本的中國陶瓷鑑賞與收藏〉，原載《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7（2004），後收入《貿易陶瓷與文化史》（臺北：允晨文化，2005），頁323。

<sup>94</sup> 赤井達郎等編，《資料日本美術史》（京都：松柏社，1989），頁159。另，矢部良明，〈元時代の染付とその評價の顛末〉，《古美術》，67（1983），頁94-95。

<sup>95</sup> 佐藤豊三，〈室町殿行幸御飾記〉，收入《東山御物》（東京：根津美術館，1976）；大河內定夫，〈近世の大名茶における染付について〉，《金鯢叢書》9（東京：思文閣，1982），頁468-469。

<sup>96</sup> 參見：龜井明德等，〈日本出土の元青花瓷資料集成〉，《亞州古陶瓷研究》，III（2008），頁1-304；同氏，〈日本出土の元青花瓷の諸問題〉，《亞州古陶瓷研究》，IV（2009），頁75。

此一鍋補技藝並未獲得日本區域的繼承和發揚，因此也不排除鍋瓷者或是出自渡海東瀛的中國匠人之手。

暫且不論鍋瓷技法的傳播或鍋孔是否穿透器身等細部特徵，考古發掘資料顯示，日本之外另有許多國家出土有帶鍋孔的中國陶瓷標本，如斯里蘭卡曼泰 (Mantai) 遺址的九至十世紀標本<sup>⑦</sup> 或埃及福斯塔特 (Fustat) 遺址十一世紀至十二世紀定窯白瓷標本即為實例。<sup>⑧</sup> 若以景德鎮元代青花瓷為例，則阿拉伯哈伊馬角 (Rasalkhaimah) 朱爾法 (Julfar) 中世古城遺址、<sup>⑨</sup> 印度德里庫特拉菲路沙哈宮遺址 (Kotla Firugshan) <sup>⑩</sup> 以及前引福斯塔特 (Fustat) 遺址都可見到。<sup>⑪</sup> 尤可注意的是，時為琉球王國之今日沖繩今歸仁グスク遺跡 (圖50) <sup>⑫</sup> 和浦添原グスク遺跡 (圖51) <sup>⑬</sup> 也出土了帶鍋孔的青花瓷和青瓷等元代十四世紀標本。因此，石川縣普正寺遺跡出土的帶鍋孔元代青花瓷殘片也應該置於此一

---

⑦ 佐々木達夫，〈インド洋の中世陶磁貿易が語る生活〉，《上智アジア學》，11 (1993)，頁104-105。

⑧ 櫻井清彦等編，《エジプト・イスラーム都市アル=フスタート遺跡發掘調査1978~1985年》(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92)，頁284。相關討論可參見：謝明良，〈關於鍋釘補瓷術〉，收入《陶瓷手記 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臺北：石頭出版，2008)，頁177-189。

⑨ 佐々木達夫，〈十四世紀の染付と釉裏紅はどのように出土するか〉，收入榑崎彰一先生古希記念論文集刊行會編，《榑崎彰一先生古希記念論文集》(京都：真陽社，1998)，頁467-477。以及畢梅雪 (Michèle Pirazzoli)，趙冰譯，〈哈伊馬角酋長國朱爾法古城遺址出土的十四—十六世紀遠東陶瓷：斷代與評估經濟和文化狀況的參考〉，《法國漢學》，4 (1999)，頁325-337。

⑩ Ellen S. Smart, "Fourteen Century Chinese Porcelain from a Tughlog Palace in Delhi,"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 41 (1995-1977), pp. 199-230.

⑪ 櫻井清彦等編，前引《エジプト・イスラーム都市アル=フスタート遺跡發掘調査1978~1985年》，頁284-285。

⑫ 龜井明德等，〈日本出土の元青花瓷資料集成〉，《亞州古陶瓷研究》，III (2008)，頁222，圖50；金武正紀，〈元青花龍文壺〉，《今歸仁グスク》，2 (2008)，無頁數。

⑬ 浦添市教育委員會，《浦添原遺跡—浦添中學校校舍改築事業に伴う發掘調査報告書》(浦添市：浦添市教育委員會，2005)，圖版36之41。宮城弘樹，〈グスク出土陶磁器流通の一考察〉，收入：龜井明德さん追悼文集刊行會，《龜井明德氏追悼・貿易陶磁研究等論文集》(光邦：2016)，頁260，圖4。

貿易消費網絡中進行評估，而上述案例應該均屬當地作坊所進行的補修。就此而言，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以漆接合並施加鋤釘的傳千利休藏青瓷瓶，就有可能是由日本作坊所加工補修，而該青瓷瓶圈足磨削髹漆之舉措也相對契合日本茶人的趣味。

儘管目前已難證明該青瓷瓶是否曾經千利休（1522—1591）度藏。不過，千利休的弟子山上宗二（1544—1590）之《山上宗二記》記載東山殿（足利義政〔1436—1490〕）舊藏的一件被評為天下無雙的「三日月」茶壺，在傳至室町幕府執事三好長慶（1522—1564）一族三好實休手中時，因戰亂而於河內高屋城破裂成六塊，經千利休補修後歸予三好的家老。該一經修繕的茶壺一度以三千貫的天價抵押給太子屋，後歸織田信長（1534—1582）所有。<sup>⑩</sup>雖然該壺因毀失於本能寺之變而未能流傳下來，因此無從得知其確實的補修方式，卻也表明千利休還是一位補修陶瓷的巧匠，而相傳天正十八年（1590）千利休在小田原所做的竹尺八花插裂縫處亦施加金屬鋤釘（圖52），<sup>⑪</sup>雖然目前已難明確鋤釘補修的確實年代，不過於永祿元年（1558）茶會登場的一件筍形花器有十三或十四處鋤釘。<sup>⑫</sup>應予一提的是，日本自五世紀前期木棺即常見以鐵鋤釘接合牢固，<sup>⑬</sup>而其技術則有可能來自朝鮮半島釜山、金海地區，<sup>⑭</sup>但日本古墳時期和朝鮮半島南部墓葬以直接敲擊的方式將鋤釘植入木材的技法，和使用金剛鑽於高溫施釉陶瓷鑽孔而後施加鋤釘的做工不可同日而語。另外，從意匠構思而言，傳千利休或其師輩武野紹鷗（1504—1555）所作竹製花器所見金屬鋤釘，還是比較接近日本傳世的中國陶瓷鋤補例。

相對於靜嘉堂文庫美術館青瓷瓶是斷折後以漆接繼再施鋤釘的補修方式，前引「馬蝗絆」銘或「鏃」銘等十八世紀傳世至今的南宋龍泉窯青瓷則是在器

<sup>⑩</sup> 桑田忠親，《茶道爐邊ばなし》，收入《桑田忠親著作集》8（東京：秋田書店，1980），頁287。

<sup>⑪</sup> 村井康彥編，《茶道聚錦》3・千利休（東京：小學館，1983），圖108、109。

<sup>⑫</sup> 《松屋會記》收入千宗室等《茶道古典全集》第9卷（京都：淡交社，1956），元祿元年八月三十日條。

<sup>⑬</sup> 龜田修一，前引〈日本の初期の釘、鏃が語るもの〉，頁29-38。

<sup>⑭</sup> 岡林孝作，〈古墳出土鏃の使用法〉，奈良縣立橿原考古學研究所編，《橿原考古學研究所論集》，16（2013），頁111-122。

身未斷裂的壘痕上施以鍋釘，而中國區域相對少見到在瑕疵程度如此輕微的細瓷施加醒目鍋釘之例。結合天文二十三年（1554）《茶具備討集》、享保十二年（1727）《馬蝗絆茶甌記》、寬政三年（1791）《鴻池家道具政帳》以及《槐記》享保十二年（1727）條的相關記事，可知日本約在十六世紀中期開始將陶瓷上的鍋釘視為鑑賞的對象，並且持續到十八世紀甚至今日依然保留著這樣的賞玩風情。問題是，鍋釘賞鑑果真是日本獨創的鑑賞美學嗎？

我們應該留意，前引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王問繪作於嘉靖三十七年（1558）的《煮茶圖卷》，畫面中央部位並列的兩件蓋罐當中右側一件即是施以鍋釘補接，蓋罐下方分別擺置寓意宋代官窯的開片釉瓷三足爐和宋式風字形硯等文房具（同圖30）。因此佔據畫面顯著位置的施加鍋釘補修的瓷蓋罐，顯然也是畫家刻意安排用來象徵古物的道具，此表明中國區域至遲在十六世紀中期，已將鍋釘補修痕跡視為鑑賞的對象了。

事實上，晚明變形主義畫家陳洪綬（1598—1652）也擅長利用碎器或鍋釘來營造畫作的高古情境。如他作於萬曆四十七年（1619）的《撫古冊》第一頁所見植栽歲寒三友布滿冰裂開片的瓷盆，盆上方部位就描繪出數只鍋釘（圖53），<sup>⑩</sup> 這幅畫作不僅以常見於宋代官窯青瓷的開裂紋理來寓意高古，也刻意用鍋釘來突顯瓷盆的古老年代。如前所述，明代文人或鑑藏家均迴避以鍋釘來補修珍貴古瓷，然而鍋釘修補術卻是宋代或之前人們對於其時破損陶瓷經常採用的修繕方式，因此陳洪綬對於古時和他所處時代陶瓷的補修方式顯然有所認識，也不排除他曾親見過出土或傳世施加鍋補的古瓷，故而採取了以鍋補瓷來營造高古氛圍的創作策略。

從目前的資料看來，十七世紀伊萬里燒釉上彩冰梅紋，或荻藩主毛利家御用的荻市松本窯燒造的人工著色白釉開片瓷應是受到明代後期碎器的影響，而晚明時期風行的瓷釉滿布開片紋理的所謂碎器或碎器圖像則又是時人對於一器難求之宋代官窯開片瓷釉鑑賞和憧憬下的產物。<sup>⑪</sup> 巧合的是，鍋補雖也是明代

---

<sup>⑩</sup> 翁萬戈編著，《陳洪綬》中卷·彩圖編（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7），圖8。

<sup>⑪</sup> 謝明良，前引〈晚明時期的宋官窯鑑賞與「碎器」的流行〉，頁361-381。

民間日用甕缸等粗器經常採行的實用而牢固之補修方式，然而在文人畫作中的銅補瓷同時也意謂著古物，成了宋代等古陶瓷的象徵物。日本區域在十六世紀興起的陶瓷銅釘賞玩風情，極有可能也是受到明代文人對於銅瓷之獨特詮釋的啟發。就此而言，裝盛在高檔漆箱的東博藏「馬蝗絆」茶甌（同圖33），或被比定是《清玩名物記》所載「鉢カスカイ」のマスプロ美術館藏銅補龍泉窯花口碗（同圖34），既有可能是日方部分人士在理解到明代文人將銅補瓷做為古物象徵的前提下所刻意購求的文化商品，也有可能是明代商人為謀利而有意識地以文人圈時尚的銅補古瓷輸出日本。當然也不排除是日人為倣效明人趣味而在日本進行銅補的可能性。中日兩國的不同之處是，中國區域陶瓷上的銅釘不過是特定時段文人圈中用以象徵古物的圖像記號，日本區域則將之發展成茶道史上具有拙趣的賞鑑對象，成為今日日本文化史著述所津津樂道之體現桃山時代以來具有日本國族鑑賞美學的指標例證之一。尤其重要的是，上述中日兩地賦予陶瓷銅釘的象徵意涵和賞鑑態勢，是未見於其他地區的事例，是世界銅瓷史上一個特殊的文化現象。

#### 四、南亞和中東銅瓷例

##### （一）南亞

##### 1. 德里庫特拉菲路沙哈宮（Kotla Firuz Shah）遺址

1970年代，原本關注印度莫兀兒（Mughal）帝國巴布爾（BaBar）為其孫阿克巴（Akbar，1556—1605）所留回憶錄《巴伯爾那馬》（Bābarnāma）插繪所見中國瓷器的Ellen Smart調查了印度德里庫特拉菲路沙哈宮（Kotla Firuz Shah）遺址牆壁下所發現的六十餘件元代十四世紀中期景德鎮青花瓷。庫特拉菲路沙哈宮建造於菲洛士沙·圖格烈蘇丹（Sultan Firūz Shāh Tughlaq，1354）時，1398年毀於帖木兒（Timūr）之手。其中，有四十餘件標本以鑄鑽圓點的方式連綴成阿拉伯文（Nasta’liq Letters）「皇廚」；兩件鑄「王室廚房財物」字銘（圖54），報告者因此推測這批中國青花瓷標本有可能屬庫特拉菲沙哈宮王家廚房之物，

另從破損情況看來有的是因刻意毀損而廢棄的。<sup>⑪</sup> 值得注意的是，當中包括四件帶有銅補時所鑄鑿銅孔的標本（圖55）。儘管報告者並未針對標本銅孔遺痕進行詳細的描述，但從圖版已可清楚看出庫特拉菲路沙哈宮遺址出土元代青花瓷標本上的銅孔屬穿透器壁的孔洞，據此可知，其補修接合方式若非是植入釘爪尖端穿透器壁的銅釘，則應是將金屬線等穿入孔洞而後繫綁接合而成，而此一接合補修方式明顯和前述東亞中國、日本或臺灣等區域銅瓷時，銅孔大多不穿透器壁，只在器表單面植入銅釘的工藝有著根本上的區別。因此，庫特拉菲路沙哈宮的元青花銅孔標本不會是在中國補修後再販售而至的瑕疵商品，而應是當地或鄰近地區匠人修護接合之例。另外，從鑄鑄圓孔連綴表示器物擁有者阿拉伯文字的做法，亦見於阿拔斯一世於1611年贈送給阿德比爾聖寺的元青花瓷（圖56），<sup>⑫</sup> 說明中東等地穆斯林既熟悉鑄孔技藝，也經常以鑄孔連綴文字。

## 2. 斯里蘭卡曼泰（Mantai）遺址

印度洋上著名貿易轉運站斯力蘭卡（Sri Lanka），在中國古籍稱為師子國，其自阿育王時期即是連結孟加拉灣和阿拉伯海的樞紐。島上曼泰遺址（Mantai）曾經考古發掘，出土了中國北方晚唐九世紀白釉綠彩鉛釉陶等製品，<sup>⑬</sup> 據說其中也包括帶銅孔的中國陶瓷標本，其年代可上溯晚唐時期，<sup>⑭</sup> 然詳情不明。從印度以及次節將提及的中東銅瓷例標本看來，曼泰遺址帶銅孔標本之銅孔可能亦屬穿透式孔洞，但仍有待查證。

---

<sup>⑪</sup> Ellen S. Smart, “Fourteen Century Chinese Porcelain from a Tughlog Palace in Delhi,” pp. 199-230. Noboru Karashima, *In Search of Chinese Ceramic-sherds in South India and Sri Lanka* (Tokyo: Taisho University Press, 2004), pl. 27.

<sup>⑫</sup> J. A. Pope, *Chinese Porcelain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Washington D. C.: Freer Gallery of Art, 1956; Reprinted 1981); *Fourteenth-Century Blue-and-White: 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ain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zi* (Washington D. C.: Freer Gallery of Art, 1952), pl. 20.

<sup>⑬</sup> Jessica Rawson, “The Export of Tang Sancai Wares: Some Recent Research,” *Transaction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 52 (1987-1988), pl. 6.

<sup>⑭</sup> 佐々木達夫，前引〈インド洋の中世陶磁貿易が語る生活〉，頁104-105。

## (二) 中東

### 1. 霍爾木茲 (Hormoz) 舊港

伊朗東南阿奈半亞河 (Anamia) 上游的霍爾木茲 (Hormoz) 舊港，今稱米奈布 (Minab)。早在1930年代斯坦因 (M. A. Stein) 就曾在米奈布海濱喀拉敦 (Kalatun) 發現許多宋代陶瓷標本和北宋「政和通寶」銅錢，<sup>⑬</sup> 而霍爾木茲舊港出土的十三至十四世紀即南宋至元代青瓷還包括不少帶鋤孔的標本。<sup>⑭</sup> 從圖片觀察 (圖57)，可以確認大維德基金會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舊藏該遺址出土之中國十三至十四世紀青瓷標本之鋤孔，屬穿透式孔洞。

### 2. 哈伊馬角 (Ras al-Khaimah) 朱爾法 (Julfar) 遺址

朱爾法 (Julfar) 遺址位於阿曼半島西海岸，緊鄰今哈伊馬角 (Ras al-Khaimah) 市，是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United Arab Emirates) 的中世古城。自1330年至1507年葡萄牙占領霍爾木茲，以後的一個多世紀朱法爾均隸屬霍爾木茲王國，該王國控制臨近的伊朗海岸、巴林 (Bahrain)、阿曼 (Oman) 和朱爾法致力於貿易通商。朱爾法城因1633年阿曼的攻掠而廢棄，遺址延綿海岸兩公里。遺址出土陶瓷種類豐富，1980至1990年代英、法、德、日四國考古隊對遺址進行了發掘，以法國考古隊發掘所得資料為例，除了十四至十五世紀龍泉青瓷、十五世紀青花瓷等中國陶瓷標本之外，也包括十五至十六世紀泰國青瓷和越南青花等東南亞國家標本，其中一件明代十五世紀青花盤曾經鑽孔補修，鋤孔屬穿透式 (圖58)。<sup>⑮</sup>

<sup>⑬</sup> M. A. Stein, *Archaeological Reconnaissances in North-Western India and South-Eastern Iran* (London, 1937), p. 183.

<sup>⑭</sup> 佐々木達夫，〈英國の博物館所藏の遺跡出土中国陶磁器〉，《金沢大学文学部論集》(史学科篇)，6 (1986)，頁22，圖15。

<sup>⑮</sup> Michèle Pirazzoli (趙冰譯)，前引〈哈伊馬角酋長國朱爾法古城遺址出土的14-16世紀遠東陶瓷：斷代與評估經濟和文化狀況的參考〉，頁336，圖8及頁337，圖9。

其次，日本考古隊在朱爾法遺址也發現了部分帶鋤孔的陶瓷標本。所發掘遺址分七層位，其中最底第七層（十四世紀）的葫蘆形瓶殘片可見二處兩孔一組的穿孔，推測是貫穿銅線緊縛；第六層也伴出了元代景德鎮青花瓷穿孔標本。<sup>⑪</sup>

朱爾法遺址出土不少中國鋤瓷標本，年代可早自晚唐期青瓷大罐。<sup>⑫</sup>從一件穿孔仍遺留附著鐵線的十四世紀伊斯蘭釉陶標本看來（圖59），<sup>⑬</sup>當地確是用金屬絲穿入瓷片兩端孔洞再予緊繫接合。由於遺址遺存有鍊銅作坊及天然石加工半成品，因此學界一說認為朱爾法城內有可能存在著職司陶瓷鋤補的專業工匠。<sup>⑭</sup>朱爾法遺址所見帶鋤孔的標本，跨越時代既長，種類也豐富，產地亦多元，包括中國、伊斯蘭以及東南亞泰國等地製品（圖60），<sup>⑮</sup>並且均屬穿透式鑽孔。

### 3. 哈雷伊拉 (Al-Hulayla) 遺址

哈雷伊拉是位於波斯灣入口處與阿拉伯半島接壤、長近10公里的細長而平坦的島嶼。遺址出土了和伊朗尸羅夫 (Siraf) 遺址所見白瓷A類碗圈足造型相近的帶穿孔伊斯蘭白濁釉陶片（圖61）。據此可知，模倣晚唐九世紀邢窯類型白瓷（白瓷A類），於美索不達米亞燒製的伊斯蘭白濁釉陶亦見穿透式補修孔洞。<sup>⑯</sup>

---

⑪ 佐々木達夫，前引〈14世紀の染付と釉裏紅はどのように出土するか〉，頁467-475。

⑫ 佐々木達夫，前引〈インド洋の中世陶磁貿易が語る生活〉，頁105。

⑬ 佐々木達夫，〈遺跡出土の破片が語るイスラーム陶器の變遷と流通〉，收入東洋陶磁學會三十周年記念，《東洋陶磁史—その研究の現在》（東京：東洋陶磁學會，2002），頁310及頁16，圖77。

⑭ 佐々木達夫等，〈發掘資料解釋と景觀復元によるジュルファルの都市的性格檢證〉，《オリエント》，48-1（2005），頁45。

⑮ Hansman, J., *Julfar, an Arabian Port-Its Settlement and Far Eastern Ceramic Trade From the 14<sup>th</sup> to the 18<sup>th</sup> Centuries*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85), pl. I-I, pl. v-p.

⑯ 佐々木達夫，〈アッバース朝白濁釉陶器にえ与る中国白磁碗の影響〉，《金沢大学考古学紀要》，26（2002），頁66及頁74，圖10。

#### 4. 尸羅夫 (Siraf) 遺址

波斯灣著名對東洋貿易港尸羅夫 (Siraf)，是所謂尸羅夫商人的根據地，其以尸羅夫港為軸心掌控著包括西邊做為伊斯蘭世界經濟文化中心的巴格達 (Baghdad)，和北側呼羅珊 (Khurasan) 地區的都城尼什布爾 (Nishapur) 等地的消費市場。<sup>⑭</sup> 但因為底格里斯 (Tigris) 河口及其鄰近海面多為泥沙沖積而成的淺灘，故海船至尸羅夫港之後，其貨物均需改裝至吃水淺的小舟運往巴士拉 (Basra)、巴格達 (Baghdad) 等方面，<sup>⑮</sup> 這也就如九世紀商人蘇萊曼 (Solaiman) 在其《中國印度見聞錄》所說的包括巴士拉、阿曼 (Oman) 等地的貨物亦需先運到尸羅夫裝貨。<sup>⑯</sup>

1960至1970年代英國考古家懷特豪斯 (D. Whitehouse) 針對尸羅夫港的幾次發掘，已經證實該遺址除有伊斯蘭陶器之外，亦見河南鞏縣窯、湖南長沙窯、浙江越窯以及廣東青瓷等中國晚唐九世紀陶瓷標本。<sup>⑰</sup> 1990年代印尼勿里洞島 (Belitung Island) 海域發現的船載有數萬件唐代陶瓷等文物的寶曆二年 (826) 「黑石號」 (Batu Hitam) 沉船，雖未完成預定行程即在途中不幸失事沉沒，但從文獻所載航道以及遺址出土標本的組合特徵等或可推測該船可能是自揚州解纜，其預定的最終停靠港灣即尸羅夫。<sup>⑱</sup> 無論如何，尸羅夫遺址出土的河南鞏縣窯白瓷碗 (B類白瓷碗) 碗壁有穿透式銅孔 (圖62)。<sup>⑲</sup>

⑭ 家島彦一，〈インド洋におけるシーラーフ系商人の交易ネットワークと物品の流通〉，收入：田邊勝美等編，《深井晉司博士追悼シルクロード美術論集》(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頁203-204。

⑮ 桑原隲藏，〈波斯灣の東洋貿易港に就て〉，《史林》，1卷3號 (1916)，頁14。

⑯ 穆根來等譯，《中國印度見聞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7。

⑰ David Whitehouse, "Excavation at Siraf, Fourth Interim Report," *IRAN*, vol.IX (1971), pl. VIII~IX; "Excavation at Siraf, Fifth Interim Report," *IRAN*, vol.X (1972), pl. X~XI; "Chinese Stoneware from Siraf: the Earliest Finds,"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New Jersey: Noyes Press, 1973), pp. 241-255. David Whitehouse, *Siraf: History, Topography and Environment* (Oxford: Oxow Books, 2009).

⑱ 謝明良，〈記「黑石號」(Batu Hitam) 沈船中的中國陶瓷器〉，原載《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3 (2002)，後收入前引《貿易陶瓷與文化史》，頁81-134。

⑲ 佐々木達夫，前引〈アッバース朝白濁釉陶器にえ与る中国白磁碗の影響〉，頁66及頁73，圖7。

## 5. 薩馬拉 (Samarra) 遺址

伊拉克薩馬拉 (Samarra) 遺址原是阿拔斯朝 (Abbasid) 伊斯蘭教教主 (Al-Mu'tasim) 在西元836年於巴格達 (Baghdad) 北方一百餘公里底格里斯河畔所建立的都城，該遺址至十世紀末期仍未完全廢棄，但主要是繁榮於建都以來至繼任教主 (Al-Mu'tamid) 在西元883年遷都回巴格達為止的近五十年間。遺址於本世紀初由伊拉克和德國考古隊進行了科學的發掘，出土了數量龐大的波斯陶器和中國陶瓷，後者除了有越窯青瓷、邢窯系白瓷等之外，另包括部分低溫鉛釉系統的三彩印花紋陶、綠釉陶和白釉綠彩陶等標本。儘管波斯釉陶和中國釉陶殘片有時不易明確區分，但報告者則經由胎釉外觀的仔細比較，大致成功地將兩者予於區隔，特別是被歸入中國製品的一件綠釉殘片上更墨書庫非克 (Cufic) 體「SIN」，即意味「中國」的銘文；白釉綠彩陶則見到可能是表示器種的阿拉伯文墨書。<sup>⑬</sup> 值得注意的是，遺址出土來自中國北方窯場之晚唐九世紀白釉綠彩鉛釉陶標本當中，有的還以金屬釘穿透器壁綴合補接 (圖63)。不僅如此，同遺址伴出的伊斯蘭白釉碗標本亦見鋤補現象，這再次表明陶瓷穿孔鋤補應是伊斯蘭匠人的措意。

另外，前述斯里蘭卡曼泰 (Mantai) 遺址也出土了帶鋤孔的晚唐白釉綠彩陶器，從薩馬拉遺址同類標本可以推測曼泰遺址帶鋤孔釉陶殘片之鋤孔極有可能亦屬穿透式。

## 6. 福斯塔特 (Al-Fustat) 遺址

福斯塔特遺跡為現在開羅的前身，是西元642年阿拉伯軍隊征服埃及所最初建設的市街，福斯塔特的意思是軍營。西元1168年移駐巴勒斯坦的基督教軍團因覬覦埃及的財富而圍困了開羅，其時法蒂瑪王朝宮廷既不敵十字軍的進擊，同時也懼怕位於開羅南部的福斯塔特產業中心落入敵人手中，遂決定自行將之焚毀。

---

⑬ サール・フリードリヒ (佐々木達夫譯)，〈サマラの陶器 (四)〉，《金沢大學考古學紀要》，24 (1998)，頁230。

遺跡的發掘調查始於1910年代的埃及考古隊，之後又有阿拉伯聯合考古局和美國隊等進行調查和發掘。另外，1960年代日本小山富士夫等人受託整理、分類遺跡出土近70萬片陶瓷的生產地，雖說助長了貿易陶瓷的研究熱潮，<sup>⑬</sup>但詳細報告書迄今尚未刊行。早在1970年代俞博（Bo Gyllensvärd）在討論福斯塔特遺址出土中國陶瓷時，已曾揭載數件帶銅孔的標本；<sup>⑭</sup>1990年代由日本早稻田大學發行的發掘報告書更是有意識地刊載並測繪帶銅孔的中國陶瓷標本，提供本文得以大致掌握當時福斯塔特住民陶瓷銅補遺痕以及補修陶瓷種類的重要線索。因此，以下所將敘及的內容，主要是依據以早稻田大學櫻井清彥教授為代表的日本考古隊於1978年至1985年發掘福斯塔特遺跡所得標本，以及參與報告書編寫工作的當時金澤大學佐佐木達夫教授的統計數據。<sup>⑮</sup>

依據早稻田隊發掘遺址所獲標本，來自中國的北宋定窯白瓷和南方青白瓷殘片可見補修鑽孔（圖64），<sup>⑯</sup>個別標本鑽孔仍遺留有銅線。南宋至元代鑽孔標本限於青瓷，其中包括以鐵線穿入孔洞繫綁者（圖65）。<sup>⑰</sup>元代鑽孔標本多為蓮瓣飾碗，有的仍可觀察到以鐵線穿綁的痕跡。就標本的時代和種類之銅孔補修頻率而言，所見39件北宋期白瓷標本當中有4件帶鑽孔者，南宋青瓷和元代青瓷分別有2件和23件標本帶銅孔，以總數計638件宋元青瓷標本計算，則鑽孔補修率佔了3.9%。所見鑽孔均屬穿透式。

⑬ 三上次男，《陶磁の道—東亞文明の接点をたずねて—》岩波新書724（東京：岩波書店，1969），頁1-37。

⑭ Bo Gyllensvärd, "Recent Finds of Chinese Ceramics at Fustat, II,"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47 (1975), pl. 24-2.

⑮ 櫻井清彥等編，前引《エジプト・イスラーム都市アル=フスタート遺跡發掘調査1978~1985年》，第1分冊／本文編；第2分冊／圖版、寫真版編。

⑯ 櫻井清彥等編，前引《エジプト・イスラーム都市アル=フスタート遺跡發掘調査1978~1985年》，本文編，頁285；圖版、寫真版編，頁441圖版1-7，頁501寫真1-8。

⑰ 櫻井清彥等編，前引《エジプト・イスラーム都市アル=フスタート遺跡發掘調査1978~1985年》，本文編，頁285；圖版、寫真版編，頁455圖版8-10。

## 五、歐洲鋤補陶瓷例

從目前的考古資料看來，西元前五世紀的古希臘陶器已經採用鋤釘修繕。如義大利西西里島卡爾尼塞塔省 (Caltanissetta) Sanbucina墓葬遺址出土的紅像式陶壺，出土時壺身清楚可見以五只鉛鋤釘接補綴合，而壺肩腹描繪鍛冶之神工坊圖像乃是出自西元前475年「Harrow的畫家」之手 (圖66)。<sup>⑬</sup>

古希臘陶器之外，羅馬薩米安紅陶 (Samian Pottery) 亦屢見鋤釘補修遺痕。<sup>⑭</sup> 如1930年代所發現位於不列顛東北Farley Heath神殿區一公里處，年代約在一至三世紀前半的火葬墓群Foxholes出土陶器，即見以鉛鋤釘和鉛片修繕的標本。其工法是以鉛片鋪墊在待補陶器的內外兩側，並於鉛片和陶器鑽孔，再注入鉛溶液或鉛鋤釘固定 (圖67)。薩米安紅陶之外，Oxfordshire的填彩陶或古羅馬時期廚房用陶器甚至亮黑陶亦有鋤釘補修痕跡，而來自Walse和Gaul陶器則見以鉛線補修例；Staines的一件灰陶器皿則少見地採銅合金鋤補，並在陶器破裂處填充黑色樹脂的黏著劑。<sup>⑮</sup>

古羅馬陶器的鑽孔和鉛鋤釘補修手法其實頗為多樣，如義大利巴拉丁諾山 (Palatine Hill) 東北側Palatine East出土的年代在500—600/620的碟或碗殘片 (圖68)，是先在中側鑽孔，而後在外側貼附中空的半模。進而將容器內側朝上，於孔中澆入鉛液，直至鉛液填滿中空的半模。冷卻後移除半模，利用壓具或鑿子將暴露在容器內側的兩個鉗腳向外壓緊貼於鑽孔側邊，以確保鉗固定在原處。另一個案例來自義大利維泰博 (Viterbo) 省Bomarzo市Piammiano的盤或碗標本，年代約在西元二世紀或西元前一世紀前半，出土時標本仍遺留鉛鋤釘 (圖69)。學者復原其修復工序是先鑽孔，孔距間切割溝槽。於裂處注入鉛液，將由鉛油灰滾成的金屬絲在未硬化前壓入孔間溝槽，溝槽鉛液將和之前填

---

⑬ シチリアの古代ギリシア展編集委員會編，《シチリアの古代ギリシア展》(甲府：山梨縣立美術館，1984)，圖622及頁264的解說。

⑭ Judie English, "Two Examples of Roman Pottery Repair in Antiquity," *Surrey Archaeological Collections*, 92 (2005), pp. 263-265.

⑮ Joanna Bird, "An Elaborately Repaired Flagon and other Pottery from Roman Cremation Burials at Farley Heath," *Surrey Archaeological Collections*, 97 (2013), pp. 153-155.

入裂處的鉛液融溶，並在內側鑽孔注入溶液，形成鉗腳。待鉗腳冷卻後，再加上小鉛片，而後可固定鉗腳。<sup>⑬</sup>

不過，相對於上引在低溫陶器鑽孔補修，鋤補高溫炆器則需具備相應的工具和技藝。從歌劇或歌曲內容可知歐洲在十五世紀時已有不少從事陶瓷修補的工匠，但其時係以石灰或蛋白等黏著劑接合陶瓷，迄十八世紀才出現針對高溫炆器的鋤補技藝。<sup>⑭</sup> 工法可區分為穿透式和非穿透式，前者多以花匠用的金屬鉸絲穿過孔洞後再打結綁網（圖70），後者則是植入釘書針般金屬鋤釘（圖71）。為美觀起見，有時也會在鋤釘上塗施釉彩（圖72）或將鋤釘埋入鑽孔之間預先做好的凹槽中，如此一來，既可掩飾醒目的鋤釘，也可使鋤釘與器表維持平坦。

Isabelle Garachon已曾指出，1773年法國Abbé Jaubert認為鋤釘的出現應歸功於Delisle of Normandy，然而鋤補陶瓷卻導致瓷器製造商的不滿，因而請求法庭禁止瓷器補修的行業，但結果並未如其所願。儘管Abbé Jaubert的鋤瓷起源說法在十九世紀被人再度提起，且以揶揄嘲諷的口氣指謫其說不可盡信，<sup>⑮</sup> 但若連想到十八世紀一位遊走多國四處旅行名叫Sieur Rupan的陶瓷修補匠人曾經聲稱，他可以用前所未有的方式補修瓷器，<sup>⑯</sup> 則透露出歐洲鋤補高溫炆器似乎是突如其來地出現於十八世紀。換言之，歐洲十八世紀初現的高溫炆器鋤補技藝，與此前古希臘、羅馬時期以鉛鋤釘或鉛片補修低溫陶器的技法應屬截然不同的兩個系統，其並非是古希臘羅馬鉛鋤陶器技法傳承發展的結果，而是另有淵源出自。

就此而言，自1582年來到中國，到1610年在北京去世的著名歐洲赴華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之《中國見聞札記》所記錄的一則與中國鋤釘補瓷相關的報導，值得予以重視。即：「最細的瓷器是用江西所產黏土

<sup>⑬</sup> J. Theodore Peña, *Roman Pottery i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35-242.

<sup>⑭</sup> Isabelle Garachon, "Old Repairs of China and Glass," *The Rijksmuseum Bulletin*, 58 (2010), pp. 40-42.

<sup>⑮</sup> Isabelle Garachon, "Old Repairs of China and Glass," p. 43.

<sup>⑯</sup> Isabelle Garachon, "Old Repairs of China and Glass," p. 47.

製成，人們把它用船不僅運到中國各地，而且還運到歐洲最遙遠的角落，在那裡它們受到那些欣賞宴席上的風雅有甚於誇耀豪華的人們的珍愛。這種瓷器還可以耐受熱食的熱度而不破裂，而尤其令人驚異的是，如果破了，再用銅絲焊起來，就是盛湯水也不會漏」。<sup>⑭</sup>毫無疑問，博學多聞的利瑪竇是在歐洲並不存在鍋瓷技藝的認知下，才刻意地記錄了中國的鍋瓷術並將之介紹到歐洲。從研究史的觀點來說，利瑪竇應該是主張歐洲鍋瓷術乃是受到中國影響之論調的第一個人。在此一脈絡中，我們才能理解十八或十九世紀西方圖繪或圖書插畫為何會經常以中國工匠鍋瓷場景做為異國情調獵奇畫面。不僅如此，十八世紀中國外銷畫家蒲呱 (Puqua) 或受委託或自身亦視此一技藝為中國的傳統絕活，因而繪作鍋瓷圖外銷歐美 (同圖11)，<sup>⑮</sup> 其和十八世紀歐洲沿街招攬顧客的陶瓷修補工匠 (圖73) <sup>⑯</sup> 共同譜出了當時經濟個體戶的營生場景。

## 六、鍋釘修繕技術影響交流的評估

鍋釘補瓷的工法是在待修陶瓷裂罅兩側鑽孔而後植入兩端屈曲的金屬釘，但於破裂陶瓷鑽孔後的後續修繕方式則未必只能植入鍋釘。比如說，可以用植物纖維、樹皮、皮革等穿孔緊縛接合補修陶瓷，這也是世界各地諸多民族歷史上所曾經採行的修補方案之一，修護對象一般是低溫陶器，其年代多見於新石器時代，但至歷史時期仍持續可以見到。由於普遍見於各地，所以不存在發明或傳播影響的問題。另一方面，如果先不論歐洲古希臘、羅馬陶器的鉛鍋釘案例，做為本文主題的鍋釘補瓷術之修繕對象主要是高溫施釉炆器和瓷器，偶見低溫釉陶器，其初現的地點在亞洲，年代可上溯自九世紀。不過，目前所見中國此一時期的樣本並非考古出土物，但中東伊拉克薩馬拉 (Samarra) 標本則是正式調查所獲得。就此一時期標本的鑽孔特徵而言，相對於中國地區所見標本

---

⑭ 利瑪竇 (Matteo Ricci) 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15。

⑮ 黃時鑑等，《中國三百六十行》，圖23。

⑯ Isabelle Garachon, "Old Repairs of China and Glass," p. 43, fig. 17.

鑽孔多不穿透，中東地區遺址所見包括來自中國的貿易瓷在內標本均屬穿透式（同圖57~65）。進一步地說，目前所見中國考古出土或傳世之宋代以迄清代標本都顯示其所採行的工法是在未穿透器壁的鑽孔植入金屬釘，而中東地區則是使用釘爪穿壁外露的金屬釘鉤，以及在鑽孔穿入金屬線予以緊綁接合。從實用面來說，非穿透式鋤補只需在補修陶瓷裂罅部位施抹黏著劑即無滲水之虞，而穿透式鋤補或金屬線繫則要大費周章地設法補強鑽孔和釘線之間的空隙，否則難以承載液態物。從目前的資料看來，貿然地評估以上兩式鋤補技法是否有交流或影響關係並非明智，但本文仍欲提示，晚唐九世紀貿易陶瓷的大量輸出，有可能帶給消費地人們陶瓷製作或與此相關的訊息。無論如何，幾乎可以確定的是，中東地區遺址所見帶穿透式鑽孔的中國陶瓷標本不會是由中國輸出的鋤補瑕疵商品，而應該是出自當地匠人之手。

另一方面，中東兩大中國陶瓷收藏之一的土耳其砲門宮博物館（Topkapi Saray Museum）藏明初十五世紀前期青花大盤等作品，則是採用了非穿透式的鋤補（圖74）。<sup>④⑥</sup> 砲門宮殿建成竣工於1467年，中國陶瓷收藏始見於1495年的文書，之後1501年、1514年文書也顯示中國陶瓷數量逐次增多，今日學界咸信宮廷的陶瓷收藏應是收聚了原本分散於鄂圖曼帝國（Ottoman Palace）各地作品逐漸累積而成，<sup>④⑦</sup> 是十九世紀多爾瑪巴赫切宮殿（Dolmabahce Palace）建成之前歷代蘇丹的居所，1924年更名為砲門宮博物館，因此館藏中國陶瓷的鋤補年代不會晚於十九世紀。如前所述，非穿透式鋤補術是中國的傳統技藝，然而筆者卻也難以想像中國會將鋤補的瑕疵品，特別是將民間不易取得的景德鎮官窯製品施以鋤補後再外銷中東（圖75）。<sup>④⑧</sup> 考慮到砲門宮殿博物館藏部分元明時期陶瓷器表裝綴各種構圖繁複的金屬或寶石鑲嵌，表明當地工匠擁有凌駕於中國之

<sup>④⑥</sup> Regina Krahl, et al., *Chinese Ceramics Topkapi Saray Musuem, Istanbul, A Complete Catalogue* (London: Sotheby's, 1986), vol. II, p. 513, fig. 603.

<sup>④⑦</sup> Margaret Medley撰，西田宏子譯，〈インドおよび中近東向けの元代青花磁器〉，收入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磁全集13：遼、金、元》（東京：小學館，1981），頁274；三上次男，前引《陶磁の道》，頁87-92。

<sup>④⑧</sup> Regina Krahl, et al., *Chinese Ceramics Topkapi Saray Musuem, Istanbul, A Complete Catalogue*, vol. II, p. 826, fig. 1670.

上嫻熟的陶瓷切割和鑽孔技能，以及十五至十六世紀土耳其伊茲尼克 (Iznik) 青花瓷亦見同類鋤補例 (圖76)，<sup>⑭</sup> 本文認為土耳其至遲在十五世紀出現了和中國相近的非穿透式鋤補術。

儘管歐洲地區早在西元前已經懂得在低溫陶器上穿透孔並澆注植入鉛鋤釘，然而該一工技和十八世紀歐洲興起的鋤補術之間卻有明顯的斷絕，所以個人認為兩者並非一脈相承的技藝。除了前引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之外，雖乏具體論證，但近代歐洲學界也已指出十八世紀歐洲各地所見陶瓷鋤補技術可能源自中國。<sup>⑮</sup> 本文同意上述看法，但擬在此提示十八世紀歐洲修護對象集中在高溫釉瓷，鋤釘鑽孔屬非穿透式，由於歐洲第一個硬瓷出現於十八世紀初，因此鋤釘補瓷術也可說是基於此一新興時髦商貨應運而生的新手法和新行業。另一個不應輕忽的事實是，長期居住在景德鎮的著名法國傳教士殷弘緒 (d'Entrecolles, 1664—1741) 寄往歐洲的書簡曾提及清初景德鎮鋤補瓷匠人的作業工序，即：「使用金剛鑽將破碎的瓷片予以結合，這在中國甚至成為一種職業，有專門從事瓷片修理復原的工匠。它們使用金剛鑽就像是使用針般，於瓷器上鑽幾個小孔，再於小孔穿入極細的銅絲予以縫合。這樣一來，瓷器就能照常使用，並且幾乎看不出破裂的痕跡」。<sup>⑯</sup> 雖然殷弘緒誤將中國非穿透性的鋤孔，視為可貫穿金屬絲的孔洞，卻也生動地傳達出做為歐洲一員的他，對於鋤釘補瓷技術是如此地陌生，以致於難掩好奇興奮之情。大英博物館藏印製於1770年的陶瓷補修店鋪宣傳海報，也從另一角度透露出重要的訊息。該海報近上方正中為加黑放大字體「China-Rivetter」（即「鋤釘補瓷」）字樣，以下花邊字體則是提示該鋤補技藝可以修護任何陶瓷容器，強調此一特殊技藝是王國前所未見的新發明，同時極為得意地宣稱經其鋤補的作品將可回復其原

---

⑭ Nurhan Atasoy and Julian Raby, *IZNIK: The Pottery of Ottoman Turkey* (London: Alexandria Press, 1989), fig. 283.

⑮ C. S. M. Parsons & F. H. Curl, *Chinese Mending and Restoration* (London: Faber & Faber, 1963), p. 20; N. Williams, *Porcelain Repair and Restoration*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1983), p. 16.

⑯ ダントルコール (d'Entrecolles) 著，小林太市郎譯註、佐藤雅彦補注，《中國陶瓷見聞錄》東洋文庫363冊（東京：平凡社，1979），頁269-270。

本功能，並且可耐用二、三十年，否則負責免費維修（圖77）。<sup>152</sup> 這就明確說明了英國是在十八世紀中後期才習得鋤瓷技術。其次，從海報正中上方置一蓋罐，兩側分列手持茶壺和大鉢、頭戴圓帽的滿州人，其人物造型、排列方式和帽式特徵和德國柏林夏洛騰堡皇宮（Schloss Charlottenburg）瓷器間所見浮雕人物有著異曲同工之趣（圖78）等看來，不難理解在當時歐洲人的心目中，瓷器以及鋤釘補瓷都來自遙遠東方充滿異國情調的中國。

東北亞日本的鋤補例在作品的性質上可分為兩類，其一是以茶道具為主的傳世陶瓷，再者是考古出土的中國陶瓷標本。前者個別作品，如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馬蝗絆」銘南宋青瓷碗（同圖33）的鋤補時間或許可能上溯十八世紀前期。至於考古出土標本方面，無疑是以戰國大名朝倉孝景（1428—1481）建設於文明初年（1469）、毀於天正元年（1573）戰火之福井縣一乘谷都城遺跡出土的十二世紀定窯白瓷（同圖35）以及十四世紀龍泉窯青瓷（同圖36）最為著名。另外，石川縣普正寺遺跡出土的十四世紀元代景德鎮青花瓷標本也可觀察到補瓷用的鋤孔（同圖39）。

上述日本遺址出土鋤孔標本均屬非穿透性鑽孔，而此一鑽孔特徵則與中國本土出土標本一致。以一乘谷遺址出土標本而言，學者其實無從判斷鋤瓷者到底是日本匠人抑或是中國工匠？當然也無法究明鋤補的時間是和作品相對年代相距不久的宋元時期，還是晚迄一乘谷都城被毀之前不久的十五世紀前中期？因此，截至目前日方學者針對此一議題所做的各種判斷，至多只是難以證實或證偽的情境推測，並無任何事實根據。

本文亦乏有效的解決方案，但在宏觀梳理亞歐部分地區鋤釘補瓷實例的基礎之上，初步認為鋤補者應係當地工匠。基於這樣的認知所形成的立場，則上述日本考古遺址鋤補標本若非出自修習自中國匠師的日本匠人之手，即應是由渡海東瀛的中國工匠所代勞。與此相關的是，我們亦應留意日本正德三年（1712）《和漢三才圖會》或狩野養信（1796—1846）父子摹繪《七十一番職人歌合》所見可用於製作念珠或鋤瓷鑽孔的「舞錐」（同圖13、15），因其可能也是中國鑽具的模擬和圖繪（同圖14）。鋤釘補修雖是便捷而實用的陶瓷修

<sup>152</sup> Isabelle Garachon, “Old Repairs of China and Glass,” p. 45, fig. 22.

繕技藝，但中國區域則約自十六世紀明代中後期的文人圈已將陶瓷上的鋤釘視為象徵古代陶瓷的圖像記號，而頻仍地出現在他們的畫作當中，日本區域受此啟發至遲在十八世紀則將陶瓷上鋤釘做為「唐物」的特色之一予以賞鑑，並成為日本茶道的鑑賞風情之一。

相對於明末清初文人樂於利用陶瓷鋤補圖像來襯托個人畫作所欲展現的高古氛圍，清代宮廷則冷漠以對。從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所記載的補釉、補胎或磨邊鑲釦等陶瓷補修情況，不難得知宮廷匠師奉旨施行的理想修補方案，是企圖將缺損的陶瓷補修復原至完整無瑕的外觀，在掩飾美化傷璽的同時亦勉力保存作品原有的面貌。而乾隆皇帝（1711—1799）講究器物之完整一事，也反映在造辦處屢次奉旨燒進業已佚失的前代陶瓷之器蓋等配件，而著名督陶官唐英（1682—1756）也經常持進配得瓷蓋，供乾隆皇帝檢閱、觀覽。<sup>153</sup> 在這樣的一種由帝王所主導的要求瓷器完美外觀的觀看方式之下，宮廷匠師自然就受限不被允許使用頗具實用性的鋤釘來補修古瓷。問題是乾隆為何會摒棄明代文人也曾賦予其高古象徵意含的鋤釘補瓷術，而堅決採取其他修護方案將陶瓷外觀盡量修整得近於完美無瑕呢？個人認為這可能和他自己也提到的土崩之德，<sup>154</sup> 即隱含於陶瓷之德行象徵意義有關。收錄於《文苑英華》的一則中晚唐時期〈對陶人判—市稱陶旒者髻墜薛暴〉記載：「惟彼陶者，為芸之卑，讀邃古之書，豈功埏埴，異河濱之跡」，<sup>155</sup> 所說的是市中販瓷者以髻墜薛暴等瑕疵品冒充完器出售，是異於河濱遺範的敗德行為。對於一國之君又極力宣揚自身德行的乾隆皇帝而言，為避免敗德形象的影射，自然不希望其御窯廠製品出現類此的瑕疵，同時也不會以醒目的鋤釘來補修內府所藏古瓷而突顯出瓷器的缺陷，<sup>156</sup> 這也是清宮傳世鋤補陶瓷基本不見宋元古物的主要

<sup>153</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冊18，頁569，〈江西〉（乾隆十九年十月十三日）。

<sup>154</sup> 乾隆三十一年（1766）〈詠龍泉窯椀〉：「德猶宗土崩」收入四庫本《御製詩集》三集卷五十六，頁28。

<sup>155</sup>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530，《四庫全書》集部276，總集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337冊，頁843。

<sup>156</sup> 謝明良，〈乾隆的陶瓷鑑賞觀〉，原載《故宮學術季刊》，21卷2期（2003），收入《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7），頁260。

原因之一。<sup>⑮</sup>

〈附記〉

本文計六章。其中第二章第二節以及第三章部分內容曾題名〈「馬蝗絆」茶碗及其他〉發表於《日本美術之最》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特此申明。

（責任編輯：陳卉秀）

---

<sup>⑮</sup> 清宮傳世錫瓷例可參見：故宮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編，《故宮博物院藏 古陶瓷資料選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

## 引用書目

### 傳統文獻

(清) 于敏中等編

《御製詩集》三集，卷56，《四庫全書》集部245，別集類，130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8，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永島福太郎譯

《松屋會記》，收入千宗室等《茶道古典全集》，第9卷，京都：淡交社，1956。

伊藤東涯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六，日本寶曆九年（1759）刊，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古義堂版。

(宋) 李昉等編

《文苑英華》，卷530，《四庫全書》集部276，總集類，133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宋) 林洪

《文房職方圖贊》，收入嚴一萍選輯，《百部叢書集成》，1370冊·欣賞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清玩名物記》，收入筒井絃一編，《茶道學大系》，10，京都：淡交社，2001。

### 近人論著

Hommel, Rudolf P. ( 国分直一譯 )

1992 《中国手工業誌》，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

Hommel, Rudolf P. (Kokubu, Naoichi, trans.)

1992 *China at Work: An Illustrated Record of the Primitive Industries of China's Masses, Whose Life is Toil and thus an Accou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okyo: Hosei University Press.

C. B. 吉謝列夫等 ( 孫危譯 )

2016 《古代蒙古城市》，北京：商務印書館。

Киселёв, Серг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et al. (Sun, Wei, trans.)

2016 *Gudai menggu chengshi* (Cities in Ancient Mongoli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Medley, Margaret撰，西田宏子譯

1981 〈インドおよび中近東向けの元代青花磁器〉，收入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磁全集》13，遼、金、元，東京：小學館，頁270-278。

Medley, Margaret; Nishida, Hiroko, trans.

1981 “Indo oyobi Chūkintō muke no moto dai aobana jiki (Yuan Blue-and-White Porcelain for India and Middle East),” in Ouga, Tetsuo, ed., *Sekai tōji zenshū* (Ceramic Art of the World), vol. 13: Liao, Jin, and Yuan Dynasties, Tokyo: Shogakukan, pp. 270-278.

サーレ・フリードリヒ (佐々木達夫譯)

1998 〈サマラの陶器 (四)〉, 《金沢大學考古學紀要》, 24, 頁224-242。

Sarre, Friedrich (Sasaki, Tatsuo, trans.)

1998 “Die Keramik von Samarra: Die Ausgrabungen von Samarra Band II,” *Archaeological Bulletin Kanazawa University*, no. 24, pp. 224-242.

シチリアの古代ギリシア展編集委員會編

1984 《シチリアの古代ギリシア展》, 甲府：山梨縣立美術館。

Shichiriā no kodai girishia ten henshū iinkai (Editorial Board for the Exhibition of Ancient Greece in Sicily), ed.

1984 *Mostra della Sicilia Greca*, Kōfu: Yamanashi Prefectural Museum of Art.

ダントルコール (d’Entrecolles) 著, 小林太市郎譯註、佐藤雅彦補注

1979 《中國陶瓷見聞錄》東洋文庫363冊, 東京：平凡社。

d’Entrecolles, François Xavier (Kobayashi, Taichirou, trans. and anno.; Satō, Masahiko, anno.)

1979 *Chūgoku tōji kenmonroku* (The Letters of Père d’Entrecolles), Toyo Bunko (Oriental Library), vol. 363, Tokyo: Heibonsha.

三上次男

1969 《陶磁の道—東西文明の接点をたずねて—》, 岩波新書 (青版) 724, 東京：岩波書店。

Mikami, Tsugio

1969 *Tōji no michi: Touzai bunmei no setten o tazunete* (Ceramic Road: An Inquiry into the Contact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Iwanami Shinsho-Aoban (Iwanami New Books-Blue Edition), vol. 724, Tokyo: Iwanami Shoten.

三井文庫編

1995 《三井の名碗三十撰》, 三井文庫別館蔵品図録：茶道具6, 東京：三井文庫。

Mitsui Bunko (Mitsui Archives), ed.

1995 *Mitsui no meiwan sanjussen* (Thirty Famous Bowls of the Mitsui Family), Collection Catalogues of the Mitsui Memorial Museum: Tea Ware 6, Tokyo: Mitsui Bunko.

上海文獻叢書編委會

1988 《朱氏舜水談綺》,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wenxian congshu bianweihui (Editorial Board of the Shanghai Literature Series)

1988 *Zhushi shunshui tanqi* (Belle Talks from Zhu Shunshui),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張志忠等)

2006 〈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發掘簡報〉,《文物》,10期,頁25-49。

Archaeology Institute of Datong City (Zhang, Zhi-zhong, et al.)

2006 “A Brief Excavation Report on Tomb Group of the Northern Wei Located in Qili Village, Datong City, Shanxi Province,” *Cultural Relics*, no. 10, pp. 25-49.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

2007 《美の求道者・安宅英一の眼—安宅コレクション》,大阪:讀賣新聞大阪本社。

Museum of Oriental Ceramics, Osaka, ed.

2007 *The Eyes of Ataka Eichi, Seeker of True Art: Selected Chinese and Korean Ceramics from the Ataka Collection*, Osaka: Osaka Headquarters of the Yomiuri Shimbun.

大阪歴史博物館編

2006 《豪商鴻池—その暮らしと文化》,大阪:東方出版。

Osaka Museum of History, ed.

2006 *Wealthy Merchants, the Kōnoike Family: Their Life and Culture*, Osaka: Toho.

大河内定夫

1982 〈近世の大名茶の湯における染付について〉,《金鯢叢書:史学美術史論文集》9,東京:思文閣,頁468-483。

Ōkochi, Sadao

1982 “Kinsei no daimyōcha ni okeru shimitsu ni tsuite (Blue-and-White Porcelain in the Tea Ceremonies of Feudal Lord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Kinko Sōsho: Bulletin of the Tokugawa Reimeikai Foundation*, no. 9, Tokyo: Shibunkaku, pp. 468-483.

小山富士夫

1971 《陶器講座》6・中國II・宋,東京:雄山閣。

1977 《支那青磁史稿》,文中堂,1943,收入《小山富士夫著作集》上・中國陶磁,東京:朝日新聞社,頁1-228。

Koyama, Fujio

1971 *Tōki kōza* (Lectures on Ceramics), vol. 6, China II: Song, Tokyo: Yuzankaku.

1977 *Shina seiji shikō* (Paper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eladon), Bunchūdō, 1943, in *Koyama Fujio chosakushuu* (A Collection of Works by Koyama Fujio), vol. 1, Tokyo: The Asahi Shimbun Company, pp. 1-228.

小野正敏

1998 《戰國城下町の考古學》,東京:講談社。

Ono, Masatoshi

1998 *Sengoku jōkamachi no kōkogaku* (Archaeology of Castle Towns in the Sengoku Period), Tokyo: Kodansha.

弓場紀知

2009 〈鏝で補修された元青花盤—内モンゴルから出土した元青花盤—〉,《陶説》,671,頁38-44。

Yuba, Tadanori

- 2009 “Kasugai de hoshū sareta genseika ban: Uchimongoru kara shutsudo shita genseika ban (Yuan Blue-and-White Plates Repaired with Staples: Yuan Blue-and-White Plates Excavated from Inner Mongolia),” *Tosetsu*, no. 671, pp. 38-44.

不著撰人

- 1993 《安平縣雜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Anonymous

- 1993 *Anping xian zaji* (A Miscellany of the County of Anping), Nantou: General Historica of Taiwan Province.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第二工作隊等（汪盈等）

- 2015 〈內蒙古巴林左旗遼上京宮城城牆2014年發掘簡報〉，《考古》，12期，頁78-97。

Second Inner Mongolian Archaeological Team, IA, CASS, et al. (Wang, Ying, et al.)

- 2015 “The Excavation of the Walls of the Palace City in the Shangjing City Site of the Liao Dynasty in Bairin Left Banner, Inner Mongolia in 2014,” *Archaeology*, no. 12, pp. 78-97.

今井敦

- 2000 〈日本における宋磁の受容〉，收入《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6・南宋、金，東京：小學館，頁269-276。

- 2011 〈南宋の青磁について〉，《此君》，3，頁17-36、7-9。

Imai, Atsushi

- 2000 “Nihon ni okeru sōji no juyō (The Reception of Song Ceramics in Japan),” *New History of World Art, Tōyō hen* (Eastern series), vol. 6, Southern Song and Jin, Tokyo: Shogakukan, pp. 269-276.

- 2011 “Celadon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Shikun: The Bulletin of the Nezu Museum*, no. 3, pp. 17-36, 7-9.

今井敦（蘇哲譯）

- 1999 〈東傳日本的青瓷茶碗「馬蝗絆」〉，《東方博物》，3，頁32-34。

Imai, Atsushi (Su, Zhe, trans.)

- 1999 “Dongchuan riben de qingci chawan ‘mahuangban’ (‘Bakohan’ Celadon Tea Bowls Introduced Eastward to Japan),” *Cultural Relics of the East*, no. 3, pp. 32-34.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 2010 《包頭燕家梁遺址發掘報告》下，北京：科學出版社。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Inner Mongolia, et al.

- 2010 *Baotou Yanjialiang yizhi fajue baogao* (Excavation Report on the Yanjialiang Site in Baotou City), vol. 2, Beijing: Science Press.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蓋之庸等）

- 2016 〈內蒙古多倫縣小王力溝遼代墓葬〉，《考古》，10期，頁55-80。

- Inner Mongolian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et al., (Gai, Zhi-yong, et al.)  
2016 “The Tombs of the Liao Dynasty at Xiao Wangli Gou in Duolun County, Inner Mongolia,” *Archaeology*, no. 10, pp. 55-80.
- 方炳善  
2000 《조선후기 백자 연구》, 서울: 一志社。
- Bang, Byung-sun  
2000 *Joseonhugi baegja yeongu* (A Study on Late-Joseon White Porcelain), Seoul: Ilchisa.
- 出川哲朗  
2005 〈瓷器の鎚による修理とその審美的な価値〉,《陶瓷鍋釘暨現代修護科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等,頁11-24。
- Degawa, Tetsuro  
2005 “Jiki no kasugai ni yoru shūri to sono shinbitekina kachi (Staple Repair on Ceramics and Its Aesthetic Valu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Ceramics, Riveting and Modern Restoration Technology*, Taipei: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pp. 11-24.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編著  
2009 《北京亦莊考古發掘報告2003-2005》,北京:科學出版社。
- Beiji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ed.  
2009 *Beijing yizhuang kaogu fajue baogao 2003-2005*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t Yizhuang in Beijing, 2003-2005), Beijing: Science Press.
- 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劉精義、張先得)  
1977 〈北京市通縣金代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1期,頁9-15、6。
- Beijing Municipal Cultural Heritage Section (Liu, Jing-yi, and Xian-de Zhang)  
1977 “Beijing shi tongxian jindai muzang fajue jianbao (Brief Excavation Report on the Jin Tombs at Tongxian i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no. 11, pp. 9-15, 6.
- 田邊勝美  
2000 〈アケメネス朝ペルシアの美術〉,收入《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卷16,東京:小學館,頁261-292。
- Tanabe, Katsumi  
2000 “Akemenesu chō perushia no bijutsu (The Art of the Achaemenid Empire of Persia),” *New History of World Art, Tōyō hen* (Eastern series), vol. 16, Tokyo: Shogakukan, pp. 261-292.
- 矢部良明  
1983 〈元時代の染付とその評價の顛末〉,《古美術》,67,頁84-95。  
1983 〈唐物茶碗〉,收入林屋晴三編,《茶道聚錦》11・茶の道具(二),東京:小學館,頁113-127。
- Yabe, Yoshiaki  
1983 “Moto jidai no shimitsu to sono hyōka no tenmatsu (Blue-and-White Ceramics of the

Yuan Period and the Details of Its Evaluation),” *A Quarterly Review of Fine Arts*, no. 67, pp. 84-95.

1983 “Karamonochawan (Tea Bowls Imported from China),” in Seizo Hayashiya, ed., *Chadō shūkin* (The Splendid Collections of the Tea Ceremony), vol. 11, Cha no dōgu (Japanese Tea Ceremony Utensils), 2, Tokyo: Shogakukan, pp. 113-127.

矢野環

2001 〈名物記の生成構造—実見と編集のはざま—第二部〉, 收入筒井絃一編, 《茶の古典》, 茶道學大系10, 京都: 淡交社, 頁45-108。

Yano, Tamaki

2001 “Meibutsuki no seisei kōzō: Jikken to henshū no hazama, dainibu (The Formation of Records of Distinguished Tea Utensils: Between Observation and Editing, Part 2),” in Hiroichi Tsutsui, ed., *Cha no koten* (Tea Classics), *Chadōgaku taikai* (A Compendium of Tea Ceremony), Kyoto: Tankosha, pp. 45-108.

寺島良安 (島田勇雄等譯注)

1986 《和漢三才圖會》5, 東京: 平凡社, 東洋文庫462, 卷第二十四。

Terazima, Ryoan (Shimada, Isao, et al., trans. and annot.)

1986 *Wakan sansei zue* (Illustrated Sino-Japanese Encyclopedia), vol. 5, Tokyo: Heibonsha, Toyo bunko (Oriental Library) 462, vol. 24.

朱伯謙

1998 《龍泉窯青瓷》, 臺北: 藝術家出版社。

Zhu, Bo-qian

1998 *Celadons from Longquan Kilns*, Taipei: Artist Publishing Co..

浙江省博物館編

2000 《浙江紀年瓷》, 北京: 文物出版社。

Zhejiang Provincial Museum, ed.

2000 *Zhejiang Chronological Porcelai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江蘇省三星村聯合考古隊 (王根富等)

2004 〈江蘇金壇三星村新石器時代遺址〉, 《文物》, 2期, 頁4-26。

The Joint Archaeological Team at Sanxingcun (Wang, Gen-fu, et al.)

2004 “Excavation of a Neolithic Site at Sanxingcun, Jintan, Jiangsu,” *Cultural Relics*, no. 2, pp. 4-26.

竹內順一

2001 〈名物記の生成構造—実見と編集のはざま—第一部〉, 收入筒井絃一編, 前引《茶の古典》, 茶道學大系10, 京都: 淡交社, 頁45-108。

2007 〈二つの馬蝗絆〉, 《茶道雜誌》, 71卷12號, 頁36-41。

2009 〈紹興時代の茶碗〉, 收入戶田勝久先生喜壽記念論集刊行會編, 《武野紹興 わびの創造》, 京都: 思文閣, 頁457-490。

Takeuchi, Junichi

- 2001 “Meibutsuki no seisei kōzō: Jikken to henshū no hazama (The Formation of Records of Distinguished Tea Utensils: Between Observation and Editing, Part 1),” in Hiroichi Tsutsui, ed., *Cha no koten* (Tea Classics), *Chadōgaku taikai* (A Compendium of Tea Ceremony), Kyoto: Tankosha, pp. 45-108.
- 2007 “Futatsu no bakōhan (Two Bakohan Tea Bowls),” *Chadō zasshi* (Tea Ceremony Magazine), vol. 71, no. 12, pp. 36-41.
- 2009 “Jouou jidai no chawan (Tea Bowls in the Period of Jōō),” in Toda Katsuhisa sensei kiju kinen ronshuu kankoukai (Editorial Committee for the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77th Birthday of Mr. Toda Katsuhisa), ed., *Takeno jouou: Wabi no souzou* (Takeno Jōō: The Creation of Wabi), Kyoto: Shibunkaku, pp. 457-490.

佐々木達夫

- 1986 〈英国の博物館所蔵の遺跡出土中国陶磁器〉，《金沢大学文学部論集》(史学科篇)，6，頁1-24。
- 1993 〈インド洋の中世陶磁貿易が語る生活〉，《上智アジア學》，11，頁87-117。
- 1998 〈十四世紀の染付と釉裏紅はどのように出土するか〉，收入榑崎彰一先生古希記念論文集刊行會編，《榑崎彰一先生古希記念論文集》，京都：真陽社，頁467-477。
- 2002 〈アッバース朝白濁釉陶器にえ与る中国白磁碗の影響〉，《金沢大学考古学紀要》，26，頁64-75。
- 2002 〈遺跡出土の破片が語るイスラーム陶器の變遷と流通〉，收入東洋陶磁學會三十周年記念，《東洋陶磁史—その研究の現在》，東京：東洋陶磁學會，頁310。

Sasaki, Tatsuo

- 1986 “Excavated Chinese Ceramics Stored in the Museums, U.K.,” *Studies and Essays, History*, no. 6, pp. 1-24.
- 1993 “The Ceramic Trade and Life along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Middle Ages,” *The Journal of Sophia Asian Studies*, no. 11, pp. 87-117.
- 1998 “Jū shi seiki no shimitsu to yūrikō wa dono yō ni shutsudo suru ka (Methods of Excavation for Fourteenth-Century Blue-and-White and Red-Underglaze Ceramics),” in Narasaki Shōichi sensei koki kinen ronbunshuu kankoukai (Editorial Committee for the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70th Birthday of Mr. Narasaki Shōichi), ed., *Narasaki Shōichi sensei koki kinen ronbunshuu*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70th Birthday of Mr. Narasaki Shōichi), Kyoto: Shinyosha, pp. 467-477.
- 2002 “Abbāsu asa hakudakuyū tōki ni ataeta Chūgoku hakujiwan no eikyō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White Porcelain Bowls on the Ceramics with White Opaque Glaze in the Abbasid Caliphate),” *Bulletin of Archaeology, the University of Kanazawa*, no. 26, pp. 64-75.
- 2002 “Iseki shutsudo no hahen ga kataru isurāmu tōki no hensen to ryūtsū (Discussion

on the Transition and Circulation of Islamic Ceramics on the Basis of Shards from Excavation Sites),” *History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Traditions: The Miscellany of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Japan Society of Oriental Ceramic Studies*, Tokyo: Japan Society of Oriental Ceramic Studies, p. 310.

佐々木達夫等

2005 〈發掘資料解釋と景觀復元によるジュルファルの都市的性格檢證〉，《オリエント》，48-1，頁26-48。

Sasaki, Tatsuo, et al.

2005 “Verification of Urbanization at *Julfar* Excavated Houses, Finds and Topography,” *Bulletin of the Society for Near Eastern Studies in Japan*, vol. 48, no. 1, pp. 26-48.

佐倉孫三

1961 《台風雜記》，臺北：臺灣銀行。

Sakura, Magozou

1961 *Taifeng zaji* (A Miscellany of Customs in Taiwan), Taipei: Bank of Taiwan.

佐原真

1996 〈手から道具へ・石から鉄へ〉，《図説 日本文化の歴史》1〈先史、原史〉（小學館，1979），後收入，同氏《考古学千夜一夜》，東京：小學館，小學館ライブラリー-88，頁172-176。

2005 《道具の考古学》，東京：岩波書店。

Sahara, Makoto

1996 “Te kara dōgu e, ishi kara tetsu e (From Hand to Tool, From Stone to Iron),” *Zusetsu nihon bunka no rekishi*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Japanese Culture), vol. 1, Senshi genshi (Prehistory and Protohistory), Shogakukan, 1979, in Makoto Sahara, *Koukogaku senya ichiya* (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of Archaeology), Tokyo: Shogakukan, Shogakukan Library 88, pp. 172-176.

2005 *Dougu no koukogaku* (An Archaeology of Tools), Tokyo: Iwanami shoten.

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

1995 《世界・焔の博覽會プレイベット 柴田コレクションIV—古伊萬里様式の成立と展開—》，佐賀縣：九州陶磁文化館。

Kyushu Ceramic Museum

1995 *Shibata Collection Part 4: the Preliminary Event for the World Ceramics Expositi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Ko-Imari Style*, Saga: Kyushu Ceramic Museum.

佐藤豊三

1976 〈室町殿行幸御饗記〉，收入《東山御物》，東京：根津美術館，頁160-168。

Satō, Toyozō

1976 “Muromachidono gyoko okazariki (Record of the Decoration and Display for the Imperial Visit to Muromachi Palace),” in *Higashiyama gyobutsu* (The Higashiyama Collection), Tokyo: Nezu Museum, pp. 160-168.

利馬竇 (Mathew Ricci) 著, 何高濟等譯

1983 《利瑪竇中國札記》, 北京: 中華書局。

Mathew Ricci; He, Gao-ji, et al., trans.

1983 *Li ma dou zhongguo zhaji* (Regni Chinensis Descripti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尾崎洵盛

1935 〈砧手青磁考〉1, 《やきもの趣味》1卷1期, 頁7-11。

1935 〈砧手青磁考〉2, 《やきもの趣味》1卷2期, 頁13-18。

1935 〈砧手青磁考〉3, 《やきもの趣味》1卷3期, 頁14-18。

Ozaki, Nobumori

1935 “Kinutade seiji kō (Research on Kinutade Celadon),” 1, *Yakimono shumi* (Tastes for Ceramics), vol. 1, no. 1, pp. 7-11.

1935 “Kinutade seiji kō (Research on Kinutade Celadon),” 2, *Yakimono shumi* (Tastes for Ceramics), vol. 1, no. 2, pp. 13-18.

1935 “Kinutade seiji kō (Research on Kinutade Celadon),” 3, *Yakimono shumi* (Tastes for Ceramics), vol. 1, no. 3, pp. 14-18

尾野善裕

1999 〈北野天満宮所藏青磁貼花牡丹唐草文花瓶の朱漆銘と修理〉, 《學叢》, 31, 頁101-108。

Ono, Yoshihiro

1999 “Kitano tenmangū shozō seiji chōka botankarakusamon kabin no shu urushi mei to shūri (The Red-Painted Inscription on and Repair of a Celadon Vase with Peony and Arabesque Decal Pattern Collected in the Kitano Tenmangu Shrine),” *The Kyoto National Museum Bulletin*, no. 31, pp. 101-108.

李約瑟 (黃子政等譯)

1975 《中國之科學與文明》, 第6冊,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Needham, Joseph (Huang, Zi-zheng, et al., trans.)

1975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6,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村井康彦編

1983 《茶道聚錦》3・千利休, 東京: 小學館。

Murai, Yasuhiko, ed.

1983 *Chadō shūkin* (The Splendid Collections of the Tea Ceremony), vol. 3, Sen no Rikyū, Tokyo: Shogakukan.

赤井達郎等編

1989 《資料日本美術史》，京都：松柏社。

Akai, Tatsuro, et al., ed.

1989 *Shiryō nihon bijutsushi* (The Data of Japanese Art History), Kyoto: Shohakusha Publishing Company.

岡林孝作

2013 〈古墳出土鋤の使用法〉，奈良縣立橿原考古學研究所編，《橿原考古學研究所論集》，16，頁111-122。

Okabayashi, Kosaku

2013 “Kofun shutsudo kasugai no shiyōhō (The Use of Staples Excavated from Ancient Tombs),”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Kashihara, Nara Prefecture, ed., *Kashihara kōkō gaku kenkyūjo ronshū* (Essay Collec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Kashihara), vol. 16, pp. 111-122.

林巳奈夫

1999 《中國古玉器總說》，東京：吉川弘文館。

Hayashi, Minao

1999 *Surveys on Ancient Chinese Jades*, Tokyo: Yoshikawa kōbunkan.

林屋晴三

2015 《名碗は語る》，東京：世界文化社。

Hayashiya, Seizo

2015 *Meiwan wa kataru* (On Famous Bowls), Tokyo: Sekaibunka Publishing Inc.

武内啓

2014 〈汐留遺跡（伊達家）における出土貿易陶磁の様相〉，《貿易陶磁研究》，34期，頁56-65。

Takeuchi, Akira

2014 “Trade Ceramics Unearthed at the Shiodome Site (Date Clan),” *Trade Ceramics Studies*, no. 34, pp. 56-65.

近世貿易陶磁調査、研究グループ

2013 《近世都市江戸の貿易陶磁器資料集1》，東京：近世貿易陶磁調査、研究グループ。

Kinsei boueki toujiki chousa kenkyuu gurūpu (Survey and Study Group of Early-Modern Trade Ceramics)

2013 *Kinsei toshi Edo no bōeki tōjiki shiryōshū* (Document Collection of Trade Ceramics in the Early-Modern City Edo), vol. 1, Tokyo: Kinsei boueki toujiki chousa kenkyuu gurūpu (Survey and Study Group of Early-Modern Trade Ceramics).

金武正紀

2008 〈元青花龍文壺〉，《今歸仁グスク》，2，無頁數。

Kin, Seiki

- 2008 “Gen seika ryū montsubo (Yuan Blue-and-White Jars with Interlaced Dragon Design),” *Nakijin Gusuku* (Nakijin Castle), no. 2, no page numbers.

長谷部樂爾

- 1972 《原色日本の美術》30・請來美術（陶藝），東京：小學館。

Hasebe, Gakuji

- 1972 *Genshoku nihon no bijutsu* (The Full-Colored Japanese Art), vol. 30, Shōrai bijutsu: Tougei (Imported Arts: Ceramics), Tokyo: Shogakukan.

南京市博物館

- 1973 〈江浦黃悅嶺南宋張同之夫婦墓〉，《文物》，4期，頁59-63, 55。  
2004 《六朝風采》，北京：文物出版社。

Nanjing Municipal Museum

- 1973 “Jiangpu huangyueling nansong zhangtongzhi fufu mu (Tomb of the Zhang Tong Couple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t Huangyueling in Jiangpu),” *Cultural Relics*, no. 4, pp. 59-63, 55.

- 2004 *The Six Dynasties: A Time of Splendor*,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南京市博物館（袁俊卿）

- 1972 〈南京象山5號、6號、7號墓清理簡報〉，《文物》，11期，頁23-36。

Nanjing Municipal Museum (Yuan, Jun-qing)

- 1972 “Nanjing xiangshan 5 hao, 6 hao, 7 hao mu qingli jianbao (A Brief Excavation Report on Tombs No. 5, 6, and 7 at Xiangshan in Nanjing),” *Cultural Relics*, no. 11, pp. 23-36.

南京博物院等

- 1985 〈江蘇丹徒磨盤墩遺址發掘報告〉，《史前研究》，2，頁71-84。

Nanjing Museum, et al.

- 1985 “Jangsu dantu mopandun yizhi fajue baogao (An Excavation Report on the Mopandun Site at Dantu in Jiangsu),” *Prehistory*, no. 2, pp. 71-84.

故宮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編

- 2005 《故宮博物院藏 古陶瓷資料選萃》，全二卷，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Palace Museum Ancient Ceramics Research Center, ed.

- 2005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Ancient Ceramics*, 2 vols., Beijing: Forbidden City Press.

宮城弘樹

- 2016 〈グスク出土陶磁器流通の一考察〉，收入龜井明德さん追悼文集刊行會編，《龜井明德氏追悼・貿易陶磁研究等論文集》，頁254-262。

Miyagi, Hiroki

- 2016 “Gusuku shutsudo tōjiki ryūtsū no ichi kōsatsu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Circulation of Ceramics Excavated from Gusuku Castle Sites),” in Kamei Meitoku san tsuitō bunshuu kankoukai (Editorial Committee for Collected Essays in Memory of Mr.

Kamei Meitoku), ed., *Kamei meitoku shi tsuitou boueki tōji kenkyuu tō ronbunshuu* (A Collection of Papers on Trade Ceramics in Memory of Mr. Kamei Meitoku), pp. 254-262.

家島彦一

1987 〈インド洋におけるシーラーフ系商人の交易ネットワークと物品の流通〉, 收入田邊勝美等編, 《シルクロード美術論集: 深井晋司博士追悼》, 東京: 吉川弘文館, 頁199-224。

Yajima, Hikoichi

1987 “Indoyō ni okeru shīrāfukei shōnin no kōeki nettowāku to buppin no ryūtsū (The Trade Network of Siraf Merchant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Goods in the Indian Ocean),” in Katsumi Tanabe, et al., eds., *Shirukurōdo bijutsu ronshuu: Fukai Shinji hakushi tsuitou*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Silk Road in Memory of Dr. Fukai Shinji), Tokyo: Yoshikawa kōbunkan, pp. 199-224.

座右寶刊行會編

1976 《世界陶磁全集》14・明, 東京: 小學館。

Zauho Kankokai, ed.

1976 *Sekai tōji zenshū* (Ceramic Art of the World), 14, Ming Dynasty, Tokyo: Shogakukan.

根津美術館編

1994 《館藏茶碗百撰》, 東京: 根津美術館。

Nezu Museum, ed.

1994 *One Hundred Tea Bowls from the Nezu Collection*, Tokyo: Nezu Museum.

根津美術館學藝部編

2014 《名画を切り、名器を継ぐ—美術にみる愛藏のかたち—》, 東京: 根津美術館。

Curatorial Division, Nezu Museum, ed.

2014 *Transforming Masterpieces: A Collector's Love Seen in Art: Special Exhibition Commemorating the 5th Anniversary of the Nezu Museum's Reopening*, Tokyo: Nezu Museum.

桑田忠親

1980 〈茶道爐邊ばなし〉, 收入《桑田忠親著作集》8, 東京: 秋田書店, 頁267-326。

Kuwata, Tadachika

1980 “Chadō rohen banashi (Fireside Chats on Japanese Tea Ceremony),” in *Kuwata tadachika chosakushū* (A Collection of Works by Kuwata Tadachika), vol. 8, Tokyo: Akita Shoten, pp. 267-326

桑原隲藏

1916 〈波斯灣の東洋貿易港に就て〉, 《史林》, 1卷3號, 頁1-24。

Kuwabara, Jitsuzo

1916 “Perushiawan no tōyō bōeki minato nit suite (On the Oriental Ports for Trade in the Persian Gulf),” *Journal of History*, vol. 1, no. 3, pp. 1-2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謝西營等)

2015 〈浙江慶元會溪南宋胡紘夫婦合葬墓發掘簡報〉,《文物》,7期,頁31-52。

Zhejia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et al. (Xie, Xi-ying, et al.)

2015 “The Excavation of the Couple of Hu Hong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t Huixi Village in Qingyuan County, Zhejiang,” *Cultural Relics*, no. 7, pp. 31-52.

浦添市教育委員會

2005 《浦添原遺跡—浦添中學校校舍改築事業に伴う發掘調査報告書》,浦添市:浦添市教育委員會。

Board of Education, Urasoe City

2005 *Urasoe gen iseki: Urasoe chūgakkō kōsha kaichiku jigyō ni tomonau hakkutsu chōsa hōkoku-sho* (Historic Ruins in Urasoe: The Reconstruction Project for Buildings of the Urasoe Junior High School and the Investigation Report), Urasoe: Board of Education, Urasoe City.

翁萬戈編著

1997 《陳洪綬》中卷・彩圖編,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Weng, Wan-ge

1997 *Chen Hongshou: His Life and Art*, vol. 2, Colored Picture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高島裕之

2014 〈江戸遺跡における明末以前の中國陶瓷—大型製品の受容に関する予察—〉,《貿易陶磁研究》,34期,頁133-143。

Takashima, Hiroyuki

2014 “Chinese Ceramics from Pre-Late Ming Era Excavated at the Edo Site, Tokyo: Perspective on Distribution of Large-Size Ceramics,” *Trade Ceramics Studies*, no. 34, pp. 133-143.

高橋義雄

1925 《大正名器鑑》第六編,東京:大正名器鑑編纂所。

1926 《大正名器鑑》第七編,東京:大正名器鑑編纂所。

Takahashi, Yoshio

1925 *Taishō meiki kagami* (A Mirror on the Famous Utensils in the Taishō Period), vol. 6, Tokyo: Taishōmeikikan hensanjo (Institute for the Compilation of *A Mirror on the Famous Utensils in the Taishō Period*).

1926 *Taishō meiki kagami* (A Mirror on the Famous Utensils in the Taishō Period), vol. 7, Tokyo: Taishōmeikikan hensanjo (Institute for the Compilation of *A Mirror on the Famous Utensils in the Taishō Period*).

亀井明德

2008 〈石川縣金澤市普正寺遺跡〉,《亞州古陶瓷研究》III,頁284-285。

2009 〈カラコルム出土陶瓷器穿孔の意味〉, 天野哲也等編, 《中世東アジアの周縁世界》, 東京: 同成社, 頁175-178。

2009 〈中國出土元青花瓷の研究〉, 《亞州古陶瓷研究》IV, 頁36-60。

2009 〈日本出土の元青花瓷の諸問題〉, 《亞州古陶瓷研究》IV, 頁75-107。

Kamei, Meitoku

2008 “Ishikawaken kanazawashi fushōji iseki (Fushōji Sites at Kanazawa City in Ishikawa Prefecture),” *Asian Ceramic Studies*, vol. 3, pp. 284-285.

2009 “Karakorumu shutsudo tōshiki senkō no imi (The Meaning of Perforation on Ceramics Excavated from Karakorum),” in Tetsuya Amano, ed., *Chūsei higashiajia no shūen sekai* (The Peripheral World of East Asia in the Middle Ages), Tokyo: Douseisha, pp. 175-178.

2009 “Chūgoku shutsudo moto seikaji no kenkyū (Research on the Yuan Blue-and-White Porcelain Excavated in China),” *Asian Ceramic Studies*, vol. 4, pp. 36-60.

2009 “The Problems of Yuan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Discovered in Japan,” *Asian Ceramic Studies*, vol. 4, pp. 75-107.

亀井明德等

2008 〈日本出土の元青花瓷資料集成〉, 《亞州古陶瓷研究》III, 頁1-304。

Kamei, Meitoku, et al.

2008 “Nihon shutsudo no moto seikaji shiryō shūsei (Compilation of Data on Yuan Blue-and-White Porcelain Excavated in Japan),” *Asian Ceramic Studies*, vol. 3, pp. 1-304.

亀井明德編

2009 《カラコルム遺跡出土陶瓷器調査報告書》, 第2冊, 東京: 専修大学文学アジア考古学研究室。

Kamei, Meitoku, ed.

2009 *The Ceramics Discovered from Kharkhorum Site*, vol. 2, Tokyo: Senshūdaigaku bungakubu ajia kōkogaku kenkyūshitsu (Research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in the College of Letters at Senshu University).

亀田修一

2004 〈日本の初期の釘、鋸が語るもの〉, 收入《文化の多様性と比較考古学2004》考古学研究会50周年記念論文集, 岡山市: 考古学研究会, 頁29-38。

Kameda, Shuichi

2004 “Nihon no shoki no kugi, kasugai ga kataru mono (Discussion on Nails and Staples in Early Japan),” *Cultural Diversities and Comparative Archaeology 2004: The Society of Archaeological Studies 50th Anniversary Volume*, Okayama: Society of Archaeological Studies, pp. 29-38.

國立中央博物館

1994 《岩寺洞》國立博物館古蹟調查報告第二十六冊, 首爾: 國立中央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 1994 *Excavation Report of the Amsa-dong Site*, Report of the Research of Antiquities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XXVI, Seoul: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

- 2001 《故宮書畫圖錄》19，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ed.

- 2001 *Illustrated Catalog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vol. 19,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編

- 1998 《陶磁器の文化史》，千葉：歷史民俗博物館振興會。

National Museum of Japanese History, ed.

- 1998 *Cultural History of Ceramic Ware*, Chiba: Foundation for Museums of Japanese History.

梁沁承

- 2014 《陶磁器修理復元事例研究》，公州：公州大學校大學院文化財保存科學科博士論文。

Yang, Pil-seung

- 2014 *A Study on Repair and Restoration Cases of Ceramics*, Kongju: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Science Graduate, School of Kongju National University.

畢梅雪 (Michèle Pirazzoli)，趙冰譯

- 1999 〈哈伊馬角酋長國朱爾法古城遺址出土的十四-十六世紀遠東陶瓷：斷代與評估經濟和文化狀況的參考〉，《法國漢學》，4，頁325-337。

Michèle Pirazzoli; Zhao, Bing, trans.

- 1999 “La Céramique Extrême-Orientale à Julfar dans L’émirat de Ra’s al-Khaimah (XIVe-XVIe Siècle): Indicateur Chronologique, Économique et Culturel,” *Sinologie Française*, no. 4, pp. 325-337.

章鴻釗

- 1993 《石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Zhang, Hong-zhao

- 1993 *Shi ya* (Lapidarium Sinicum: A Study of the Rocks, Fossils and Minerals as Known to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 Publishing House.

笠原政治編

- 1995 《臺灣原住民映象—淺井惠倫教授攝影集》，臺北：南天書局。

Kasahara, Masaharu, ed.

- 1995 *Taiwan yuanzhumin yingxiang: Qianjing huilun jiaoshou sheyingji* (Images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A Photography Collection by Prof. Asai Erin),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陳馨

2006 〈陶瓷修復技術之鋤釘補瓷技術的起源發展及其相關〉，《文博》，3期，頁49-58。

Chen, Xin

2006 “Taoci xiufu jishu zhi juding buci jishu de qi yuan fazhan ji qi xiangguan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Related Discussion of Staple Repair for Ceramics),” *Relics and Museology*, no. 3, pp. 49-58.

森田勉

1995 〈「樞府磁」に關する 二、三の資料〉，收入《大宰府陶磁器研究》，福岡：森田勉氏遺稿集・追悼集刊行會，頁116-123。

Morita, Tsutomu

1995 “‘Kururufuji’ ni kansuru ni san no shiryō (A Couple of Materials and Documents about Shufu Ware),” *Dazaifu toujiki kenkyū* (Studies on the Ceramics in Daizaifu), Fukuoka: Morita tsutomu shi ikōshū tsuitōshū kankōkai (Editorial Committee for the Posthumous Manuscripts of Morita Tsutomu and the Essays in Memory of Him), pp. 116-123.

森達也

2012 〈龍泉窯青瓷雜感（4）鋤留について〉，《陶說》，716，頁57-59。

Mori, Tatsuya

2012 “Ryūsengama seiji zakkan kasukaitome ni tsuite (Miscellaneous Thoughts on Longquan Celadon, IV: Ceramic Stapling),” *Tosetsu*, no. 716, pp. 57-59.

森達也等編

2012 《日本人の愛した中国陶磁 龍泉窯青磁展》，愛知縣：龍泉窯青磁展開催實行委員會。

Mori, Tatsuya, et al. eds.

2012 *Longquan Ware: Chinese Celadon Beloved of the Japanese*, Aichi: Ryūsengama seijiten kaisai jikkō iinkai (Organization and Executive Committee for the Exhibition of Longquan Celadon).

黃時鑑等

2006 《中國三百六十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Huang, Shi-jian, et al.

2006 *360 Professions in China*,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 Publishing House.

奥田直榮

1976 〈東山御物〉，收入《東山御物》，東京：根津美術館，頁105-108。

Okuda, Naoshige

1976 “Higashiyama gobutsu (The Higashiyama Collection),” *Higashiyama gobutsu* (The Higashiyama Collection), Tokyo: Nezu Museum, pp. 105-108.

鈴木重治

1992 〈出土陶磁器にみる修復技法〉，收入《考古學と生活文化》同志社大學考古學シリーズV，京都：同志社大學考古學シリーズ刊行會，頁395-410。

Suzuki, Shigeharu

- 1992 “Shutsudo tōjiki ni miru shūfuku gihō (Repair Techniques Seen on Excavated Ceramics),” *Koukogaku to seikatsu bunka* (Archaeology and the Culture of Daily Life), *Dōshisha daigaku koukogaku shirīzu* (Doshisha University Archaeology Series) 5, Kyoto: Dōshisha daigaku kōkogaku shirīzu kankōkai (Editorial Committee of Doshisha University Archaeology Series), pp. 395-410.

鈴木敬編

- 1983 《中國繪畫總合圖錄》3，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Suzuki, Kei, ed.

- 1983 *Comprehensive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Chinese Paintings*, vol. 3,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鄭文彰

- 2002 《臺灣早期飲食器物》，臺南縣：臺南縣文化局。

Cheng, Wen-chang

- 2002 *Taiwan zaoqi yinshi qiwu* (Eating Utensils in Early Taiwan), Tainan County: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Tainan County Government.

橫濱ユーラシア文化館編

- 2003 《橫濱ユーラシア文化館》，橫濱：橫濱ユーラシア文化館。

Yokohama Museum of EurAsian Cultures, ed.

- 2003 *Yokohama Museum of EurAsian Cultures*, Yokohama: Yokohama Museum of EurAsian Cultures.

穆根來等譯

- 1983 《中國印度見聞記》，北京：中華書局。

Mu, Gen-lai et al. trans.

- 1983 *Zhongguo yindu jianwen lu* (Account of China and India),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遼寧省博物館

- 1983 《遼寧省博物館》中國博物館叢書·卷3，北京：文物出版社。

Liaoning Provincial museum

- 1983 *Liaoning sheng bowuguan* (Liaoning Provincial Museum), *Zhongguo bowuguan congshu* (The Museums of China), vol. 3,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編

- 2001 《伝えられた名宝 美の継承展》，東京：靜嘉堂美術館。

Seikado Bunko Art Museum, ed.

- 2001 *Tsutaerareta meihō: Bi no keishou ten* (Passed-Down Treasures: Exhibition on the Inheritance of Beauty), Tokyo: Seikado Bunko Art Museum.

謝明良

- 2005 〈記「黑石號」(Batu Hitam) 沈船中的中國陶瓷器〉, 原載《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 13 (2002), 後收入《貿易陶瓷與文化史》, 臺北: 允晨文化, 頁81-134。
- 2005 〈晚明時期的宋官窯鑑賞與「碎器」的流行〉, 原載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經濟史、都市文化與物質文化》, 臺北: 中央研究院, 2002, 後收入《貿易陶瓷與文化史》, 頁361-381。
- 2005 〈十五至十六世紀日本的中國陶瓷鑑賞與收藏〉, 原載《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 17 (2004), 後收入《貿易陶瓷與文化史》, 臺北: 允晨文化, 頁317-339。
- 2007 〈乾隆的陶瓷鑑賞觀〉, 原載《故宮學術季刊》, 21卷2期 (2003), 收入《中國陶瓷史論集》, 臺北: 允晨文化, 頁239-270。
- 2008 〈關於鋤釘補瓷術〉, 收入《陶瓷手記 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 臺北: 石頭出版, 頁177-189。

Hsieh, Ming-liang

- 2005 "A Discussion of the Chinese Ceramics Recovered from the Wreck of the Batu Hitam," *Taida Journal of Art History*, no. 13 (2002), in Ming-liang Hsieh, *Maoyi taoci yu wenhuashi* (Trade Ceramics and Cultural History), Taipei: Yunchen Culture Ltd., pp. 81-134.
- 2005 "Wanming shiqi de song guanyao jianshang yu 'suiqi' de liuxing (Appreciation of Song Official Kilns in the Late Ming Period and the Popularity of "Crazed Ceramics")," Liu Ts'ui-jung et al., eds., *Economic History, Urban Culture and Material Culture*, Papers from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History Section,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2002, in Ming-liang Hsieh, *Maoyi taoci yu wenhuashi* (Trade Ceramics and Cultural History), pp. 361-381.
- 2005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y Japanese connoisseurship of Chinese Ceramics," *Taida Journal of Art History*, no. 17 (2004), in Ming-liang Hsieh, *Maoyi taoci yu wenhuashi* (Trade Ceramics and Cultural History), pp. 317-339.
- 2007 "Ch'ien-lung's Ceramics Connoisseurship,"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vol. 21, no. 2 (2003), in Ming-liang Hsieh, *Zhongguo taoci shi lunji*, Taipei: Yunchen Culture Ltd., pp. 239-270.
- 2008 "Guanyu juding buci shu (On Ceramic Staple Repair)," *Taoci shouji: Taoci shi sisuo he caozuo de guiji* (Notes on Ceramics: Thoughts and Practices about the History of Ceramics), Taipei: Rock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pp. 177-189.

瀋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 2008 《瀋陽考古發現六十年·出土文物卷》, 瀋陽: 遼海出版社。

Shenya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ed.

2008 *Shenyang kaogu faxian liushi nian: Chutu wenwu juan* (Sixty Years of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in Shenyang: The Volume of Excavated Cultural Relics), Shenyang: Liaohai Publishing House.

簡榮聰

2001 《臺灣碟盤藝術》，臺北縣：臺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Chien, Jung-tsung

2001 *Taiwan diepan yishu* (The Art of Dishes and Plates), Taipei County: Taipei County Yingge Ceramics Museum.

櫻井清彦等編

1992 《エジプト・イスラーム都市アル=フスタート遺跡發掘調査1978~1985年》，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第1分冊 / 本文編；第2分冊 / 圖版、寫真版編。

Sakurai, Kiyohiko, et al., ed.

1992 *Ejiputo isurāmu toshi aru: Fusutāto iseki hakkutsu chōsa 1978-1985 nen* (Excavation Surveys on the Al-Fustat Site, an Islamic City in Egypt, in 1978-1985), 2 vols. (text in vol. 1; plates and photos in vol. 2) Tokyo: Waseda University Press.

Atasoy, Nurhan and Julian Raby

1989 *IZNIK: The Pottery of Ottoman Turkey*, London: Alexandria Press.

Bird, Joanna

2013 “An Elaborately Repaired Flagon and Other Pottery from Roman Cremation Burials at Farley Heath,” *Surrey Archaeological Collections*, 97, pp. 151-159.

Carswell, John

1999-2000 “Kharakhoto and Recent Research in Inner Mongolia,” *Oriental Art*, vol. XLV, no. 4, pp. 19-32.

English, Judie

2005 “Two Examples of Roman Pottery Repair in Antiquity,” *Surrey Archaeological Collections*, 92, pp. 263-265.

Garachon, Isabelle

2010 “Old Repairs of China and Glass,” *The Rijksmuseum Bulletin*, 58, pp. 34-55.

Gyllensvärd, Bo

1975 “Recent Finds of Chinese Ceramics at Fustat, II,”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47, p. 93.

Hansford, S. Howard

1950 *Chinese Jade Carving*, London: Lund Humphries & Co, Ltd.

Hansman, J.

1985 *Julfar, an Arabian Port-Its Settlement and Far Eastern Ceramic Trade From the 14<sup>th</sup> to the 18<sup>th</sup> Centuries*,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 Kaikodo Journal* 懷古堂, IX (Autumn 1998), p. 177.
- Karashima, Noboru  
2004 *In Search of Chinese Ceramic-sherds in South India and Sri Lanka*, Tokyo: Taisho University Press.
- Kessler, Adam  
1993 *Empires Beyond the Great Wall*, Los Angele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Los Angeles.
- Krahl, Regina, et al.  
1986 *Chinese Ceramics Topkapi Saray Musuem, Istanbul, A Complete Catalogue*, London: Sotheby's.
- Lu, P. J., et al.  
2005 "The Earliest Use of Corundum and Diamond, in Prehistoric China," *Archaeometry*, 47: 1 (Feb), pp. 1-12.
- Parsons, C. S. M., and F. H. Curl  
1963 *Chinese Mending and Restoration*, London: Faber & Faber.
- Peña, J. Theodore  
2007 *Roman Pottery i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ierson, Stacey, and Amy Barnes  
2002 *A Collector's Vision: Ceramics for the Qianlong Emperor*,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 Pope, J. A.  
1952 *Fourteenth-Century Blue-and-White: 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ain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zi*, Washington D. C.: Freer Gallery of Art.  
1981 *Chinese Porcelain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Washington D. C.: Freer Gallery of Art, 1956; Reprinted.
- Rawson, Jessica  
1987-1988 "The Export of Tang Sancai Wares: Some Recent Research," *Transaction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 52, pp. 39-61.
- Smart, Ellen S.  
1995-1977 "Fourteen Century Chinese Porcelain from a Tughlog Palace in Delhi,"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 41, pp. 199-230.
- Stein, M. A.  
1937 *Archaeological Reconnaissances in North-Western India and South-Eastern Iran*, London.
- Whitehouse, David  
1971 "Excavation at Siraf, Fourth Interim Report," *IRAN*, vol.IX.  
1972 "Excavation at Siraf, Fifth Interim Report," *IRAN*, vol.X.  
1973 "Chinese Stoneware from Siraf : the Earliest Finds,"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New Jersey: Noyes Press, pp. 241-255.

2009 *Siraf: History, Topography and Environment*, Oxford: Oxow Books.  
Williams, N.

1983 *Porcelain Repair and Restoration*,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 網路論文與資料庫

內蒙古博物館

〈2016年“5.18國際博物館日”主會場特展——“夢幻契丹”〉，網址：<http://nmgbwy.com/zldt/1306.jhtml>（檢索日期2016/10/11）。

Inner Mongolia Museum

“‘Glory of Khitan’: The Main Exhibi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Museum Day on May 18, 2016,”  
retrieved from <http://nmgbwy.com/zldt/1306.jhtml> on October 11, 2016.

圖版出處

- 圖1 江蘇省三星村聯合考古隊（王根富等），〈江蘇金壇三星村新石器時代遺址〉，《文物》，2004年2期，頁23，圖53之1。
- 圖2 瀋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瀋陽考古發現六十年·出土文物卷》（瀋陽：遼海出版社，2008），頁13。
- 圖3 橫濱ユーラシア文化館編，《橫濱ユーラシア文化館》（橫濱：橫濱ユーラシア文化館，2003），頁14，圖1。
- 圖4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張志忠等），〈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10期，頁46，圖60。
- 圖5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編著，《北京亦莊考古發掘報告2003-2005》（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彩版58之1。
- 圖6 笠原政治編，《臺灣原住民映象—淺井惠倫教授攝影集》（臺北：南天書局，1995），頁150，圖116。
- 圖7 佐原真，《道具の考古学》（東京：岩波書店，2005），頁461，圖48。
- 圖8 林巴奈夫，《中国古玉器総説》（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頁34。
- 圖9 佐原真，《道具の考古学》（東京：岩波書店，2005），頁43，圖47。
- 圖10 Rudolf P. Hommel（国分直一譯），《中国手工業誌》（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92），頁390，圖366。
- 圖11 黃時鑑等，《中國三百六十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圖23。
- 圖12 鈴木敬編，《中國繪畫總合圖錄》3（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頁60。
- 圖13 寺島良安（島田勇雄等譯注），《和漢三才圖會》5（東京：平凡社，1986），東洋文庫462，卷第二十四，頁34。
- 圖14a-b 荷蘭阿姆斯特丹國立美術館（RIJKS Museum, Amsterdam）王靜靈博士提供。
- 圖15 石山洋解說，《七十一番職人歌合/職人尽繪/彩画職人部類》江戶科學古典叢書6（東京：恆和出版，1977），頁74-75。
- 圖16 C. S. M. Parsons, F. H. Curl, *China Mending and Restoration* (London: Faber & Faber, 1963, pl. 6.
- 圖17 田邊勝美，〈アケメネス朝ペルシアの美術〉，收入《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卷16（東京：小學館，2000），頁261，圖226。
- 圖18a-b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第二工作隊等（汪盈等），〈內蒙古巴林左旗遼上京宮城城牆2014年發掘簡報〉，《考古》，2015年12期，頁91圖32之10、頁91圖34。
- 圖19a-b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第二工作隊等（汪盈等），〈內蒙古巴林左旗遼上京宮城城牆2014年發掘簡報〉，《考古》，2015年12期，頁91圖32之3、頁92圖36。

- 圖20 亀井明德編，《カラコルム遺跡出土陶磁器調査報告書》，第2冊（東京：専修大学文学部アジア考古学研究室，2009），頁99，圖24。
- 圖21a-b 香港私人藏。
- 圖22a-b 筆者攝。
- 圖23a-b 筆者攝。
- 圖24 C. B. 吉謝列夫等（孫危譯），《古代蒙古城市》（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彩版壹壹之一。
- 圖25a-b 亀井明德編，《カラコルム遺跡出土陶磁器調査報告書》，第2冊（東京：専修大学文学部アジア考古学研究室，2009），頁26。
- 圖26 作品現藏臺灣臺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筆者攝。
- 圖27a-b 〈2016年“5.18國際博物館日”主會場特展——“夢幻契丹”〉，網址：<http://nmgbyw.com/zldt/1306.jhtml>（檢索日期2016/10/11）
- 圖28a-b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包頭燕家梁遺址發掘報告》下（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彩版158。
- 圖29a-b Adam Kessler, *Empires Beyond the Great Wall* (Los Angele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Los Angeles, 1993), p. 139; John Carswell, “Kharakhoto and Recent Research in Inner Mongolia,” *Oriental Art*, vol. XLV, no. 4 (1999-2000), p. 25, pl. 14.
- 圖30a-b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書畫圖錄》19（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頁207。
- 圖31 Stacey Pierson with Amy Barnes, *A Collector's Vision: Ceramics for the Qianlong Emperor*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2002), p. 55, pl. 45.
- 圖32a-b *Kaikodo Journal* 懷古堂, IX (Autumn 1998), p. 177, pl. 71-1.
- 圖33a 根津美術館學藝部編，《名画を切り、名器を継ぐ—美術にみる愛蔵のかたち—》（東京：根津美術館，2014），頁124，圖72。
- 圖33b 林屋晴三，《名碗は語る》（東京：世界文化社，2015），頁15。
- 圖34a-b 森達也等編，《日本人の愛した中国陶磁 龍泉窯青磁展》（龍泉窯青磁展開催實行委員會，2012），頁52，圖45。
- 圖35 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編，《陶磁器の文化史》（千葉縣：財團法人歷史民俗博物館振興會，1998），頁104，圖27。
- 圖36 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編，《陶磁器の文化史》（千葉縣：財團法人歷史民俗博物館振興會，1998），頁104，圖27。
- 圖37 高島裕之，〈江戸遺跡における明末以前の中國陶磁—大型製品の受容に関する予察—〉，《貿易陶磁研究》，34（2014），頁140，圖20。
- 圖38 近世貿易陶磁調査、研究グループ，《近世都市江戸の貿易陶磁器資料集1》（東京：近世貿易陶磁調査、研究グループ，2013），頁415，圖398。
- 圖39 亀井明德，〈石川縣金澤市普正寺遺跡〉，《亞州古陶瓷研究》，III（2008），頁284。

- 圖40 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世界・焔の博覽會プレイベット 柴田コレクションIV—古伊萬里様式の成立と展開—》（佐賀縣：九州陶磁文化館，1995），頁35，圖33。
- 圖41 日本文化廳主任調查官今井敦提供。
- 圖42 三井文庫，《三井の名碗三十撰》（東京：三井文庫，1995），頁30-31，圖11。
- 圖43 大阪歷史博物館編，《豪商鴻池—その暮らしと文化》（大阪：東方出版，2006），頁50，圖81。
- 圖44a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編，《伝えられた名宝 美の承展》（東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2001），圖19。
- 圖44b-f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筆者攝。
- 圖45a 根津美術館學藝部編，《名画を切り、名器を継ぐ—美術にみる愛藏のかたち—》（東京：根津美術館，2014），頁128，圖76。
- 圖45b 尾野善裕，〈北野天満宮所藏青磁貼花牡丹唐草文花瓶の朱漆銘と修理〉，《學叢》，31（1999），頁104，插圖7。
- 圖46 筆者實見攝影。
- 圖47 鄭文彰，《臺灣早期飲食器物》（臺南縣：臺南縣文化局，2002），頁40。
- 圖48a-b 國立中央博物館，《岩寺洞》國立博物館古蹟調查報告第二十六冊（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1994），頁8彩圖4；頁181圖69之1。
- 圖49 梁泌承，《陶磁器修理復元事例研究》（公州：公州大學校大學院文化財保存科學科博士論文，2014），頁33，圖11。
- 圖50 龜井明德等，〈日本出土の元青花瓷資料集成〉，《亞州古陶瓷研究》，III（2008），頁222，圖50。
- 圖51 浦添市教育委員會，《浦添原遺跡—浦添中學校校舍改築事業に伴う發掘調査報告書》（浦添市：浦添市教育委員會，2005），圖版36之41。
- 圖52 村井康彥編，《茶道聚錦》3・千利休（東京：小學館，1983），圖108、109。
- 圖53 翁萬戈編著，《陳洪綾》中卷・彩圖編（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7），圖8。
- 圖54 Noboru Karashima, *In Search of Chinese Ceramic-sherds in South India and Sri Lanka* (Tokyo: Taisho University Press, 2004), pl. 27.
- 圖55a-b *Transaction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 41 (1975-1977), p. 217, pl. 78.
- 圖56a John Carswell, *Blue &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British Museum, 2000), p. 44, pl. 47.
- 圖56b *Fourteenth-Century Blue-and-White: 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ain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zi* (Washington D. C.: Freer Gallery of Art, 1952), pl. 20.
- 圖57 佐々木達夫，〈英国の博物館所藏の遺跡出土中国陶磁器〉，《金沢大学文学部論集》（史学科篇），6（1986），頁22，圖15。

- 圖58a-b 畢梅雪 (Michèle Pirazzoli), 趙冰譯, 〈哈伊馬角酋長國朱爾法古城遺址出土的十四—十六世紀遠東陶瓷: 斷代與評估經濟和文化狀況的參考〉, 《法國漢學》, 4 (1999), 頁336, 圖8及頁337, 圖9。
- 圖59 佐々木達夫, 〈遺跡出土の破片が語るイスラーム陶器の變遷と流通〉, 收入東洋陶磁學會三十周年記念, 《東洋陶磁史—その研究の現在》(東京: 東洋陶磁學會, 2002), 頁310及頁16, 圖77。
- 圖60 Hansman, J., *Julfar, an Arabian Port-Its Settlement and Far Eastern Ceramic Trade From the 14<sup>th</sup> to the 18<sup>th</sup> Centuries*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85), pl. I-I, pl. v-p.
- 圖61 佐々木達夫, 〈アッバース朝白濁釉陶器にえ与る中国白磁碗の影響〉, 《金沢大学考古学紀要》, 26 (2002), 頁74, 圖10。
- 圖62 佐々木達夫, 〈アッバース朝白濁釉陶器にえ与る中国白磁碗の影響〉, 《金沢大学考古学紀要》, 26 (2002), 頁73, 圖7。
- 圖63a-c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陳玉秀女士提供。
- 圖64a-b 櫻井清彦等編, 前引《エジプト・イスラーム都市アル=フスタート遺跡發掘調査1978~1985年》, 圖版、寫真版編, 頁441, 圖版1-7, 頁501, 寫真1-8。
- 圖65a-b 櫻井清彦等編, 前引《エジプト・イスラーム都市アル=フスタート遺跡發掘調査1978~1985年》, 圖版、寫真版編, 頁455, 圖版8-10。
- 圖66 シチリアの古代ギリシア展編集委員會編, 《シチリアの古代ギリシア展》(甲府: 山梨縣立美術館, 1984), 圖622。
- 圖67 Joanna Bird, “An Elaborately Repaired Flagon and other Pottery from Roman Cremation Burials at Farley Heath,” *Surrey Archaeological Collections*, 97 (2013), p. 4, fig. 2-4.
- 圖68 J. Theodore Peña, *Roman Pottery i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38, fig. 8.12.
- 圖69 J. Theodore Peña, *Roman Pottery i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40, fig. 8.13.
- 圖70 Isabelle Garachon, “Old Repairs of China and Glass,” *The Rijksmuseum Bulletin*, 58 (2010), p.37, fig. 4~7.
- 圖71 Isabelle Garachon, “Old Repairs of China and Glass,” *The Rijksmuseum Bulletin*, 58 (2010), p.38, fig. 9.
- 圖72 Isabelle Garachon, “Old Repairs of China and Glass,” *The Rijksmuseum Bulletin*, 58 (2010), p.39, fig. 10.
- 圖73 Isabelle Garachon, “Old Repairs of China and Glass,” *The Rijksmuseum Bulletin*, 58 (2010), p.43, fig. 17.
- 圖74 Regina Krahl, et al., *Chinese Ceramics Topkapi Saray Musuem, Istanbul, A Complete Catalogue* (London: Sotheby's, 1986), vol. II, p. 513, fig. 603.

- 圖75 Regina Krahl, et al., *Chinese Ceramics Topkapi Saray Musuem, Istanbul, A Complete Catalogue*, vol. II, p. 826, fig. 1670.
- 圖76 Nurhan Atasoy and Julian Raby, *IZNIK: The Pottery of Ottoman Turkey* (London: Alexandria Press, 1989), fig. 283.
- 圖77 Isabelle Garachon, “Old Repairs of China and Glass,” *The Rijksmuseum Bulletin*, 58 (2010), p.45, fig. 22.
- 圖78 Charlottenburg Palace, ancient palace. China cabinet, detail of the south side. Photo: Rainer Gaertner. 翻拍自明信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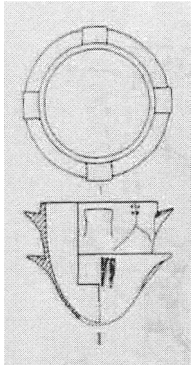


圖1 江蘇省金壇市三星村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陶釜 線繪圖 H 28.5cm



圖2 瀋陽新民市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陶罐 H 25cm



圖3 傳伊朗德黑蘭 (Tehran) 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鹿紋陶鉢 D 22.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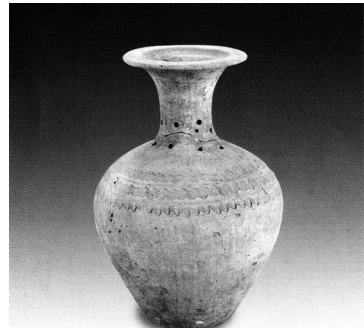


圖4 山西省大同北魏墓出土長頸壺 H 19.1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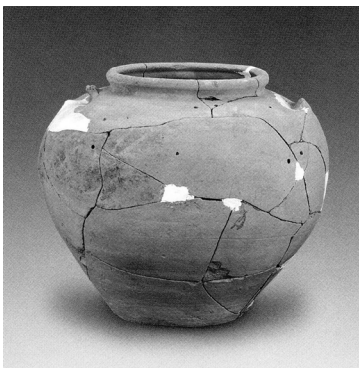


圖5 北京亦莊唐墓 (80號地M9) 出土大口罐 H 29.3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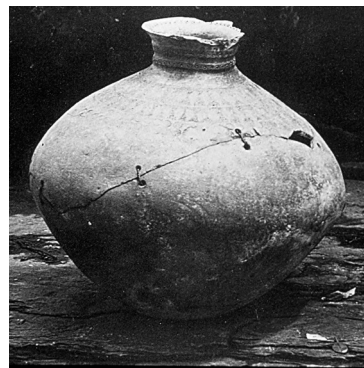


圖6 臺灣排灣族傳世陶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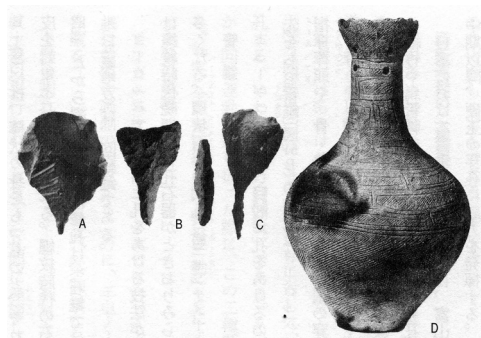


圖7 日本繩紋時代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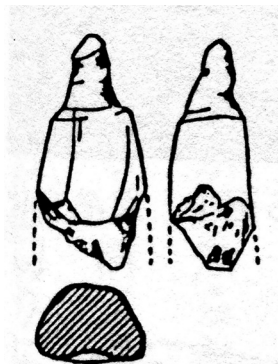


圖8 大連文家屯新石器時代玉石作坊出土的砂岩石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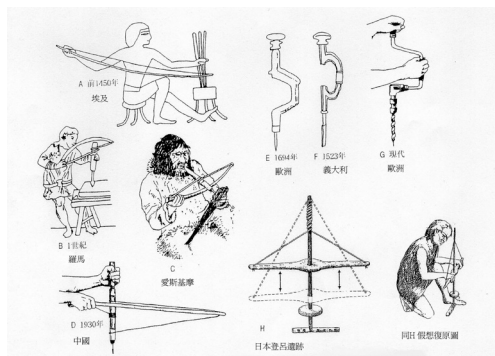


圖9 世界錐鑽舉例  
A~D: 弓鑽 E~G: 曲柄鑽 H: 舞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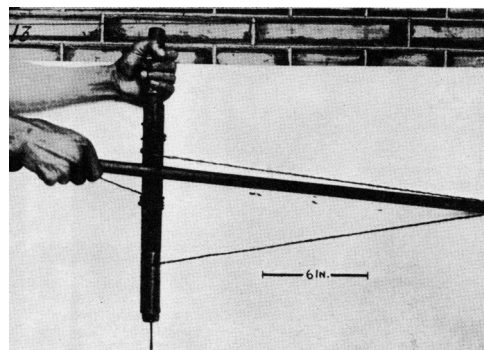


圖10 1930年代上海的弓鑽



圖11 18世紀中國外銷畫家蒲呱 (Puqua)  
水粉畫



圖12 清末鄒壻祖《風俗圖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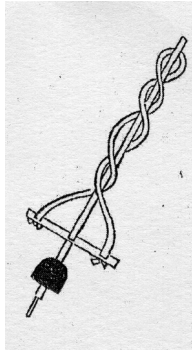


圖13 日本正德三年(1712)《和漢三才圖會》的「舞錐」



圖14a 清人倣戴進(1388—1462)冊頁所見舞鑽



圖14b 同上局部



圖15 狩野養信(1796—1846)、狩野雅信(1823—1880)父子摹繪《七十一番職人歌合》繪卷第三十二番「念珠挽」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16 二十世紀初期歐洲的鋤瓷婦人



圖17 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Dynasty)宮殿基壇石所見金屬鋤釘(B.C. 559—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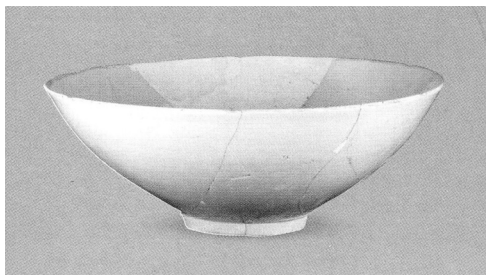


圖18a 定窯白瓷花口碗  
內蒙古巴林左旗遼上京宮城城牆出土  
D 20.8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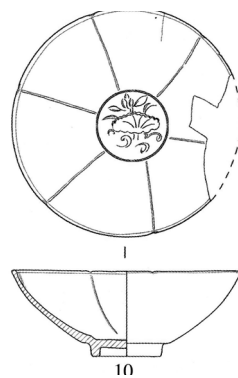


圖18b 同上 線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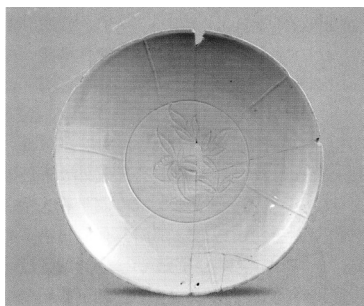


圖19a 定窯白瓷花口盤  
內蒙古巴林左旗遼上京宮城城牆出土  
D 20.4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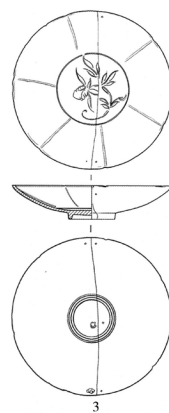


圖19b 同上 線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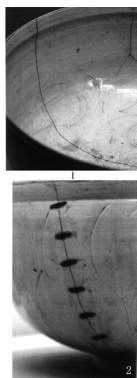


圖20 定窯白瓷鯨  
呼和浩特和林格爾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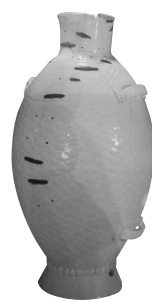


圖21a 晚唐白瓷魚形穿帶壺 香港私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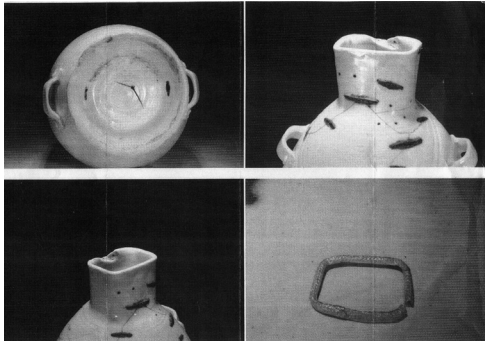


圖21b 同上局部



圖22a 磁州窯黑釉褐彩罐 臺灣私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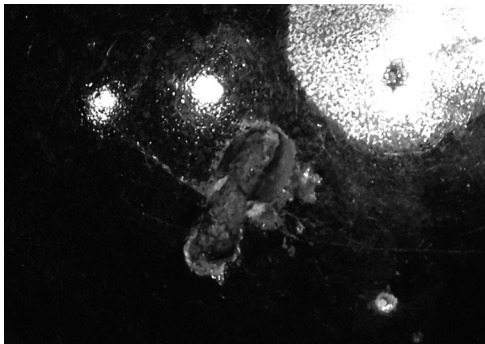


圖22b 同上局部



圖23a 傳浙江省臨安皇城遺址採集的定窯白瓷殘片 臺灣私人藏



圖23b 同上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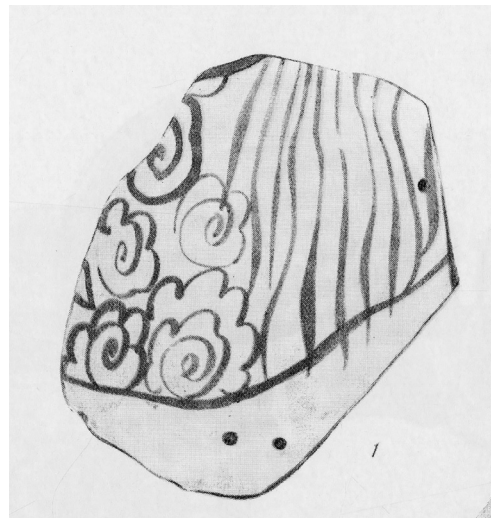


圖24 蒙古哈喇和林 (Kharkhorum) 出土  
磁州窯系釉下褐彩罐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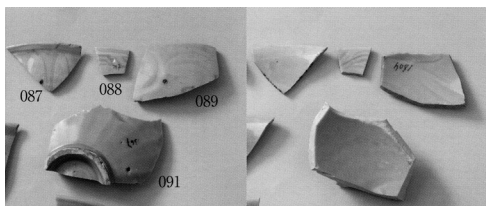


圖25a 蒙古哈喇和林 (Kharkhorum) 出土元代龍泉窯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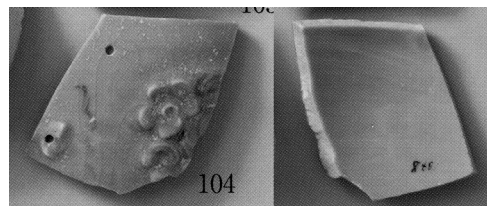


圖25b 同上



圖26 元代青花玉壺春瓶頸部殘件  
額納濟河黑水城遺址 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藏



圖27a 內蒙古多倫縣遼聖宗貴妃墓出土越窯  
青瓷盒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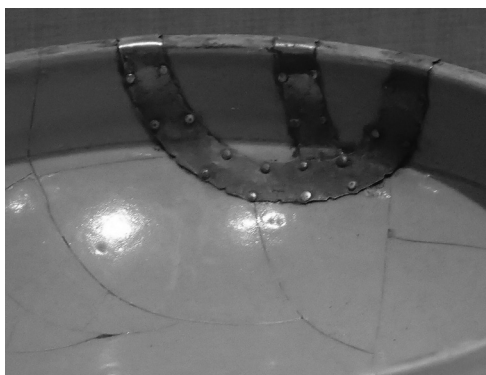


圖27b 同上局部



圖28a 包頭市燕家梁出土元青花碗  
D 17cm



圖28b 同上 俯視圖



圖29a 內蒙托克托縣徵集的元青花折沿盤  
D 40 cm



圖29b 同上背面



圖30a 王問《煮茶圖卷》（1558）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0b 同上局部



圖31 釉上彩瓷盤 清初  
大英博物館大衛德基金會藏 D 13.2cm



圖32a 「富貴平安」木雕 私人藏  
18~19世紀 D 31.4cm



圖32b 同上銅釘酒壺局部



圖33a 南宋龍泉窯「馬蝗絆」銘青瓷碗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D 15.4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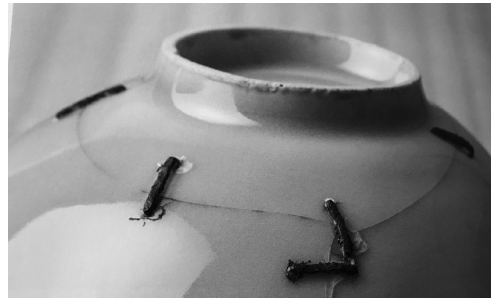


圖33b 同上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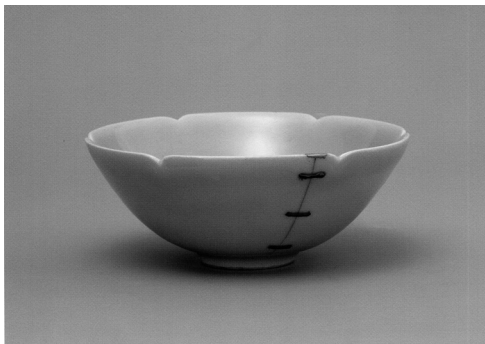


圖34a 南宋龍泉窯青瓷碗  
マスコ美術館藏 D 15.4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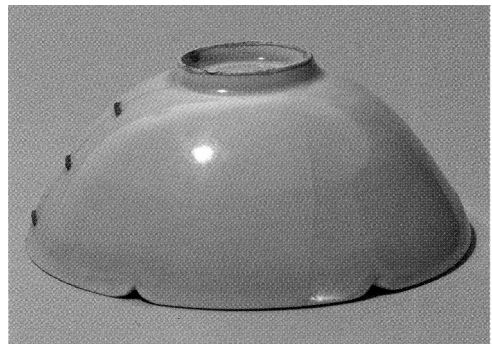


圖34b 同上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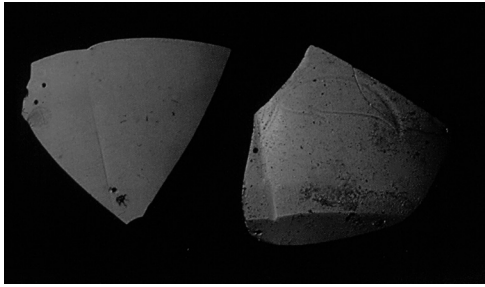


圖35 帶鋤孔的定窯白瓷鉢殘片  
日本福井縣一乘谷遺址出土



圖36 帶鋤孔的龍泉窯青瓷瓶殘件  
日本福井縣一乘谷遺址出土



圖37 帶鋤孔的龍泉窯青瓷鉢殘片  
日本東京大學本郷構內御殿下記念館  
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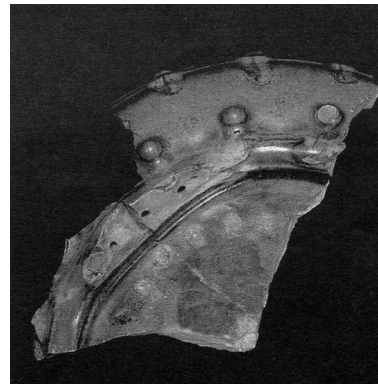


圖38 帶鋤孔的鈎窯鼓釘式盆殘片  
日本東京汐留遺址出土



圖39a 帶鋤孔的元代青花瓷殘片  
日本石川縣金澤市普正寺遺址出土



圖39b 同上局部



圖40a 日本伊萬里燒五彩持傘婦人紋盤 1730~1750年 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藏  
D 27cm



圖40b 同上背底



圖41 元代龍泉窯青瓷鳳尾瓶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今井敦提供



圖42a 十六世紀「須彌」銘朝鮮王朝井戶茶碗 內側 三井紀念美術館藏 D 14.8cm



圖42b 同上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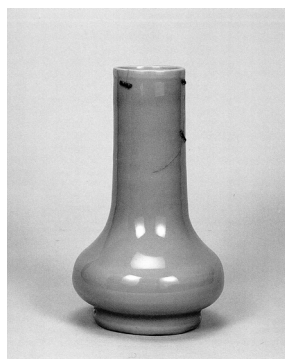


圖43a 南宋龍泉窯「鏝」銘長頸瓶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H 22.8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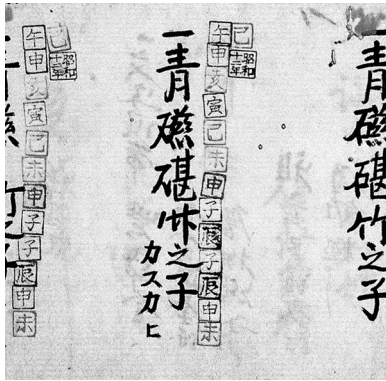


圖43b 《道具改帳》八番所見「カスカヒ」



圖44a 傳千利休藏  
南宋龍泉窯青瓷盤口魚耳紙槌瓶  
日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  
H 26.7cm



圖44b 同上側面  
調査時撮影



圖44c 同上側面  
調査時撮影



圖44d 同上側面  
調査時撮影



圖44e 同上側面  
調查時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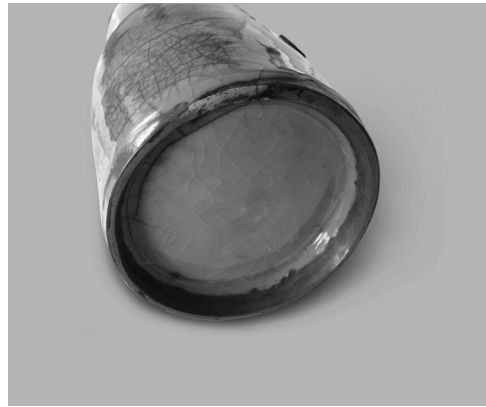


圖44f 同上圈足  
調查時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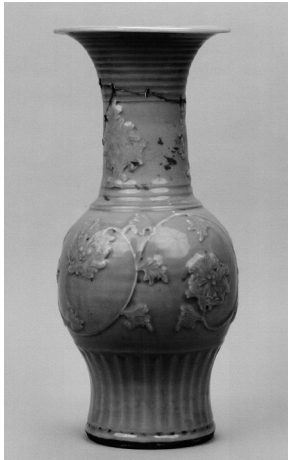


圖45a 龍泉窯青瓷長頸瓶 元代  
日本北野天滿宮藏 H 50.4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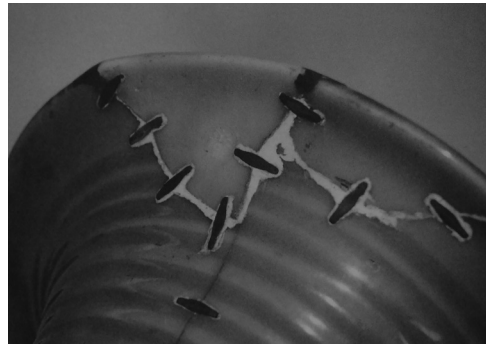


圖45 同上 帶「永樂」印銘的修繕部位



圖46a 書有「江山樓」字銘的日本製釉上彩  
花口碗 臺北市中山堂藏



圖46b 同上背面



圖46c 同上側面



圖47 二十世紀前半錫補玻璃碗 臺灣私人藏  
D 25cm



圖48a 櫛文土器 岩寺洞第5號住居址  
바닷出土 H 38.1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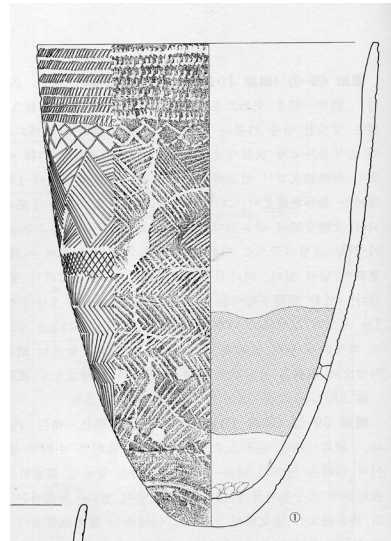


圖48b 同上 線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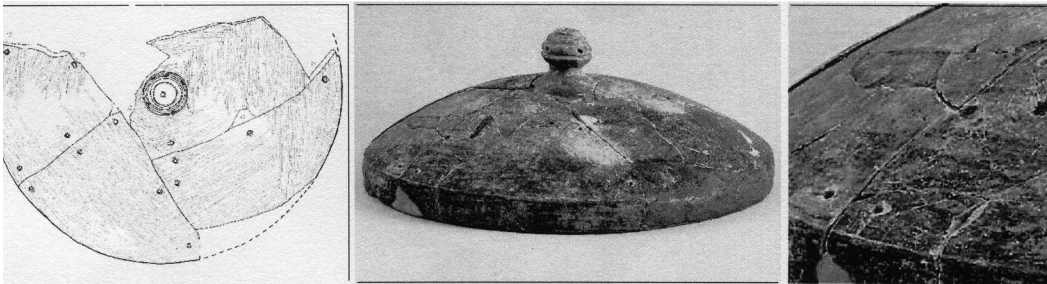


圖49 風納土城慶堂地區出土陶器蓋之修理復原痕跡 漢城百濟一期



圖50 帶鍋孔的元青花殘片  
日本沖繩今歸仁グスク遺跡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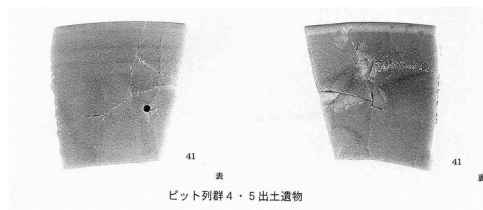


圖51 帶鍋孔的元代青瓷殘片  
日本沖繩浦添原グスク遺跡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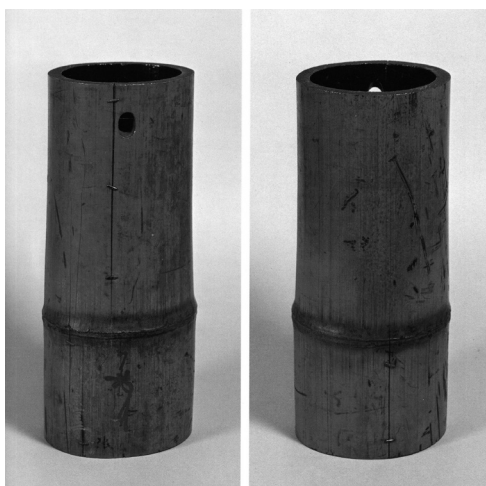


圖52 傳千利休作竹尺八花插 桃山時代  
H 26.4cm



圖53a 陳洪綏《樵古冊》第一葉 (1619)  
翁萬戈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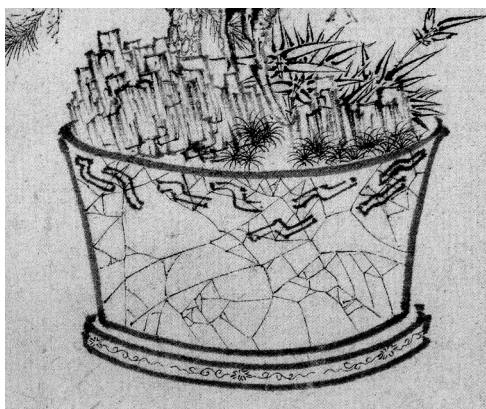


圖53b 同上局部



圖54 印度庫特拉菲路沙哈宮 (Kolta Firuz Shah) 出土元青花盤



圖55a 印度庫特拉菲路沙哈宮 (Kolta Firuz Shah) 出土元青花盤



圖55b 同上背底



圖56a 伊朗阿德比爾寺藏元青花



圖56b 同上 阿拔斯一世刻銘



圖57 霍爾木茲 (Hormoz) 舊港出土南宋至元代青瓷標本



圖58a 阿曼半島朱爾法 (Julfar) 遺址出土明代青花標本



圖58b 同上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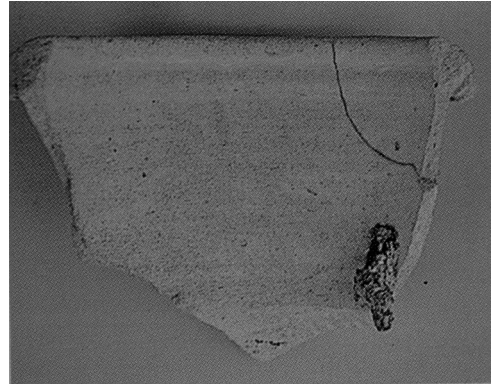


圖59 朱爾法 (Julfar) 遺址出土14世紀伊斯蘭釉陶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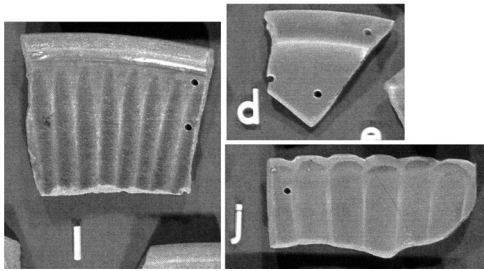


圖60a 朱爾法 (Julfar) 遺址出土中國和東南亞陶瓷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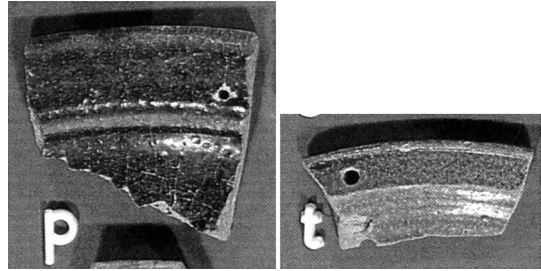


圖60b 朱爾法 (Julfar) 遺址出土東南亞陶瓷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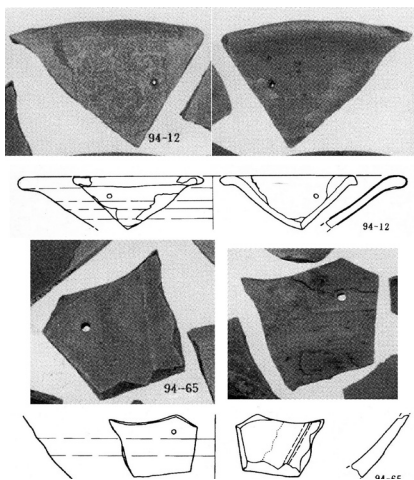


圖61 伊朗哈雷伊拉 (Al-Hulayla) 遺址出土帶穿孔的伊斯蘭釉陶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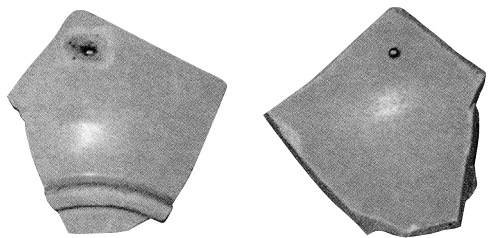


圖62 伊朗尸羅夫 (Siraf) 遺址出土晚唐鞏縣窯白瓷標本



圖63a 伊拉克薩馬拉 (Samarra) 遺址出土  
晚唐期白釉綠彩標本



圖63b 同上



圖63c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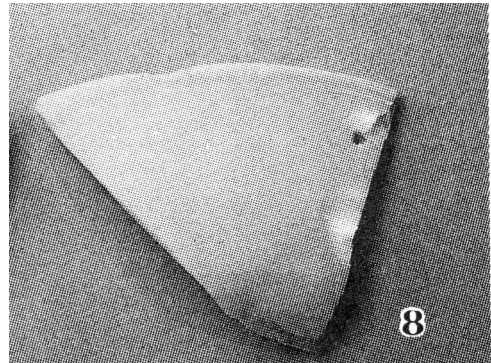


圖64a 埃及福斯塔特 (Al-Fustat) 遺址出土  
青瓷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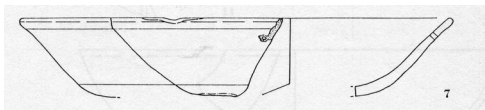


圖64b 同上 線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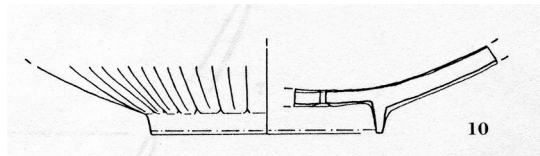


圖65 埃及福斯塔特 (Al-Fustat) 遺址出土  
青瓷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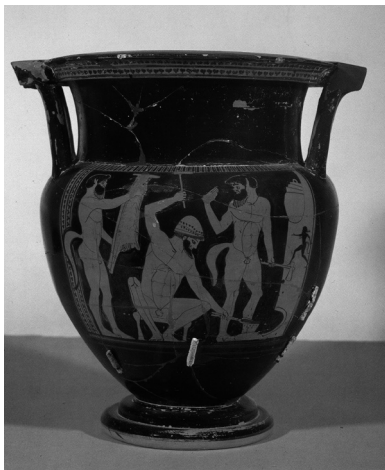


圖66a 義大利西西里島出土古希臘紅像式陶壺 B.C. 475 H 30 cm



圖66b 同上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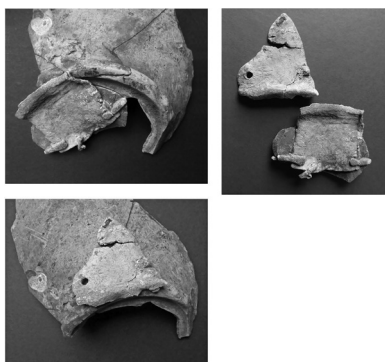


圖67 古羅馬薩米安紅陶 (Samian Pottery) 標本1~3世紀  
不列顛東北神殿區火葬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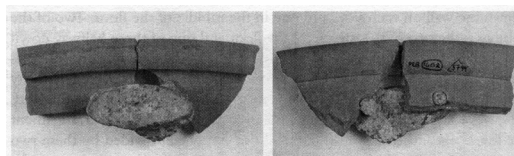


圖68 古羅馬陶碟 (碗) 標本  
義大利巴拉丁諾山 (Palatine Hill)  
東北出土  
6~7世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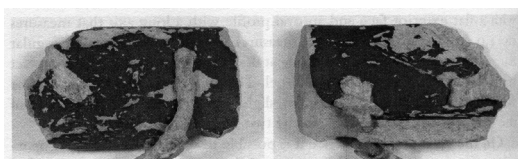


圖69 古羅馬陶盤 (碗) 標本  
義大利維泰博 (Viterbo) 省出土  
西元前1世紀~西元2世紀



圖70 歐洲19世紀茶壺所見金屬鉸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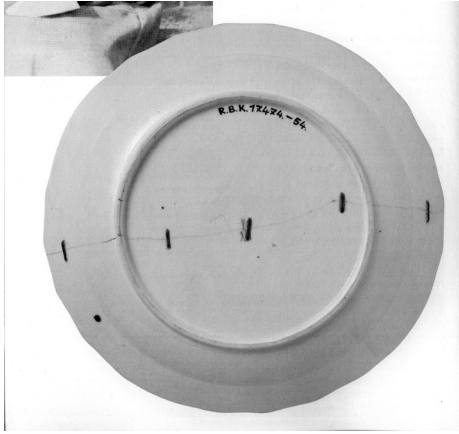


圖71 歐洲18世紀瓷盤所見錫釘  
D 34.5cm



圖72 歐洲瓷盤所見錫釘上塗施釉彩



圖73 18世紀的歐洲陶瓷修補匠



圖74 中國15世紀前期青花盤  
土耳其砲門宮殿博物館藏 D 41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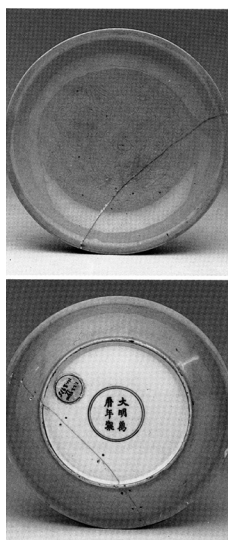


圖75 明代萬曆期 (1573—1619) 景德鎮官窯黃釉龍紋盤 土耳其砲門宮殿博物館藏  
D 18.5cm



圖76 土耳其伊茲尼克 (Iznik) 青花瓷燈具  
15~16世紀 H 27.2cm



圖77 英國1770年印製的陶瓷修補作坊宣傳海報 大英博物館藏



圖78 德國Schloss Charlottenburg瓷器間所見浮雕人物

#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Staple Repair

**Hsieh, Ming-li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istorically, the method of using metal staples to repair or strengthen ceramics has been adopted in many countries worldwide. In general, the method involves drilling holes along either side of a crack on a ceramic ware, and then inserting u-shaped metal staples to repair the war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xamples of ceramics with staple repairs in East Asian, South Asian, Middle East, and European historie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craft of staple repair for high-temperature glazed porcelain in 18th-century Europe could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China, and staple repair craftsman could be regarded as a new profession emerging along with European hard porcelain. In the region of China, staple repair was mainly applied to broken ceramics. However, the images of stapled ceramics were already used as an artistic strategy to create an atmosphere of high antiquity in literati paintings as early as the mid- and late Ming dynasty. The appreciation of metal staples on ceramics that rose in the circle of tea ceremony in 16th-century Japan could have also been inspired by the unique interpretation of stapled ceramics among Ming literati.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staple repair diffe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China, metal staples on ceramics were only used as an image or symbol of antiquity among literati of a specific period. By contrast, such staples developed into a quaint object for appreci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tea ceremony. In addition, this cultural practice has been enthusiastically discussed by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Japanese cultural history as an indicator and example of the Japanese aesthetics of appreciation since the Momoyama period. Particularly, the practice of endowing stapled ceramics with symbolic meanings and appreciating them is only found in China and Japan, which is a special cultural phenomenon in the world history of stapled ceramics. ( 陳珀愉譯 )

**Keywords:** metal staples, ceramic repair, Bakohan tea bowls